



大连文史资料

第一辑



# 大连文史资料

第一辑

(内部发行)

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辽宁省大连市委员会  
文史资料委员会编

一九八四年十二月

审核定稿：蒋永维、田将庆、王多闻

编辑：王胜利、卓武山、童方、于礼萍

# 大连文史资料

第一辑

大连市政协文史资料研究委员会办公室

---

大连市重型机器厂印刷厂印制

---



## 目 录

创建大连育才学校的回忆.....	3
满铁大连图书馆 .....	11
血泪浸透“碧山庄” .....	25
清末庄河抗捐首领潘永忠.....	36
响应辛亥革命的复州民军.....	42
有关柳亚子先生及先父李汝航的几首诗.....	46
从髯翁于右任学术琐事.....	50
一代短跑名将刘长春.....	53
刘长春青少年时代的二三事 .....	71
大连最早的一支足球队——中青队.....	74
抗战胜利后大连地方金融简况 .....	90
金县益昌糕点店 .....	94
金州小吃.....	98

轶事七则.....	102
大连名称的由来.....	108
近代大连记事.....	112
编后.....	161

## 创建大连育才学校的回忆

李光

一九四九年二月，我奉命负责筹建大连育才学校，直到一九五四年一月调到沈阳。短短的五年时间，这座以接收烈士子女、志愿军干部子女和地方干部子女的学校从无到有，直至发展成为一所包括幼儿园、小学在内的能够寄宿的中学校，给我留下了难忘的记忆。

### 一、 筹建和建校初期

一九四八年十一月我军胜利的结束了辽沈战役，解放了东北全境。党在东北的工作任务十分艰巨。当时旅大地区由苏联红军占领，尽管有国民党的层层封锁，政治、经济形势还是比较稳定，但小孩子上学却很困难。随着我军的胜利，在大连集中着的由延安和关里老革命根据地来的大批干部要迅速向全东北以及全国进军。这些同志虽然已经参加革命多年，但大部分同志的家当，只是一套被褥。唯有送子女上学成为他们的一桩心事。

为了减轻干部的后顾之忧，中共旅大地区党委决定尽快成立一所能够寄宿的学校，集中招收烈士子女和干部子女。

一九四九年二月的一天，区党委副书记郭述申同志邀我到他办公室。郭书记开门见山地告诉我：“区党委决定成立一所学校，准备派你去筹建，担任党支部书记、副校长。校长请毛达殉同志（当时是大连市市长）兼任，你有什么意见？是不是回去和丁哲民同志商量一下？我想他会支持的！”

当时我在旅大市妇联担任组织部部长，对党分配的工作当然没有二话。虽

然我自一九三六年参加共青团组织以来，长期从事妇女工作（一九三七年十一月担任河北省饶阳县妇教会主任，曾在冀南区妇救会工作），对妇女工作比较熟悉，也有着更加深厚的感情。我爱人丁哲民同志是旅大团市委副书记（后为书记），当时我们的长子六岁，女儿四岁，如何送他们上学、上幼儿园（当时称为幼稚园）一直是让我们发愁的事。前不久，哲民同志还对我说，如果能够办一座学校，把烈士子女、干部子女负责管起来，那可给广大干部解决了大问题。

想到这，我感到区党委的决定具有深远的意义。党的信任和委托，广大干部，尤其是烈士遗孤的热望，使我愉快地担当了这一抚育革命后代的重任。

学校筹建经费由旅大行署教育厅直接拨给，开办费共计三十万元。校址选在劳动公园东侧内的一所原日本学校（即现在的大连市二十四中学校址），定名为大连市育才学校。根据区党委指示和广大干部尽快开学的要求，我们首先抓紧时间修复校舍，进行筹备，于秋季开学。

日本人撤走后，校舍破坏严重。主楼当时已经没有屋顶。偌大的院子里堆放了一大批垃圾。主楼道东、道北的两处宿舍也已经破烂不堪，急需维修。

幼儿园园地选定在劳动公园北端的一个教堂（即现在大连市艺术馆）。路西有一所日本人的神社，也拨给了我们。定名为育才幼儿园。

经过几个月的紧张筹建，在大连市教育局范围内挑选了一批教师到学校。这样，到七月份已经有教职员工四十多人，学校和幼儿园均已初具规模。

一九四九年八月，大连育才学校和附属的幼儿园同时开始招生。消息传出，旅大地区广大干部拍手称快，互相传告。

当时入校的烈士子女和干部子女，须有区党委组织部干部科长李蒿峰同志（李蒿峰同志，后曾任中共沈阳市委副书记）的批字。由于孩子的家长大部份都在大连市，所以开始时收录的住宿生不多，只有百名左右，其余的二百多名学生只在学校吃一顿午饭。

一九四九年九月一日，在育才学校礼堂举行了隆重的开学典礼。大连市市长兼校长毛达殉讲了话，旅大区党委宣传部部长邹问轩同志亲临祝贺。这给全



校师生很大鼓励。

在筹建学校过程中，党支部既要抓教职员工的思想政治工作，又要抓行政工作，任务很艰巨。毛达殉同志在市政府工作繁忙，但仍经常到学校来听汇报，谈工作，具体研究和部署校园的规划、筹建等很多具体问题，如人力、物力、建筑材料等，大都是经他批准，大连市政府给解决的。在筹建学校的过程中，毛达殉同志是起了重要作用的。如果没有这样一位热心教育的市长直接抓，大连育才学校筹办的速度和质量不可能如此之快和如此之好。

育才刚开学一个月，毛泽东主席在北京天安门广场宣告中国人民站起来了。随着解放战争的胜利，毛达殉市长在一九五〇年春天由湖南陆续请来了教师六人，增设了初中班，向十年制中学实验阶段发展。这时学校已经有教师四十余人，这就把如何使用知识分子的问题提到日程上来了。

我们对知识分子进行了具体分析，认为建国前，党外的知识分子确实处在动荡之中。他们中的有些人由于接受了各种消极影响，对共产党能否掌握政权、能否办好教育持观望甚至怀疑态度。但其中绝大部分是爱国的。党支部对教师采取了团结、教育、改造的方针。对他们大胆放手使用，政治上给予充分信任，业务上给予实践和提高的机会，生活福利上给予优先照顾。我们对知识分子进行历史的分析，认为他们有文化，有能力，同时又有一定的思想包袱。党支部组织他们学习政治时事，学习中央负责同志有关调动知识分子积极性的讲话，宣传党对知识分子的政策，帮助他们卸包袱。使教师们感到党对知识分子的重视和关怀，从内心认为自己是“育才”的主人翁，增强了责任感。

比如，有位张老师，是位老生物教师，他从湖南到旅大后，由于家乡口音很重，讲课有困难，便主动承担了生物实验室的工作，负责辅导学生制做标本、栽果树。把园艺生物实验搞的生气勃勃，受到学生的爱戴。当时大连育才的园艺是全市著名的。菜园里每年都有春、夏菜。收获水果则都放到学生餐厅

里给大家吃，使学生不仅增长了知识，而且增加了集体观念，感受到劳动的光荣和幸福。这样，全校师生对参加园艺劳动的兴趣更浓了。

为了提高师资队伍。我们加强了教师的政治思想教育和业务学习。当时除星期日以外，没有家务负担的教师，基本上每周六天都在学校住。我们组织了教学观摩，校领导轮流听课，参加教研组活动，党支部书记担任政治课的教学。星期日和节假日组织学生野游，密切师生关系。

这里，我着重回忆一下曾经为大连育才的建设做出了可贵贡献的几位同志。

戴忠明同志，原育才幼儿园副园长、园长。她是湖南人，出身自由职业者家庭，她兄妹多，父亲早逝，为了照顾弟妹，她读完师范学校就参加了工作，多年从事教育事业，并且供弟妹上学。在她的影响和资助下，其弟、妹均受到了高等教育，并且陆续参加了革命工作。如她妹妹黄葳同志（曾任黑龙江省科委主任，现任国务院科技干部管理局局长）就是由清华大学毕业，投身革命的。忠明同志献身于教育事业，一生未曾结婚。她于一九四九年由青岛到大连育才幼儿园，一直到一九六八年退休，始终在幼儿园主持工作。一九八一年病故于北京后，她的胞妹黄葳同志将忠明同志多年的积蓄万元人民币献给了旅大市儿童基金会。

忠明同志待人和蔼，热情诚恳。她生活简朴，严于律己，幼儿园的教工们都尊称她为“戴大姐”。这是一位热爱党，热爱幼儿事业的好同志。

大连育才教导主任杨开英同志，是杨开慧烈士的堂妹。她细长的身材，戴着近视眼镜，给人文雅的感觉。但在她身上，却有着火一样的热情和蕴力，工作起来往往忘记了时间，不分昼夜，不知疲倦。她毕业于湖南大学，一九五〇年初来到育才后，一心在如何搞好教学上下功夫，她学习苏联十年一贯制的学制，提高教学质量，进行教材的改编，总结了学校几个年级的教学经验。虽然当时她已经是年过三十岁的大姑娘，但对个人问题却很少考虑。在大连育才工作期间，她把全部精力都投入教学和管理孩子身上。杨开英同志为人正直，忠诚于党的教育事业，她于六十年代病故于北京。

大连育才从筹建到办校比较顺利，首先是旅大区党委、行署的重视和在实际工作上的支持，选派了比较坚强的干部，有毛达殉市长的亲自领导；其次是党支部。虽然在“左”的思想影响下，也伤害了某些同志的感情，至今尤引为内疚，但是总的来说，还能比较正确地贯彻党的知识分子政策，调动他们的积极性。建国前后一系列重大的历史事件，诸如三反、五反运动和抗美援朝斗争，都由于党、团员的模范带头作用而胜利完成。党支部还注重吸收政治上比较成熟，够条件的知识分子入党。几年来陆续发展了李秀英、李德连、李芹芝等同志为中共党员，由李德连同志兼任团支部书记，不断吸收优秀青年入团。

大连育才办的比较顺利，还有一个重要原因，是得到了社会上各方面的支援和重视。比如人民解放军大连海军学校，从党委到教职员对大连育才多方面给予支持，代请了有教学经验的教师李钦芝等同志到育才任教，旅大苏联侨民学校在提供十年一贯制的教科书和传授教学方法上给予了支援。在战备上得到了旅大行署和防空指挥部全力支持。一九五一年、五二年正是抗美援朝紧张阶段，大连市防空任务紧急，全校四百多名孩子七岁以下的一百名，行动不便。防空指挥部拨出专款在劳动公园北山沟里修了防空洞，有住屋、厕所和仓库，还有照明设备。防空指挥部派出专人指导施工，还指导和帮助全校师生进行防空演习。

## 二、抗美援朝开始后学校的情况

一九五〇年十月，抗美援朝开始。随着志愿军入朝参战，上级党委指示大连育才学校迅速接收志愿军干部子女入学。这些孩子要全部寄宿学校，并享受供给制待遇。这项政治任务，准备时间短促，担子很重。由于学生数量突然增

加，带来许多困难。经过党支部的动员，全体教职员工都纷纷表决心，一定圆满完成党托付的光荣任务。全校立即行动起来，扩建教室、寝室和食堂，迎接新生的到来。

志愿军子女是由中共东北局组织部分批介绍来的，每批十几人到几十人不等。学校组织了专门接待班子，到火车站和码头去接。连续接了两个月才全部到齐，到校一百二十余人，最小的六岁，大的十五岁。孩子们到校后，立即进行体检。因为有些孩子来自农村、边防，学校对他们的健康状况必须全面掌握。记得有个男孩子是山东来的烈士子弟，他的父母均在抗日战争中牺牲，跟随伯父生活，后被哥哥接到大连抚养。入校时发现患有麻风病，很快被送到大连麻风病岛上医治去了。由于治疗及时，既使病孩早日康复，又免传染他人。

一九五一年春天学校里发现了猩红热。为了立即控制这种传染病的扩散，我们把患病孩子所在的班级进行隔离。接着全校动员大搞卫生。使我难以忘怀的是，正在大连疗养的蔡畅大姐在区党委第一书记欧阳钦同志陪同下来校视察。蔡大姐和欧阳钦同志视察后，亲切地问我有什么困难？我说没有别的困难，就是担心猩红热蔓延开来。没想到过了两天，行署由韩光主席来了电话，说蔡大姐给孩子们请到了苏联红军医院的小儿科医生，让我们立即带着翻译到苏军医院去接。我们被蔡大姐的关怀深深感动。我一句简单的话，却被蔡大姐认真地当做一件大事抓紧解决，老一辈无产阶级革命家是多么关切革命的后代啊！我们立即随同行署的俄文翻译接来了苏军小儿科医生。这是位四十岁左右的女军医，是苏军医院的儿科主任，她工作起来不分份内份外，每周到校工作两天，从环境卫生到学生健康检查，直到医务室病号的治疗，都非常严肃认真。我们医务室的专职护士和医士都有了依靠。从此，我们有了学校的兼职校医。

对学校的建设，区党委十分关怀。欧阳钦、韩光、郭述申以及任仲夷(旅大团市委书记、区党委秘书长)、组织部长胡忠海、宣传部长邹问轩等领导同志都亲临学校检查工作。

徐海东同志也到校巡视过。这位久经沙场的老将军对如何办好学校十分关

怀。有个星期日，徐老乘车来到校园，他说：“我有肺结核，学生在校时我不敢来。学生离校后我来看看校园，也是我最大的快乐。”

后来，徐老曾专门约了毛达珣、杨开英和我一起来到大连岭前他的休养地交谈，还请我们吃了“鱼翅席”。老革命家的关怀，使我们深受鼓舞。

永远使我难忘的是，一九五一年元旦，在为苏联红军举行的一次宴会上，敬爱的周总理关切地找毛达珣同志和我到他面前，周总理和蔼地询问：“你们是大连育才的正、副校长吗？你们是培育人材的学校啊！我通过欧阳湘（欧阳钦同志之子）知道你们学校很注意学生智力和德育的培养。要教育孩子们爱祖国、爱人民、爱劳动。特别是干部子女，要打消优越感，不能比谁的爸爸坐车还是步行上班。要教育他们比吃苦，比为党为人民作的贡献！这要靠你们在教育上去创造，方法要生动活泼，为孩子们所喜闻乐见。建议你们让孩子们学点历史知识。只有知道祖国历史的人，才能更爱自己的祖国。”凝视着周总理慈祥的面容，我的心情激动不已。周总理接着又微笑着说道：“今天我手把着湘湘的手教他写毛笔字，你们可以让孩子们写写毛笔字，每天有几十分钟也可以，天长日久见功夫啊！”周总理一席话，给我们指明了办学方向。第二天我们向全校师生传达了周总理的教导，并发动师生讨论如何贯彻执行周总理的指示。经过讨论研究决定，要正确贯彻德、智、体的全面教学方针，为祖国培养合格的后代。教职员工一致同意在课程内每天增设四十分钟的毛笔字课，其它课程的教学要生动活泼，宜于学生接受；图书馆补充了许多中国古代历史通俗读物。针对学生住宿生较多，组织了许多课外活动小组，如：讲演小组、园艺小组、地理、美术、航空小组等等。全校每周举行一次故事会，学生们上台去讲述中国古人的故事，有岳飞、岳云、周处等故事，既组织学生学了历史，又锻炼了学生的思维和表达能力。在美术和地理小组，学生们画了历史连环画和祖国地图。在品德教育上正式向学生们提出了“五爱”的内容，这就是：爱祖

国、爱人民、爱科学、爱劳动，爱护公共财物。为了让学生们牢记并身体力行，要求教职员以身作则，起表率作用。我们将“五爱”以五尺见方的大红字写到教学楼的墙上，学生一进校就看见，每天做操集会都站在“五爱”标语的前面。同时学校也向学生和家长提出不要搞特殊，不许乘坐家长的专用车，不许在学校带食品、用具等等。

在周总理指示教诲下，育才学校师生员工掀起了办好学校，为祖国培养优秀人材，为志愿军抚育好孩子，为革命教育好后代的热潮。

最后，还应该提到的是大连育才学校的好学生、在“文化大革命”中被迫害致死的欧阳湘同志。

欧阳湘是欧阳钦同志的独生儿子，一九六七年被林彪一伙迫害致死时年仅二十七岁。湘湘在育才时就是个好学生，他功课好，学习成绩优秀，懂礼貌，爱劳动，尊重师长，爱护小同学，生活艰苦朴素。一九五三年他随欧阳钦同志到哈尔滨，在高中学习时仍然是好学生，一九五八年他考入中国科技大学，在学校加入了中国共产党。毕业后到长春光机研究所搞科研。“文化大革命”初期，欧阳湘满怀对党的热爱、对革命事业的忠诚，写信给省委转党中央，提出要警惕野心家篡权，却被林彪一伙诬陷为“内奸”、“反革命”，拉到哈尔滨批斗，并被迫害致死于长春。

文化大革命前的每年春节，湘湘都要到我家，说是来看望老校长。象湘湘这样对同志有深厚感情，热爱祖国热爱社会主义的好学生，大连育才培养了一批又一批，现在我对不少好学生都记忆犹新。

一九五三年十二月，组织上调我去沈阳，委派东北局机关党委副书记张煜同志来大连育才任校长。这是位参加革命工作多年的老同志。后来她也调到黑龙江，任省科委副主任。现在张煜同志已经在沈阳离休。

## 满铁大连图书馆

杨力生

大连，这个祖国美丽的海滨城市，历史上几经沧桑，帝国主义对它进行过一次又一次地殖民统治。1905年9月5日发生在这片土地上的日俄战争结束后，日俄间签订了《朴茨茅斯条约》，大连，也就由俄国的殖民统治变为日本的殖民地了。1906年6月7日（清光绪32年4月14日）日皇以“一四二号敕令”，公布“设立南满洲铁道株式会社。置本社于大连，设支社于东京”。1907年4月1日正式开张营业。

### （一）

南满洲铁道株式会社（以下简称满铁），是日本帝国主义设在大连的一个侵略机构。第一任满铁总裁后藤新平草拟的《满洲经营策梗概》中供认：“是代替（日本）政府经营南满洲。”

满铁大连图书馆，是满铁这个侵略机构的图书、情报基地。它既是储存文献资料的中心，也是领导铁路沿线二十四所图书馆的中心图书馆。他们的办馆宗旨很明确。在《满洲教育史·满铁图书馆》一书中明明白白地写着：“图书馆的主要任务就是用所藏图书，配合当时的形势发挥其作用。”为日本帝国主义的侵略政策服务。

满铁成立那一年，也就是1907年，调任满铁理事的东京帝国大学教授冈松参太郎，为了文化侵略的需要，在满铁调查部的隶属下成立了图书室，室址在原来大连儿玉町满洲资源馆三楼。1908年，满铁办公地点转移，图书室也随之

搬迁到大连东公园町（现世纪街），设于满铁人事课的一处房间。

由于这个图书室，不能满足调查部“工作”上的需要，冈松参太郎本人对利用图书馆进行侵略又有极大野心，因而声称：“要在满铁附属下，建设一个东亚一流的、具有近代建筑美的理想图书馆”。于是，便在 1911 年 8 月，于东公园町 29 号一处，面积为 5, 872 平米的地方开始兴建图书馆。

图书馆建筑工程共分三期。以建筑面积为 390. 09 平米的六层书库为中心，延伸左右两翼二层办公楼房为第一期。自 1911 年 8 月动工，至 1913 年 8 月竣工。书库所用的书架，是美国斯尼依德公司专利的钢铁书架，从地下室到最高层六楼，上上下下全部贯通。第二期是书库前面的大阅览室，建筑面积为 198. 36 平米。1918 年 11 月动工，次年 9 月完成。第三期是建筑面积为 116. 23 平方米的六层楼房新书库。1926 年 9 月始建，1928 年 12 月完工。至此，这个为日寇侵略中国服务的图书馆新馆舍全部落成。

随着书库和阅览室的先后建成，满铁于 1918 年 1 月 15 日以总事甲第 632 号通知，将原属调查部的图书室，改隶南满洲铁道株式会社直接领导，名称是“南满洲铁道株式会社图书馆”。1919 年 9 月，该馆重新制订了规则，规定主要开展对满铁业务的参考工作，并兼代提供公众阅览，遂于同年 10 月 1 日，正式开放。

从 1907 年满铁调查部创建第一个图书室始，到 1919 年的十余年间，满铁共建立了 24 个图书馆。分布在铁路沿线的有：奉天、瓦房店、大石桥、营口、鞍山、辽阳、苏家屯、奉天八幡、铁岭、开原、四平街、公主岭、长春、本溪、抚顺、安东等 16 个馆。在大连市内除满铁图书馆外，尚有日出町分馆和日本桥、伏见台、近江町、埠头、沙河口、南沙河口等图书馆。此外，对边远地区还进行了划区（划了 12 个流动区）、定点（定了 150 个阅览点），作为巡回流动阅览。这些铁路沿线图书馆和流动区、阅览点的业务联系与书刊互借，统一由满铁图书馆掌握。如此组织、设置，便形成了纵横交错的图书馆网络。为便于管理和与其他各馆区分，1922 年 6 月 19 日，根据社规第 9 号通知，又将满铁图书馆改称为“南满洲铁道株式会社大连图书馆”。



(二)

满铁大连图书馆，明确规定要“广泛搜集古今中外的图书资料，供给会社业务的参考”。因而，它是被特定为满铁的“参考图书馆”。

为满铁业务执行“特定参考任务”的大连图书馆，对它借以服务的图书；则采取多样手段，通过各种渠道，或强取豪夺，或重金收买，又多次拨专款、派专人到国外和关内进行搜刮收集。

1917年为纪念满铁会社创建十周年，拨发图书专款三万日圆（下同），以资采购。

1922年1月，除另拨专款派人外出采购外，并于同年6月接收了哈尔滨所在的俄国后黑龙军管图书馆所藏的有关研究东北、蒙古、西伯利亚地方的俄文图书资料三万册。

1923年2月，又拨专款，采购的重点，有明显的侵略色彩和地方特点。从内容看，是有意识的网罗东北地区的方志、地图、图绘、稿册以及政治、经济、地质资源、风土人情等有关资料；对政府、学会等出版的一般不公开发售的业务上的调查资料，尤为重视。单就收集的我国各省、府、县地方志，连同1940年左右与奉天图书馆交换的在内，就有二千三百余部（不包括复本）。从我国现存较早的《长安志》到近代的辽、吉、黑等省的《辽海志略》稿本、《全辽志》、《盛京通志》等抄本，以至县、村志的油印本和公文档案，全在搜求范围之内。他们将搜罗的资料，不分文种，不论书型，按内容进行了编排、组分。因而，形成了比较系统、完整的关于我国东北、蒙古和远东、东南亚、犹太等地方文献以及专题文献资料体系。

1925年，他们又将当时驻在长春的苏联领事拉布罗夫所搜集的有关中国边

疆问题的西文图书五百余册如数收买。同年，把在北京留任的意大利公使馆馆员罗斯（ROS）利用工作之便，三十年间馆藏的中国舆图六百幅全部购得。这些舆图，多系稀世珍品，其中明清两朝的写图、满文中国地图、满汉合璧战迹图、海口要隘水陆远近形胜图，最为珍贵。加明嘉靖《中国古地图》（写图），清康熙十三年南怀仁编《坤輿全图》，乾隆四十一年铜版《盛京吉林黑龙江等处标注战迹舆图》，道光至同治年间《皇輿全图稿本》（20册）以及《奉天各海口大小炮台图说》、《八省沿海全图》、《中国海道图说》、《海口要隘水陆远近形胜全图》等都可谓舆图、图绘中之上品。1930年10月，该馆曾以这部分地图举办过专题展览。1935年7月，日本青山定雄以《古地志地图等之调查》为题，在《东方学报》（第五册续篇）上就介绍过绢地彩绘、有杨子器跋、年款为嘉靖五年岁次丙戌春二月的明嘉靖《中国古地图》，并载有该图的照片。罗斯所搜藏的四十余种西域地方图和有关回教的图书三百六十余册，也被同时购进。

1925年11月，大谷光瑞保藏的中国古籍五千余册、西文图书三百册也移入该馆。这些古籍，不乏稀少珍贵版本。其中的明清小说部分，多是从《金瓶梅》问世，到《红楼梦》刊行一百四十年间所刊刻，有数十种是国内外的孤本。为国内外的专家、学者注目。1931年孙楷第先生赴日本调查公私所藏小说完毕后，转道来大连，看完了大连图书馆所藏的小说，撰有《大连图书馆所见小说书目》一卷。据馆藏查对《孙目》，以知当时孙氏只看到一部分，并未全部“看完”。

1927年，满铁成立二十周年时，又拨购书专款二万九千日圆。

1928年，拨五万日圆，用来购书。

1929年1月，又专拨十万日圆巨款，派专人到京津沪一带搜买大量中国古籍。其中珍贵的精抄名刊甚多，计有宋版八种，元版十余种。列简目如下。

宋版八种：

《淮南鸿烈解》（通称淮南子。二十一卷十二册。海源阁旧藏。）

《说苑》（二十卷十册。大字本，海源阁旧藏。）

《管子》（十卷十册。海源阁旧藏。）

《荀子》（二十卷十册。大字本，海源阁旧藏。）

《三谢诗》（一卷一册。蝴蝶装，海源阁旧藏。）

《康节先生击壤集》（十五卷六册。海源阁旧藏。）

《通鉴记事本末》（四十二卷九十六册。大字本，肃亲王旧藏。）

《二十一史》（宋、元、明刊。大字本，二五六一卷六〇三册。）

元版十余种，有：

《翰墨大全》（残本）、《齐东野语》、《尚书》、《晏子春秋》、《六子（老、庄、列、荀、杨、文中）》、《老子道德经》、《吕氏春秋》、《古清凉传》、《唐三体诗》、《昌黎先生文集》等。清版大本的《古今图书集成》，初刻本《芥子园画传》，以及引人注目的四千多册中国医学古籍，也是这次购入的。

“九·一八”事变后，他们在书刊搜刮手段上又加添了好几手：一是以学术面貌出现，派出所谓的“科学调查团”，到各处进行掠夺、骗窃。一是公开的调动宪兵、警察到各书店、各图书馆进行搜查、劫取；同时又进行了大量的“转抄”和所谓的“捐赠”。日本帝国主义分子德永重康首先组织了一个“满蒙学术调查团”，到北票、朝阳、凌原、承德、兴隆、赤峰等地掠夺了大量的文献资料，窃取了许多珍贵的历史文物。1932年，日本宪兵、警察查封了沈阳的一家书店。他们把进步的书刊完全烧毁，将贵重的资料全部掠走，并将经理投入监狱。当时东北的一些原国立、省立图书馆，都收藏着一些珍贵的历史文献和乡土资料。对这部分资料，他们挖空心思地想搞到手。满铁大连图书馆嘱托岛田好和满铁辽阳图书馆主事柳田季四郎，通过满铁辽阳地方事务所，骗窃了大量的辽阳历代文献资料、考古资料和名胜古迹照片。沈阳八幡町图书主任植野武雄也曾多次到原奉天省立图书馆抄录他们缺少的县志、乡志。满铁鞍山

图书馆的《鞍山驿》、《鞍山驿堡》、《鞍山石洞》等也是转抄得来的。他们还着力收集欧美各国学者所著的有关中国著作。尤其注重并采购了欧美各国研究中国的刊物，如《バックソバツ》之类，使这一部分图书达一万六千余册，可谓收罗至广。

就这样，他们通过各种渠道，从 1907 年开创满铁图书室开始，到 1937 年 3 月末，藏书总额已达二十七万零二十四册。其中古籍中文线装十八万二千四百五十六册。西文（俄文除外）书三万零四百二十册。订有中外文杂志六百五十二种，报纸五十七种。凡在我国东北刊行的期刊全部订有。1937 年之后，直到 1945 年大连光复，这期间的采款购书情况，因无确切依据，虽数字不详，但藏书总数已近四十万册。

满铁大连图书馆，总书丰富，又独具特点，形成了专题性、地区性的文献资料体系。它的收藏，除有系统、完整的东北地方经济调查资料外，更不乏对考古、金石、美术、甲骨等古籍的收藏。英国斯坦因、法国伯希和的西域考古研究等书，日本东方考古学会编刊的《牧羊城》、《通沟》等书，以及我国的碑帖、印谱，也都搜罗较全。就是在西文藏书中，马克思主义的经典著作《马恩通信集》、《马克思传》（孤本）、共产国际杂志等书刊，唯心主义哲学著作《黑格尔全集》、《尼采全集》、《康德全集》等书，也是尽量搜寻。至于可供研究中国近代史的一些公文奏稿、手抄名札，则更不放过。各种中外工具书、为数相当可观的中国丛书和满文、蒙文图书，也是它的收藏特点之一。1929 年 2 月，满铁会社把日本国内的德语教授石川铁雄请来担任调查课长，这位课长就是根据他们广泛搜集到的东北地方文献资料，汇编成了一部《满蒙百科全书》（六卷附录一卷），为日本帝国主义侵略者全面了解中国东北和朝鲜的自然地理、物质资源、风土人情提供了较详尽的材料。

### （三）

满铁大连图书馆的性质，决定了它的藏书内容和成份。由此，他们对书刊

的借阅也作了区别对待。除进行公开性质的一般借阅外，还开辟了作为内部的“满蒙”、“殖民”、“交通”三个特别参考研究室的特殊阅览。特殊阅览证是经过使用者申请，由所在单位审查批准，再经图书馆考核同意后，限数下发的。持证者不但能在特殊阅览室免费查阅图书，而且能进入书库随意检索所需资料，并允许借出馆外使用。

普通阅览室则需购买“阅书卷”，一次二分，一个月（三十次）四角。基本上分三个月、半年、一年三种券期。不交费购券是不准入室阅览的。（报刊阅览室不收费，但查阅过期期刊则收费。）1935年4月修改了部分阅览规章，规定除职工外一般阅览者只限专科学校的学生。1936年4月以后，整个阅览改为免费。

普通外借只限持有借书证的人。借书证的发放对象，除满铁所属单位的职工外，对满铁以外的大连的政治部门、机关团体的官员也发放。对满铁沿线各地职工和东北地区的机关团体官员，是通过所在地图书馆和各地“地方事务所”的审批，提请大连图书馆的同意再发给借书证。借阅的侧重点，基本上是满蒙的有关文献资料和带有奴化性的文艺作品。由此，也鲜明地反映了满铁大连图书馆的性质和服务方向。

“满铁大连图书馆期望不仅在内部工作中充实，而且更进一步促进社会融和，为这样一种精神，普及而尽全力奋斗。”（摘译自《满铁图书馆》）因此他们除了一般的图书借阅外，还举办了很多社会活动，以促使图书馆工作与社会进一步“融和”。

该馆自1918年正式命名之后，日本的全国图书馆大会曾两次在大连召开。第一次是日本国第十五次全国图书馆大会，由日本图书馆协会与满铁共同举办，于1920年5月25日至6月5日在大连召开。出席这次大会的人员共85名，其中日本国内的图书馆工作者55名，朝鲜2名，满铁所属图书馆28

名。此外还有中国关内的图书馆工作者 20 名。这次大会历时十二天。在大连开幕后，又到沈阳、汉城（当时的朝鲜铁路线也由满铁管辖）进行过所谓学术讨论和业务交流。他们把这次会吹捧为“东方大会”。即此一端，已可见日本侵略者是将其控制下的满铁图书馆事业纳入了所谓的“大东亚共荣圈”的侵略计划之内了。

第二次是在 1937 年的 6 月 3 日至 10 日，是日本的第三十一次全国图书馆大会。仍由日本国图书馆协会与满铁地方部主办。出席的人共二百一十多名，其中日本国内的图书馆界人士和工作者 140 名、朝鲜 35 名，关内华北及东南地区也有多人参加。日本图书馆协会理事长坪谷善四郎、满铁大连图书馆馆长柿沼介参加了大会。这是一次被吹嘘为“空前的盛会”，大会照例于大连开幕后，又分别到沈阳、长春举办学术报告、图书展览。大连馆参加展出的宋版、元版、明版、手稿、图绘、版画、名家书札等名贵书稿二百一十九种。大会最后在哈尔滨闭幕。会议期间，当时的“关东州厅”、“满洲国文教部”、“奉天省长”、“奉天市长”、“新京特别市市长”都分别接见并设宴招待了全体与会者。

以大连图书馆为中心，举办规模较大的图书馆会议已见于上述二次。一些地区性的学术会、业务会、学习会和一些综合性、专题性的书刊资料展览会，则经常举行。每举行一次，都编有专题或综合目录。现将历次书刊资料展览会、学术讲演会列表如下。

年月	内容	备注
大正 13 年 11 月 (1924.11.5)	图书展览(展出有关 满洲蒙古图书 300 种)	① 举办三天，参观者 18017 名。 ② 不见存目。

大连文史资料第一辑

大正 14 年 11 月 (1925.11.5)	拓片陈列展览(212 种) 金石参考资料(100 种)	① 办三天, 参观者 1288 名。 ② 展出《皇甫府君碑》等珍品颇多。 ③ 存目。
大正 15 年 11 月 (1926.11.)	满蒙研究资料展览 (700 种)	① 举办三天, 参观者 1007 名。 ② 不见存目。
昭和 2 年 11 月 (1927.11.3)	东洋美术研究资料展览 (800 种)	① 举办三天。 ② 不见存目。
昭和 3 年 9 月 (1928.9.9)	托尔斯泰百年诞辰纪念图书 展览 (400 种)	① 举办三天, 参观者 275 名。 ② 不见存目。
昭和 4 年 6 月 (1929.6.9)	中日文化研究资料展览 (200 种)	①举办六天, 参观者 830 名。 ②不见存目。
昭和 4 年 6 月	黑田源次博士讲演会讲题: 《十八世纪日本、中国以及 西欧在文化上的结合》	
昭和 4 年 11 月	中国民族研究资料展览	①举办三天, 参观者 830

(1929.11.9)		名。 ② 不见存目
昭和5年5月	罗振玉讲演会讲题：《本朝学术源流概论》(共七讲)	① 30年5月18日开始，每月的第一、第三两周和星期日举行。连续七次。 ② 原文存见。
昭和5年10月 (1930.10.30)	中国地图展览(展出中国舆图451幅)	① 举办三天，参观者517名。 ② 存目。
昭和7年5月 (1932.5.13)	明末清初来华宣教者著书展览	① 举办三天。 ② 展出十七世纪明末清初从欧洲派遣来中国传教的利玛窦、南怀仁、汤若望、朗世宁等的有关天文、历史、地理等著作200余种。 ③ 适值“国联调查团”来东北调查有关成立伪“满洲国”问题时来馆参观，同时，展出抗日传单百余张。 ④ 不见存目。
昭和8年7月 (1933.7.21)	染色工艺图书展览	① 举办二天。 ② 不见存目。
昭和9年10月 (1934.10)	热河照片展览 (400种)	① 举办三天，参观者1082名。



		② 不见存目。
昭和 10 年 11 月 (1935.1.1)	华北文献展览(500 种)	① 举办四天, 参观者 516 名, 并在铁路沿线进行巡回展览。 ② 不见存目
昭和 11 年 3 月 (1936.3.9)	日俄战争纪念展览 (600 种)	① 举办四天, 参观者 7240 名。 ② 不见存目。
昭和 12 年 6 月 (1937.6)	图书展览(展出宋、元 版、名贵书稿 219 种)	① 存目。

从上表所列的展览内容, 不难看出满铁大连图书馆的参考性质。特别是“九·一八”事变后, 对“社会活动”尤为注意。1931 年至 1932 年间, 他们联合了“全满”二十四个图书馆编纂了《满洲关系和汉书标题目录》正编、续编两册, 提供了大量满蒙资料, 作为侵略者的“参考”。

另有一份未见展出但很值得注意的“书目”, 就是 1940 年 7 月编印的《佛领印度支那文献目录》。这份目录是以满铁资料室(秘室)所收资料和满铁大连图书馆所藏, 参照所编的《特殊文献目录》编辑而成。收录古今中外资料 922 种, 是研究东南亚地区的地理环境、政治经济、交通运输、民族宗教、文化历史等重要资料。当时日本已占领印度支那, 正酝酿发动大规模的太平洋战争。这份目录的编印, 显系为其侵略战争服务。

1933 年至 1935 年的三年间，田口稔还以《满蒙文献研究》为专题，结合大连馆藏，连续编写、出版了《フランスに於ける满洲研究》、《满洲に就て何を読むべきか》、《明治初中叶の满洲文献》三个小册子，从历史上阐述、介绍了满蒙研究情况、揭示、提供了对侵略者大有用项的一部分重要的满目文献资料。

(四)

满铁大连图书馆，在图书室时期，工作人员仅有二、三名，三、四名不等，具体负责人是冈松参太郎。1918 年正式建馆后，全馆人员 14 名。1924 年 4 月，增加到 24 名。1931 年规定新定员为 25 名。1936 年改变定员为 43 名，直到 1945 年“八·一五”大连解放。

图书馆下设总务股、司书股、地方股三个业务部门。馆长总揽大权，操纵馆内一切事务。对馆员的要求：“除完成专业性本职工作外，还要接触当地的人，了解每个读者的个别问题和共同问题，使图书馆工作能更好地配合当前形势”。（见《书香》第 26 号：《满铁图书馆的使命》）从建馆到解放共六易馆长

任职年月	馆长
大正 7 年 1 月至大正 8 年 7 月 (1918.1_1919.7)	岛村孝三郎
大正 8 年 7 月至大正 9 年 2 月 (1919.7_1920.2)	唯根伊与

大正 9 年 2 月至大正 14 年 3 月 (1920.2_1925.3)	神田城太郎
大正 14 年 3 月至大正 15 年 3 月 (1925.3_1926.3)	法贵庆治郎
大正 15 年 3 月至大正 15 年 5 月 (1926.3_1926.5)	佐竹义继 (代理)
大正 15 年 5 月至大连解放 (1926.5_1945.8.15)	柿沼介※

※ 柿沼介自 1920 年 2 月起任该馆司务股股长。

1924 年 2 月被派往美国哥伦比亚大学夏季讲习会学习图书馆管理法、目录学、书史学后，又参观、调查欧美国各图书馆情况。于 1926 年 5 月返回，随即调任馆长，直到 45 年 8 月。

1945 年“八·一五”大连解放后，馆内尚留有几名日籍工作人员。留职时间最长的是大谷武男。他于 1953 年 5 月才离馆回国。柿沼介当时也未离馆，只是不做馆长了。馆长一职，由苏联人斯普利普卡担任。

在解放当时，在日本馆长和苏联馆长交接期间，馆藏图书被大量盗运散失与暗自焚毁。宋版图书全部被盗，部分元刊以及稀贵的手稿、舆图和重要的地方文献资料，也被盗走转运甚多。原来存藏的五十五册《永乐大典》，也是这期间丢失的。1954 年苏联列宁图书馆送还我国外交部的五十二册《永乐大

典》，全是原满铁大连图书馆所藏。

1949年10月1日，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之后，满铁大连图书馆随即由我地方政府接管，并命名为旅大市图书馆（现名大连市图书馆）。经清点、整顿后，于1951年8月15日正式对外开放。

## 血泪浸透“碧山庄”

——解放前大连码头工人的苦难生活

刘永才 孙淳夫 陆士聪

二十世纪初期，在大连寺儿沟的南山北麓，盖起了一百八十多栋红砖房子，南北走向共计四排，四周有高大的围墙包围着，这就是日本侵略者为了压榨中国劳动人民，营建的码头工人宿舍，名叫“福昌华工株式会社常住华工收容所”，日本资本家又把它叫做“碧山庄”，但是广大华工却称它为“红房子”。因为在日本帝国主义血腥统治大连期间，这里是一座人间地狱，它的一砖一瓦，都浸透了中国工人的血和泪。所以老码头工人说：“红房子不是用红砖砌成的，而是用中国工人的鲜血染红的。”红房子的历史，向我们展现了一幅殖民地劳动人民遭受日本帝国主义残酷压迫和剥削的血迹斑斑的图画。

—

一九〇五年日俄战争结束后，日本帝国主义取代沙俄在大连地区建立了殖民统治。为了加紧掠夺中国，实现其由来已久的独霸中国的野心，在一九〇六年成立了“南满株式会社。”（以下简称“满铁”）这个殖民公司经营的范围很广，我国东北的铁路、码头、内河航运、煤炭、钢铁等企事业，几乎全都被它所霸占。“满铁”成立后，拚命扩建大连港，边扩建边使用。日本帝国主义将国内的工业品通过大连港向中国城乡倾销，又通过大连港把从我国掠夺的物

资运往日本本土。由于施工装卸双管齐下，码头的用工量急剧增加，日寇便在码头设立了“大连码头事务所”，由日本人相生由太郎任所长。因当时集中工人有困难，就由汉奸包工头曲永坤经营的“申记公司”、李宗之经营的“公记栈”、和王培珍经营的“义和兴”承包装卸车船的任务。后来由于码头业务的发展与扩大，相生由太郎辞去码头事务所长的职务，经向“满铁”申请后，决定收买曲永坤等包工头，将“申记公司”等三家承包组织合并成立“福昌公司人夫配给所”（简称“福昌公司”），从外地招募华工，来解决码头劳动力不足的问题。曲永坤等三人被安插在福昌公司米面供给所，因这个供给所是由三方面合并而成，故取名叫“三合盛”。一九二五年，“满铁”大财阀为了进一步控制廉价劳动力，加强对华工的统治，又投资扩充了原有“福昌公司人夫配给所”成立了“福昌华工株式会社”，下设两个课：一是作业课，管理码头装卸作业等事项；另一个是庶务课，负责人事、生活等事项。“福昌华工株式会社”为了更严密地监管华工，在寺儿沟地区修建了华工收容所，即“红房子”。

“红房子”从一九一一年开始施工，经逐年扩建，直到一九二五年才大体完工。占地总面积为 137,082 平方米，建筑面积约 397.20 平方米，能容纳二万四千人左右，但最多时却住了三万多工人。“红房子”建筑的布局是：北面的正门是二级楼，楼上的亭式建筑物上镶着四面电钟，称为“碧山庄钟楼”，它北临东山町（今为春海大街），楼下的圆门向南是一条甬道，被称为“碧山庄主街”。在“主街”的南端有一片居高临下的平台，这是日本殖民者为了愚弄和麻醉“红房子”工人进行迷信活动的场所。台上建有“天德寺”，供奉着观音菩萨。寺前的钟楼同碧山庄钟楼遥遥相对。寺的东侧是上地庙，寺的东南方建有一座两丈多高的石塔，称为“万灵塔”。寺的西侧有一排小洋房，是华工工头会议堂。在主街东侧第二排房北半部的小洋房，是日本头目、特务、工头统治华工的据点——“华工事务所”，工人称它为“小街门。”事务所对面是调度系的“三合盛”，掌管日用必需品的配给。第四排房南半部的二层洋楼是“碧山庄医院”。整个“红房子”被高大的石墙包围着，东西南北四个门，

平时只开北门，如狼似虎地守卫严密监视着华工的出入。一九二五年上海的“五卅”运动和一九二六年大连福纺“四·二七”大罢工爆发以后，日本帝国主义害怕中国工人阶级的反抗，就将“红房子”的围墙加高了，在东面和南面的围墙上，还架了铁丝网，远远望去，完全象一座森严恐怖的集中营。

## 二

“红房子”里的几万名工人，绝大多数是来自山东、河北等地失掉土地的，或者是在灾荒、战乱而无法维持生活的农民，也有从上海等城市来的失业工人。日本殖民者利用中国的破产农民和失业工人急于找生活出路的心理，派出汉奸工头深入关内城乡，特别到人口稠密的山东、河北、上海等地，用欺骗手段招募华工来大连。在农村，工头们欺骗农民说：“到大连给洋人干活，吃大米、白面、猪肉粉条，住洋楼，有戏院和澡塘，一天挣好几块钱”。

在上海等城市则到处张贴广告：“大连码头招收小工，凡体格壮实，能扛动八十斤的人都能采用。工薪每月金票五元，吃馒头热菜，免费理发洗澡，住楼房宿舍，干满六个月保送回沪，报名者请到虹口华记路”。在招工处门口，还散发传单：“儿在大连，不用挂念，码头干活，楼上吃饭，三顿卷子，四顿稀饭”。

当破产农民或失业工人到招工站报了名，领到一双胶鞋，一顶盖有“福”字印章的帽子，或领到一点预支工资的时候，他们就成了失去人身自由的奴隶，被工头们驱赶着强行装上专门装苦力的车船，运到大连码头，集中在“红房子”里，这里的工人除骗招来的外，也有一部分是从东北各地抓来的劳工，还有一些是在扫荡解放区时强拉来的青年农民。

据《三十年概要》统计，当时大连港工人的数字为：

年别 \ 工人数 项目	最少	一般	最高
一九二五年	6, 000		14, 000
一九三六年	9, 000	11, 000	15, 000
一九四四年			35, 000

这些中国工人一年到头不分昼夜，象牛马一样被迫为日本帝国主义转运大量侵略和掠夺来的物资。据当时福昌华工株式会社的董事长相生由太郎在《支那之苦力》一书中供称：“经营中的大连码头，每年吞吐一千万吨以上的货物，全部是用‘支那苦力’装卸的。”“红房子”工人付出的是血和汗，换来的却是饥饿、鞭打、凌辱和死亡。他们吃的根本不是什么“大米、白面”、“馒头、热菜，”而是豆饼坯、橡子面、咸菜、大锅清水汤。不少人因吃不饱，只好把来时仅有的一点行装典当或卖掉，买点食物充饥。衣服典当卖光以后，只好拣些草包、麻袋片遮体御寒。华工宿舍都是四层床铺，坐在床上都不能直腰，每人平均只有一尺多宽的位置。工人们身下铺着草包，头下枕着半截砖头，身上盖着麻袋片，两腿一蜷就睡。冬天，工棚里不给生火取暖，寒冷刺骨，象个冰窖；夏天，蚊子、臭虫成群，咬得工人彻夜难眠。这种非人的生活，使无数工人染上重病不治而死。据统计一九四〇年从上海招来的三千名华工，仅二年时间就死了两千七、八百人。

### 三

日本殖民当局对招募来的华工，实行严格的审查，在“关东州劳务协会”里，每个华工都要先行登记、编号，还要留下照片和指纹，然后才发给“劳务



票”。他们为加强对码头和“红房子”工人的控制、镇压，还在大连港建立了五个特务分支机构：

1、“大连宪兵队埠头分遣队”。成立于 1939 年 12 月，它是一个从事情报、军事警务活动的专门组织，下设五个秘密情报组，和许多密侦联络员，以强化特务统治。

2、“满铁大连埠头局整备室”。成立于 1938 年，以“自体防卫”为主，进行情报和保卫等特务活动。该室下设二个科：一科包括动员计划系、防空系、庶务系、警备系。二科包括防谍系、情报系、消防系。

3、“大连水上警察署”。是在 1925 年，由一个水上派出所扩大而成立的，主要从事情报、港口控制、警备巡视等特务活动，警察署下设：警务系、特务外事系、保安系、司法系、执行系，设在码头各作业区里的派出所十二个。

4、“满铁调查部弘报科”。成立于 1936 年，是以搞新闻报导为掩护从事特务活动的机构。

5、“满铁警护军出張所”。

日本帝国主义建立层层迭迭的军、警、特机构控制大连码头还嫌不够，在“红房子”的统治中心“事务所”里也设立了监视系，作为特务机关的外围组织（由满铁大连埠头局整备室二科领导）。

日本军政、宪、警特务机关的特务、警察、刑事和监工除了亲自监视工人的行动外，还在船上、宿舍、码头现场到处建立特务网，收买工头，发展“眼线”；派特务打进工人内部，搜集工人及其家属中的反满抗日言论。在“红房子”里设立查信站，凡是邮到“红房子”的信件，或由“红房子”寄往外地的书信，都要经过检查。

在“红房子”里“福昌华工株式会社”按乡土、亲朋关系把华工聚集在一

起，每五十至六十人为一个华工班，设立一名华工头进行管理；此外，还有“二头”、“先生”各一人，“二头”是具体领导干活的，“先生”是管住的，日本帝国主义者供认，这种工头制是“依据资本主义集中管理和封建时代亲分乾分关系综合起来”，搞的所谓“合理劳动统治制度”，既可以掌握中国工人的“民族心理”，又可以“防止劳资纠纷”（见“福昌华工株式会社”中岛国雄编《碧山庄》一书）。

“红房子”工人在日本鬼子、汉奸工头的统治下，言论和行动处处受监视，特务们如果发现了所谓“不良华工”，或者发现谁有不满、反抗和逃跑的迹象，就马上抓进刑讯室吊打、灌凉水、上老虎凳，严刑逼供，或者送进监狱。据敌人档案记载，日寇“码头宪兵分遣队”在一九四〇年一次就疯狂逮捕刑讯工人三百多名。

## 四

“红房子”工人的劳动时间，每天在十二个小时以上，还要经常被强迫搞突击装卸。星期天不休息。规定春节、仲秋、端午等节日为休息日，但工头却利用这时间让工人为他们做私活。平日每天清晨，当碧山庄钟楼的电针指向四点的时候，天德寺的钟声就当地响了起来，这是催逼工人起床上班的警号，工人管它叫“催命钟”。钟声一响，一群手执文明棍和洋搞把的工头、监工，就象恶狼一样扑向每栋工棚，连骂带打地逼着工人上班。工人从窝棚里走出来，他们一天的命运怎样，是无法预测的。那时被称为“东方名港”的大连港，没有机械化设备，没有任何劳动护具和安全设施，所有装卸车船的物资全由工人肩扛挑抬。一个工人要挑三百多斤重的煤筐，或者扛九块豆饼（每块四十六、七斤），四个人要抬八百斤重的麻袋。整天劳动在又高又窄又险的桥板上，真是一步一颤，被砸死砸伤或掉到海中的事故经常发生。据日本当局1940年4月至1941年3月不完整的统计，在此期间，工伤为三千五百四十六

人，平均每天工伤事故在十人以上，对于这种情况，日本头目却满不在乎地说：“中国苦力大大的有，死几个不要紧的。”

工人们还经常受到日本监工和汉奸工头的辱骂和殴打。老工人刘洪斌控诉：“有一天，我扛了一整天二百斤重的豆包，到了傍晚，又饿又累，不镇把豆包掉在地上，日本监工看见后，举手打了我一个耳光，因为我用手挡了一下，监工就让我立正站着，用带钉的皮靴猛踢我的左腿。棉裤的花絮被踢飞了，腿上的皮肉被踢破了，后来我左腿上就留下了一条三寸多宽、七八寸长的紫色伤疤。”

现在的海港第十三号门，是当时的第三东门，工人称它是“鬼门关”。“红房子”工人每天上下班从这里进出的时候，都必须解开衣扣松开裤带，把手举到脖子后面排成长长的队伍，由把门的日本人、汉奸特务搜身检查，日本鬼子看谁不顺眼，不是毒打，就是罚举一桶水，还得跪在铺满石子的地上，时间长了，手举不动，水就洒在身上，如果是冬大，就冻得满身是冰。

“红房子”工人所受的剥削十分残酷。工人装卸货物，货主支付的装卸费，“满铁”要扣除一部分，“福昌”公司也要扣除一部分，而且还用造假账的办法蒙蔽工人。当的福昌公司有三本账，一本是记码头装卸工作量的账，这是实数，另一本是账房先生自己记的账，工人装卸三百吨货物，他却记上二百五十吨，弄虚作假，苛扣工人。还有一本是给工人开饷的账，经过层层克扣以后发给工人的一点点微薄的工资，工头还要扣去十分之一，因为日本当局规定，工头是“精神劳动者，他们不参加体力劳动，收入出在工人身上。“红房子”不是按月开饷，而是每年的五月节、八月节、春节开饷。工人平日没有钱吃饭，只好到工头开的食堂去吃，一顿饭是两个橡子面窝窝头，加上两条咸菜和一碗清水汤，这样的伙食，每月的固定饭钱是七元六角。工人没有钱换季，只好到工头开的“三合盛”商店去挂账，三元钱的东西，账上能记五元钱。在

这样的层层盘剥下，工人拚死拚活干了一年，多数人反倒欠了还不清的阎王债。

由于工人劳动强度大，在生活上不能维持最低的温饱，许多人很快就失去了劳动能力，被工头踢出去，流落街头，沿街乞讨。在当时的春海大街和寺儿沟桥头的便所里，每天都有十几具冻饿而死的工人尸体。

“福昌华工株式会社”在“红房子”院内设立的“碧山庄医院”，实际上是一座杀人不见血的魔窟。这座医院的规模不算小，设有内科、外科、化验室、治疗室、药剂室、炊事场和停灵室等，人员有百余名。医院的院长、医务主任等重要职务都由日本人担任。这里看病有一个原则：合算的，也就是能很快治好，能继续供日本殖民者压榨的，就治一治。不合算的，即不能很快就治好的，就干脆给治死。工人的胳膊、腿被货物砸伤进了医院，日本大夫不问青红皂白一律锯掉，重病工人进了医院。被日本大夫打上一针“催命针”。还没有等到断气，就被装入活底棺材中，扔到荒郊野外，让鹰啄狼撕。

1943年3月至6月，“红房子”发生伤寒病，医院不进行抢救，却用冷水把病人冲洗后关进屋里“观察”。在短短几个月内，就死了三千五百二十多人。平均每天死十六个半人，最多时一天死一百六十六人。所以工人们把碧山庄医院叫做“阎王殿”、“杀人场”。

## 五

日本殖民者在对“红房子”工人进行残酷的政治压迫和经济剥削的同时，还竭力利用宗教迷信活动，愚弄、麻醉中国工人，企图消除工人的反抗。

每逢初一、十五，日本监工和汉奸工头都要带头到天德寺进香叩头。一九二七年，“福昌公司”还以全体工头的名义送去一块写有“佛光普照”四个字的巨匾。在天德寺的经词里，经常可以听到这样两句话：“前世你欠如来债，今世贬你做牛马”。通过宣扬这种“因果报应”的迷信思想，力图使工人相

信，他们今生过牛马不如的生活，是自己前世造孽的结果。日本人和汉奸还在红房子里发展儒教徒，据中岛国雄编的《碧山庄》这本小册子里记载，“红房子”里儒教徒的数量，仅次于佛教，多于基督教和回教。

日本殖民者为了掩盖他们残害中国工人的罪行，特地修建了一座“万灵塔”。塔基石高为 2 公尺，塔身高 6.36 公尺，塔底下有一个两间房子大小的地洞，里面装满了写着死难工人名字的小木牌。每年阴历七月十五“鬼节”这一天，“福昌华工株式会社”都要在“万灵塔”前搭起经棚，四周速进各种有布幡，吹吹打打地“招魂祭塔”。“满铁”，“福昌”的日本头目和汉奸工头，还要穿上黑衣，装出哀容，走到塔前献花圈和“祈祷”。晚上，又把死难工人的名单装在一纸船上，放在海里让它随风飘去，说是“让死者的灵魂，一帆风顺地回到自己的家乡”。日本殖民者和工头们这种笼络人心的伪善的表演，正好暴露了他们的豺狼本性。

## 六

日本殖民者对“红房子”工人政治和经济上的压迫和剥削，再加上思想上的麻醉，并没有使中国工人屈服。他们通过怠工、罢工、破坏设备、拖延装卸时间、惩罚监工、工头等各种形式，对敌人进行斗争。

一九三二年，中国共产党码头支部成立后，深入到“红房子”中去开展工作。一九三三年一月，大批日货运到大连，支部发动了抵制日货运动，使敌人受到很大的损失。一九三三年十月，码头支部遭敌人的破坏，但它却在码头工人中撒下了革命的种子，唤醒了工人的觉悟，增强了斗争的信心。

“红房子”工人除了公开地进行斗争外，更多的是利用干活的机会暗中破

坏敌人的军用物资。如一九三五年五月修四号码头时，工人们设计欺骗日本监工，把接钢丝用的铅环一百多个及钢丝绳全部抛到大海里。一九三九年冬季，日寇从东北用火车运来一批有二十五米长的大圆木，是军用船厂做桅杆用的。老工人张银成等在黑嘴子码头卸车时，在敌人眼皮底下，喊着装卸号子，一根一根地把大圆木摔断。他们一会儿在地上垫根道木，把大圆木从一丈多高的车上扔下来，拦腰摔在道木上跌成两截；一会儿，他们又先放大圆木细头，后放粗头，细头着地，粗头一压，圆木又断了。弄得日本监工莫明其妙，无可奈何。

抗日战争爆发后，“红房子”工人炸仓库、烧物资的事件接连发生。日寇为了防止工人的破坏，用铁丝网把工人隔了几十个作业点，强迫工人集体劳动，集体出入。工人们为了粉碎敌人的阴谋，两万多人汇集成一股洪流，冲出卡子门，奔回“红房子”，喊出了“不拆铁丝网决不复工”的口号，日寇只好把铁丝网拆掉，工人的斗争取得了胜利。

1942年初冬，码头工人王维汉发现有一趟装着大炮、汽车、飞机零件和火药的列车，他冒着生命危险，把一辆汽油槽车的汽油放出来，用信号灯一点，烧毁了敌人的军车，王维汉不幸被敌人抓去，后来牺牲在旅顺监狱。

1943年，四十四号工棚的工人宋文礼、吴殿春等团结二百多名工人，组织了春节大罢工，罢工坚持了好几天，使日本侵略者利用“和山丸”赶运军火的计划破了产。

中国人民在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下，经过前赴后继的英勇斗争，终于赢得了抗日战争的伟大胜利。大连解放以后，海港工人成了码头的主人，“红房子”地区也成了海港工人家属的住宅区——海港大院。时今，“红房子”地区已经旧貌变新颜，昔日“碧山庄”的历史遗迹已不复存在，但是日本帝国主义侵占大连地区，制造“红房子”这样的人间地狱，使成千上万的中国劳动人民沦为奴隶，过着牛马不如的悲惨生活，这种阶级的、民族的苦难，却是我们永远也不应该忘记

的。记住这一段惨痛的历史，可以激励我们更加珍视革命的成果，更加热爱我

们社会主义的祖国，为振兴中华，实现四化而努力奋斗。

## 清末庄河抗捐首领潘永忠

潘世和（潘永忠之长孙）、宋仞千等口述

于志龙 整理

清朝封建统治即将死亡的前夕，即一九一一年前，庄河地区灾民遍布乡里，抗捐等反抗活动连绵不断，日趋激烈。经常活动在大郑、明阳一带的“起大会”<sup>①</sup>（庄河县衙诬之为“起黑会”）会首潘永忠，组织起数以千计的灾民，扩大“起大会”组织，掀起了波及辽南，震动奉天省的“庄河民变”抗捐活动。

潘永忠一八四二年农历十二月二十九日出生于庄河县大郊乡潘店，农民出身。为人忠诚厚道，主持正义。十八岁被当地百姓推举为庙会会首。他在大郑乡大盐场村东北三、四里许的玉皇顶庙组织“起大会”，以控撞钟或羊角号声为信号。百姓们一听到庙里响起当当的撞钟声和紧急的羊角号声，纷纷相聚而来。有时还以传递“鸡毛牌”为信号，一旦发现哪里有土豪劣绅欺压百姓或贪官污吏苛征税捐，“起大会”的人就拿起“鸡毛牌”一传十，十传百，不多时，人们就会扛着抬杆<sup>②</sup>、土枪、二齿、铁锹、锄头等，集合在指定地点，听从会首吩咐。

光绪年间，曾有彭强等两名匪徒，经常出没于庄河高阳、明阳、城山一带，抢劫民财，奸污妇女，百姓深恶痛绝。潘永忠为民除害，便带领“起大会”，将这两个罪恶累累的祸害捆绑起来，沿屯示众之后，装进了麻袋，抛进海里，百姓无不拍手称快。潘永忠的名字在民间越来越广泛地传颂着。村落邻里之间不管出现了什么大事小情，也都愿意请他来“断官司”。高阳寺（今高阳乡）发生一起邻居纠纷事件，双方撕打中死了一个人。县衙的廷大人前来现场审案，面临着双方据理相争的激烈场面，廷大人束手无策。潘永忠赶到，敏锐地剖析了案情，给予准确公道地判断，使双方都心服口服，为廷大人解了围，旁观者



有口皆碑。嗣后，廷大人一则出于内心佩服，二则摄于潘永忠的名高望重，便主动接近潘永忠，并同他结为拜把兄弟。从此，潘永忠的威望越来越高，名声愈来愈大，当地百姓出自于对他的敬佩，称他为潘二爷。

潘永忠年届古稀时，清王朝已摇摇欲坠。朝廷对外丧权辱国，对内残酷镇压百姓。一九一〇年夏秋季节，全国南北，洪水泛滥，东三省更是水灾遍地。庄河、凤城区域“灾民流离失所，饥寒煎逼”。贫苦百姓除了缴纳清政府各种捐税之外，还得承担东三省总督赵尔巽巧立名目的附加税款。同时，地方官吏亦借机勒索，雁过拔毛，鱼肉百姓。一时间，食盐税、鸡鸭税、河防税以及厘捐、称斗捐等名目繁多的苛捐杂税接踵而来，几乎无物不捐，无物不税，如此横征暴敛直延续到一九一一年夏秋之交。天灾税灾使得百姓度日艰难。老幼男女，嗷嗷如鸿，饿殍蔽野，状甚凄惨。走投无路的灾民，纷纷挺而走险，揭竿而起。潘永忠目睹现状，义愤填膺，激起了为民除害的勇气。他把这些分散造反的民众组织起来，扩大了“起大会”组织，掀起了抗捐运动。

一九一一年农历七月十九日，潘永忠聚集了近百名饥饿求食的灾民和“起大会”的人于明阳乡张店、后姚屯两个村庄策动抗税。消息传到县城，知县和衙吏们吓得魂不附体，匆忙纠集官军于当日拂晓前占领界于张店、姚屯附近的山岭，以地形优势，居高临下，向“起大会”群众猛烈弹压。潘永忠怒火冲天，首当其冲，奋起反击。“起大会”的另一首领孙长忠率众从右翼杀向官军，胆小狡猾的官兵，闻风遁循，藏于青纱帐中，凭借武器的优越乱枪向“起大会”的人射击，战斗持续到九、十点钟，官军有所伤亡，“起大会”的人也牺牲了三名。这时，巡防队长高疯子带领巡防队从花园口方向气势汹汹地赶来增援官军。潘永忠为了保存力量，避免更大损失，率众转移。官兵趁此机会，相继钻出了青纱帐，像狂犬一样，扑向张店、姚屯两个村庄。绑架十多名无辜百姓，严刑拷打，追查“起大会”名单，阴谋大批屠杀参加“起大会”的贫苦

百姓。同时，将这两个村庄的四十多间草房付之一炬，只剩下不易点燃的几幢泥盖平房。农民张殿荣家里的一件金丝绒衣裳被官兵抢走，其妻上前阻拦，被官兵开枪打死，张平荣十九岁的妹妹，见此残暴情景，被惊吓而死。屯人张存忠得知房屋被烧，回家看望老母，也惨死在官军的铡刀之下。这一灭绝人寰的惨案，顿时传遍全县，贫苦百姓对官军的残暴行为莫不咬牙切齿，恨之入骨。为谋求生路，纷纷投奔“起大会”组织，几乎村不漏户，家不漏人。不数日，参加“起大会”的人遍布全县乡里。在思想上和组织上为更大规模的抗捐斗争做好了准备，打下了基础。

同年中秋节前夕，潘永忠组织了四千参加“起大会”的百姓，有的扛着抬杆、土枪，有的荷着农具，组成一支声势浩大的抗捐队伍。大家自筹活动资金，自备食物，风餐露宿，扎营于徐大岭，以泰山压顶之势层层包围了庄河县城，要求县衙立即作出废除榨取民脂民膏的苛捐杂税的决定。看守城门士卒和几名企图反抗的衙吏拔身而逃，守城的官军看到摇旗呐喊的抗捐队伍迅即闭门死守，不敢出城。知县等大小官吏个个胆战心惊，龟缩于密室深屋，此刻潘永忠胸中早已燃起了按捺不住的怒火，架起抬杆，炸开县衙大门，冲进厅府。大小官吏如同丧家之犬，俯首投降。知县表面上只得当众宣布废除苛捐杂税，以苟延残喘。围城百姓便信以为真，解除了包围，各自回到家园。

围城百姓虽然暂时散去，但知县等大小官吏却愈来愈感到潘永忠是摆在他们面前的一个大隐患，如不铲除势必导致更大的抗捐风潮。于是，他们一面秘密飞禀奉天省，请求增派官军来庄河镇压。一面磨刀霍霍纠集地方官军联合尖山乡绅倪林一伙（自美其名“起红会”）相对抗，竟挑起了令人痛心的贫苦百姓之间的相互殴斗，甚至互相残杀。所谓的“废除苛捐杂税”之诺言，只不过是施展了欺骗镇压抗捐的缓兵之计。潘永忠等正拟重整旗鼓，杀回县厅时，东三省总督赵尔巽也正为以潘永忠为首的“辽东大患”、“伏莽闹乱”、“庄河民变”而惶惶不安，并自下令，出示所谓《按名捕获庄河、复县匪首札文稿》，文中说：“经查访闻各属著名凶犯若干名，务须按名弋获，不准有一名漏网。如其敢于拒捕，格杀勿论，倘用兵力不足，就此商明王道安中<sup>③</sup>，酌拨

留庄军队，向往协助。总期匪去，是为至要。”潘永忠被列为庄、复、岫三县的通缉名单首位（名单、札文稿附后）。县衙吏们得到了通缉札，壮胆生威。为震慑百姓，扑灭抗捐风火，又把以王土豪为首的一支官军调进庄河助战。顿时红崖乌云密布，杀气腾腾。潘永忠面对着势力雄厚的官军，为了避免或减少百姓的伤亡，便偃旗息鼓，俟机再起。潘永忠一行，几经运筹，最后率领高连生等六、七人，取道大邓乡东南海口——张家咀，乘坐木帆船，在海上昼夜漂泊辗转四、五天，行至碧流河口，星夜下船登陆。拟直奔家园，再次策动“起大会”，公开对抗官军。不料走到尖山后复元屯被叛徒曲长山（曲系花园口曲沟人，起初曾参加过“起大会”，后来叛变，投靠倪林。）出卖，遭到当地土豪倪林一伙暴徒的衔尾直追，此时潘永忠虽连日泻吐，体虚无力，但他为民除害心切，立即命令其他几个人急速突围，留他一人断后。高连生不肯撤走，同潘永忠互相掩护，拼命抵抗。最后，终因寡不敌众，潘、高二人同落贼手。途中，高连生趁上便所之机，松开了捆绑的绳索侥幸逃离。

翌日，倪林一伙凶恶狠毒的暴徒，为向县衙门请功领赏，用尽残酷手段，将潘永忠紧紧捆绑，两手分别钉在大车的两个厢板上，押往庄河。一路上，潘永忠面对着张牙舞爪的暴徒，大义凛然，忍着令人难忍的疼痛，蔑视着官军。沿路百姓见此情景，无不忍恨泪下，更加仇恨倪林一伙暴徒及一些贪官污吏。潘永忠被押进了县衙，一九一二年农历八月初一终于在庄河县城慷慨就义。④

人们敬仰的潘永忠被惨杀了，他所领导的抗捐斗争也随之转入了低潮。但却在庄河、复州、岫岩一带埋下了抗暴斗争的火种。不久，革命军的关外都督蓝天蔚组织一支北伐军，以邵兆中（字子峰）为革命协统东路指挥官，由山东引革命军六百，自庄河西部沿海尖山子蚊咀登陆，欲同潘永忠接头，继续肃清清王朝在地方的残余势力。可惜潘永忠此时已英勇牺牲。蓝天蔚赞其忠烈，并亲题挽联以悼之：

永世以谋生，想公生已臻老年，犹有满腔热血。

忠臣不怕死，惜君死未得正命，空留一片冰心。

潘永忠死后，四弟潘苏忠接着站了起来，力扫封建残余。革命军首领兰大蔚为扩大力量，遂即联合原抗清武装队伍潘苏忠、隋守珍和复州的顾人宜等，聚集百姓，同阳奉阴违的地方官军在庄河复州一带进行了几次规模较大的战斗，终于歼魁释从，俾百姓稍获休养生息。

距今潘永忠已就义七十多年，但歌颂他抗捐事迹的歌谣仍在民间流传：

复来社⑤很有名，出了个英雄潘永忠。

一心组织“起大会”，民众蜂拥来响应。

徐家大岭扎下营，坚决攻打庄河厅。

头前走着火枪队，二人抬杆红布蒙。

队伍浩荡好威武，三千四千还有零。抬杆呼通炮声隆，打开清府衙门厅。

吓得衙吏手脚乱，钻进深屋不吭声。

.....

注：①起大会：清末庄河地区贫苦百姓反抗暴横、抵制苛捐杂税自动组合起来的农民组织，当时几乎遍布全县各地。人们还习惯把活动在庄河以西的大郑、明阳、尖山一带以潘永忠为首的“起大会”，称为“西大会”，把庄河以北和庄河以东的“起大会”称为“北大会”和“东大会”。

②抬杆：大型火药枪。

③王道安中：清末，分一省为数道，并设置道台（多兼兵备衔的官职名称），管辖府、州；道台系省以下府、州以上的高级行政长官。当时的庄河、岫岩、凤城一带曾划为奉天省东边道的管辖区域，文中的“王道安中”是指东边道的高级行政长官王安中。

④潘永忠长孙潘世和家中保存的神主碑上注明：潘永忠是道光二十一年十二月二十九日子时生；民国元年八月初一午时卒，享寿七十一岁。

⑤复来社：地名。清时称当今的庄盖公路以南，庄河以西直至碧流河沿岸的区域为复来社。

附：赵尔巽为按名辅拿庄复“匪首”事的札文稿  
宣统三年八月十三日（一九一一年十月四日）  
缉捕名单：岫岩州庄河界：潘永忠、隋守真  
颜广运（花园口）、于文溪（汤儿府）、于振声、  
姜善良（姜家窑）、张义忠、  
王永清（庄河东鲍家码头）、王永和、  
汪欲春、孙福义、戴吉盛（戴家沟）、时运生（时家村）。  
（抄自奉天省公署档）

## 响应辛亥革命的复州民军

顾崇恩口述 复县政协文史组整理

复州位于辽东半岛的南端，中日和日俄的两次战争，都在这里摆过战场，复州人民深受其害。战后，丧权辱国的清朝政府，不顾人民的死活，疯狂地向人民征收苛捐杂税，当地的贪官污吏，乘机敲诈勒索；清兵勾结土匪，到处行抢，民不聊生。因此，激起了人民反清的怒火，愈烧愈旺。为了保卫地方和身家的安全，各村自动地联合起来，成立联庄会，组织民军队伍，进行抗捐抗税斗争。复州民军就是在这内忧外患的历史条件下产生的。

复州民军首领顾人宜，祖籍山东蓬莱，康熙五十四年迁到复县三区顾家屯（今新金县皇台乡）。顾人宜幼读私塾，后在家务农并学习针灸医术，为群众免费治病，贫民借贷，无不相助，为人忠实厚道，乐善好施，在顾家屯周围的山村里，颇有威望。因此，他在一九〇五年被选为联庄会的会首。他的兄弟有顾人邦和顾人敏等。顾人邦受私塾教育，身强力壮，勇猛善战，负责指挥民军对敌作战。顾人敏聪明机智，善于言谈，离开私塾经营商业，曾任瓦房店砬窑煤矿总办。因工作往来于省城和北京等地，在沈阳结识了张榕、蓝天蔚、商震、宁武等同盟会员，接受了民主革命思想。在民主革命不断发展的鼓舞下，他与顾人宜和顾人邦等于一九〇八年参加了同盟会，顾人宜当了会首后，他就成了参谋。当时地方群众，称他们兄弟为顾家三杰，并向联庄会送“乡闾保障”匾额一块。

顾人宜参加同盟会以后，就改变了联庄会的性质，由自卫走上了民主革命的道路。民军剪掉辫子，青巾包头，并在村中竖立起青色金龙大旗（当时群众称联庄会为黑会，即因此而得名）。雇来铁匠，制造火铳和大刀，还购置一些俄式步枪，不出几日，就组成百余人的民军队伍，与清政府展开了针锋相对的斗争。

一九〇七年二月，清政府为了加捐加税，又进行清丈山林荒地。顾人宜集

合数百名群众，拒绝官吏入境清丈，当时声势很大，影响全省，各地群众皆起反抗，终于迫使清朝政府停止丈量活动。

一九一〇年初冬，民军侦知城子坦税官，往复州城送交税款，并有十名骑兵护送。民军王奎、顾崇德、王义汉三人，预伏在水门子东边王岗岭的山沟里，税官乘马车来到以后，王奎冲向车厢，抓住税官衣领，枪堵胸口。命其撤退护兵，税官慑于民军的威力俯首从命，并交出搜刮人民的两箱银两。

时隔不久。四名清兵路过顾家岭，民军发现立即追歼，击伤一名号兵，其余潜逃。从此，复县民军威望大震，清兵和税官再也不敢进入顾人宜的管辖区域。

东三省总督赵尔巽，闻风震惊，积极进行镇压，于一九一一年春，派奉天省清乡督办王顺臣（绰号王屠夫），带领清兵，来到城子坦福源姓隋的家里，以议事为名，“邀请”周围会首赴会议事，枪杀了高屯会首高丕玉以及徐家屯会首徐吉亭等人。这次顾人宜也在“邀请”之内，因识破敌人诡计未去赴会，得免于难。王顺臣因慑于顾人宜民军的威力，顾虽拒邀而不敢触犯，杀害几名反清会首以后，便溜回省城交差。

一九一一年十月十日武昌起义胜利消息传到奉天城以后，同盟会员立即分赴各地发动民军响应革命。邵兆中（原马龙谭右路防营营长，省讲武堂学员）、杨大实（日本警察学校毕业，复县警务科长）、尹锡武等同盟会员，先后带领部分军人来到顾家屯，扩大民军队伍，增加了骨干力量。这时复州民军，已成为同盟会在奉天南路的一支强大的武装队伍。

十一月二十九日（农历十月初九）顾人宜命令顾人邦，带领民军百余人，攻击复州三区水门子（今新金县莲山乡），与清兵巡防右路第一营战斗一整天，清兵被打得落花流水，狼狈逃窜。巡防营的何哨官，被顾人邦击中腿部落马，正欲刀劈，民军姜友山为义气抱住顾人邦的双手说情，何才幸免一死，但

腿已断，释放回城，后成为瘸子。这次战斗，民军无一伤亡，胜利地打响了响应辛亥革命在东北地区的第一枪，鼓舞了岫岩、凤城、辽阳、海城各地民军的革命斗志。

不久，南京革命政府任命蓝天蔚为关外都督府都督，以驻烟台关外民军和上海两个商团营组成北伐军，分乘“海容”、“海圻”、“海筹”、“海琛”四艘军舰到东北，预计于辽东半岛尖山口登陆后，与复县民军会合进攻辽阳。赵尔巽闻讯后，立即派巡防营第三营中哨陈、李两头目，携带两箱银两拜见顾人宜说：“北伐军来了以后，只要你不行动，政府就把你的民军，改编为省防营第一路军，并任命你为统领”。顾人宜不为金钱职位所动，立即将其扣押。陈、李二头目，为了保全生命，暗中雇人向大辛屯防营送信，不准清兵攻打民军。

为了消灭敌人，给北伐军登路铺平道路，顾人宜于一九一二年二月四日（农历十二月十七日），率领民军四百余人，将大辛屯清兵驻所团团围住。当时清兵住在一户姓孙的地主大院里，民军开枪射击，清兵龟缩院内持枪不动，双方对峙一昼夜，第二天拂晓，清兵集中火力突围，狼狈逃窜。

二月七日（农历十二月二十日），关外都督蓝天蔚，委任商震为关外军总司令，以顾人宜为关外军第一镇镇统，顾人邦、邵兆中为第一镇协统，顾人敏、杨大实、张君王为参谋，李文海、顾崇志、尹锡五、张嘏臣为标统，李祥海为炮队营官，孙天发为民政部长。这时民军已发展到一千余人。为了迎接北伐军，他们大造声势，以壮军威，在村庄的周围，以及北伐军预计登陆的海滨，遍插民军大旗，声势之大轰动辽南。

赵尔巽诱降民军失败，便露出狰狞面目，派省巡防营右路用统冯统领（传说是冯麟阁），带兵数千人，围剿复县民军。扬言复县东部民变，从顾家屯以东，到碧流河以西，全部进行屠杀。顾人宜闻讯后，于二月十四日（农历十二年二十七日），率领民军于水门子北坡子店和曲家店一带，迎头痛击清兵。民军作战非常勇猛，但武器较差，仅有一门大炮，发出一棵炮弹打死敌军七人后，炮即卡壳，此次战斗稍为失利。战斗开始不久，天气忽变，大雪纷飞，一



夜之间积雪数尺，道路堵塞，交通断绝。双方在风雪中对峙两日之后，敌人后方供应不及，更怕民军袭击遭受歼灭，便匆匆撤退。一九一二年二月十二日，清帝溥仪宣布退位，实行共和，战争遂后停止。

接着，关外民军奉命开在烟台整编，顾人宜到烟台后，被任命为关外军第一军司令。民军到达烟台不久，都督府被撤销。袁世凯歧视民军，派其走卒军事参谋曲同丰到烟台，以协助民军整编为名，将民军由军缩为师，后又由师缩为旅，到一九一三年春，全部遣散，顾人宜亦由烟台还乡为农。

复州民军从建立到解散，虽然不过几年时间，但他们在组织联庄会抗捐抗税，打响了辛亥革命在东北第一枪，对配合北伐军登陆，推翻清朝政府做出了一定的贡献。

## 有关柳亚子先生及先父李汝航的几首诗

李启文

先父李汝航，字散木，湖南湘乡人，早年长期羁留吴江一带，因喜金石文字、吟诗作画，结识柳亚子等先生，并经亚子先生介绍加入南社，因与亚子等先生有较深的文字之交。先父生前几次叮嘱，要我把他精心保存的几首他与亚子等先生的互相赠答唱和的诗抄录下来，有机会可公诸于世，以见当日情景，亦可提供一点文史资料。

时光荏苒，去先父背世已逾二十载，其嘱未能如愿。近日偶翻书筐，见当日抄录的诗歌数首，牵动情思，眷抄于下。有原注者一字不易以存原貌，有些地方我稍加一点说明。

丁巳除夕汝航先生属题 亚子柳弃疾

典型前辈数江乡，瘦石疏篁最擅场。

便当兰茝遗楚客，好教风雨忆潇湘。

※ ※ ※ ※ ※ ※

三绝高名海内崇，使君谈艺笔如虹。

丰姿肯比灵酥柳，清绝江头绿一丛。

丁巳，一九一七年。擅场，压倒全场，胜过众人。杜甫《冬日洛》：“画手看前辈，吴生远擅场”。三绝，集于一人或一时的三种卓越的技能，一般指诗、书、画。

为巢南画“垂虹亭长图”

渔父重翻本事新，烟蓑笠映江春。

垂竿自具屠龙手，漫拟霜天斫鲙人。

此诗为先父一九二二年元旦作。巢南，陈去病先生，字巢南，一字佩忍，江苏吴江人，南社领导人之一，诗人。

亚子先生申秋社之约诗

云散风流一叹欷，主盟惭愧负盘匱。（1）  
纸窗竹屋功初拓，画舫清尊计已非。  
门第故侯容我寄，（2）笙歌圆月为谁肥？  
飞书预缔明秋约，壁垒重张酒国旗。

诗人自注（1）余自署酒社长。

（2）新居为清宫傅周元理故宅。

此诗为柳亚子先生一九二二年秋所作。预约一九二三年南社诗人聚会。

次韵答亚子申秋社之约

癡云抹日带微欷，凉透荒斋注水匱。  
冷澹风光谁可遣，飘零琴剑计全非。  
笙歌久负朋尊约，著述频添枣本肥。  
好诗习池醉山简，重张壁垒看扬旗。

此诗为先父一九二二年秋给亚子先生的答诗，欣然应诺参加南社聚会。

寿巢南五十

种分丹穴属高秋，豪气元龙百尺楼。  
屈、宋才华堪仆命，吴、潘伟烈许神游。

扶輿永曜中天日，介雅新添大海筹。

得笔开颜有才女，好斟北斗佐吟讴。

此诗为先父一九二三年作。

#### 题柳亚子“分湖旧隐图”

十里分湖夕照横，有怀古涕沾纓。

碧梧苍石高人梦，芳雪疎香才女名。

一样风骚添韵事，无边云木动幽情。

水村旧话犹堪记，画笔南溟未易庚。

此诗为先父所作，见《南社诗集》第一册第三百八十八页。分湖为柳氏故居。

#### 为柳公望写“分湖访旧图”二首

旧隐壶天兴不孤，流风终古被菰芦。

却为君家增韵事，重摹清景写分湖。

※ ※ ※ ※ ※ ※

我亦扁舟访旧来，有灵祠宇长蒿莱。

雪泥爪印分明在，忍向黄垆赋大哀。

此诗为先父一九二三年作，柳公望系柳亚子先生胞弟。

#### 送迦陵韵赠亚子

词华妙拟合罗丝，细嚼真堪举百卮。

感逝近抛迁客泪，复仇竞树党人碑。

漫筹心史抑孤愤，几见太阿任倒持。

解崇未能资理遣，低徊无限意难支。

此心为先父一九二三年作。迦陵，周迦陵先生，南社诗

人。

失笑一首和散本

失笑皮囊裹血丝，头颅一掷酒千卮。

黄金倘铸同文狱，华表终刊革命碑。

功罪千古原旦暮，风雪只手要撑持。

凭君莫动王尼叹，乌鹊南飞尚有枝。

此诗为亚子先生给先父的和诗。

## 从髯翁于右任学术琐事

冯树国

一九四三年我在四川铜梁县（距重庆三百公里）的国民党空军入伍生总队工作。因我的一封信札，为当时四川重庆美丰银行总经理康心之（陕西人）见到。康心之颇欣赏我的毛笔字。他与国民党元老，当代的书法大师，髯翁于右任私人交谊甚厚，特地予以引见。

在七月里的一天午后，我由康心之陪同，去重庆上清寺陶园国民党监察院晋见髯翁。髯翁由秘书李祥麟陪同在客厅接见了我们。髯翁精神矍铄，银髯飘洒，态度慈祥，衣着朴素。他听了康心之有关我的工作和学习的简要介绍之后，便耐心地告诉我，学习书法要多读和多临写古人的碑帖，更为重要的是精读碑帖，今人的书法、碑帖亦要多看多临写。把碑帖里每个字的起笔和收笔，整个字的间架结构，全篇书法的气韵，布白及提款印章等都得细心地去心领神会，牢记在心，并在自己的书写中去运用。

这时康心之插话说：“院长，您收下这个学生吧。”髯翁愉快地点头说：“好吧！”。这时我无比高兴地站起来走向髯翁，毕恭毕敬地行了三鞠躬礼。髯翁亲切地说：“铜梁距重庆很近，你可随时来，不用通报，直接到办公室来。”辞别时髯翁亲手送给我他的近著《标准草书》、《于氏乐府》及几本髯翁珍藏的古人的碑帖。并嘱我回去后可多临写《标准草书》，把习作寄给他看。

在会见过程中，我看见髯翁一直用右手的中指和食指在右腿上不断地书写。这不仅表现出髯翁的学而不厌，也是对我的言传身教。

以后我经常去重庆看望他，每次他都写一幅或两幅书法给我。有时我在旁看髯翁作字，他总是在摊开纸及用笔调墨时，即在思索要书写的内容，字的多少，纸的大小，如何安排等，然后是“意在笔先”地一挥而就。看髯翁作字是一种不可多得的艺术享受，这些情景使我至今不能忘怀。

我以《标准草书》为范本的习作，每周都寄去两三张，请髯翁批改。他有时回信，有时就在我的习作上写上批语盖上印章将原作寄回。记得髯翁在有封信里说：“书无定法、多写便佳。”并说他每天在繁忙的工作中也要抽出时间临写碑帖。一次我用文天祥的《正气歌》写了四幅条屏寄去，不久，他就将我的原作寄回，在最后一张条幅的空白处有他的“大致甚好，望时时学习”的亲笔批语，并署名盖印。我所珍藏的许多髯翁的墨迹，不幸均在史无前例的十年动乱中付之一炬了。

一九四五年抗日战争胜利后，国民政府迁回南京，我也经常去南京看望髯翁。

一九四八年秋我被调回陆军军官学校（四川成都），在校长室工作。一九四九年秋校长关麟徵调陆军总部，继任校长是张耀明（陕西人）。九月我随张耀明由成都飞香港准备去台湾。因为我事先未办理入台证明，在香港不能购买去台湾的飞机票。这时正遇上两航（国民党官办中央航空公司、中国航空公司）在港的部分人员公开声明脱离国民党，起义投向共产党。飞往国内的班机全部停止了，于是我逗留香港达半月之久才回到四川。

抵港时在机场即有人告诉我，髯翁在港，住在九龙的半岛酒店，当晚我即驱车前往半岛酒店拜望髯翁。他见到我非常高兴，关心地垂询了国内的局势，我据实向他作了汇报。他听完后只是沉默，没有说什么话。以后只问我住在什么地方，要住多久等。我一一作了回答后，他要我每天早上八点去他的住处陪同他共进早餐。以后才知道髯翁只和两个随从人员住在半岛酒店。

我离港回川，去向髯翁告辞，他沉思了一阵，告诉我说：“你回到成都后，立即通知‘中央社’（国民党的官方通讯社），要他们发个消息，说我不久即由港飞成都。”我听了后非常高兴。我说，请院长在离港前发个电报，我们好去机场迎候。

当我回到成都时，时局变化竟出乎意料之快，成都已面临解放前夕。我根据当时局势估计，髯翁已不可能来成都了。关于髯翁拟到成都的消息我也未通知“中央社”。谁想到与髯翁在港一别，竟成永诀！

今天，全国人民在中国共产党领导下，正在为早日实现四化，统一祖国而团结一心，共同努力。

今年五月初，湖南人民出版社编印了由胡耀邦同志亲笔题签的《于右任诗词集》，《于右任墨迹选》，使髯翁的诗词、墨宝得以展现于国人之前。若髯翁有知，定会捋髯含笑于九泉。



## 一代短跑名将刘长春

邹维豪整理

### “兔腿少年”

一九〇九年十一月二十五日，刘长春诞生在大连市小平岛河口村的一个贫苦农民家里。河口村，三面环山，南临大海，是一个景色秀丽的山村。刘长春的家座落在半山坡上，坡下是一片菜园地，屋后是一条绵延几百米长的小道，山上有数十亩大田。刘长春从小在这里造就了一块好身坯。

小时候，刘长春很受二祖父宠爱，每当二祖父上山开荒、打柴、种地、收割庄稼都喜欢把刘长春带在身边。使刘长春对高山、大海产生了深厚的感情，一上山，就满山遍野地跑。春天鲜花盛开的时候，他能采集到五颜六色，艳丽多彩的花草，夏秋季节，野草丛生，正是野草梅和酸枣成熟的时节，刘长春如饥似渴地寻觅野果吃，常常很晚方归。炎热的夏天，他便和村里的小朋友结伴到三华里以外的浅滩游泳嬉戏。他家的西南角有一块开阔地，一条山间溪流从这里淌过，常年流水不断，每到寒冬腊月，朔风呼啸，河面结成厚厚的冰层时，正是刘长春打滑溜游戏的好季节，一玩就是几个小时，甚至忘了吃饭。

刘长春自幼好动，性格倔强刚毅。一次他兴冲冲地去海里游泳，光着脚一溜烟跑在最前面，不小心踩上个大铁钉鲜血直流，小朋友劝他赶快回家。他一咬牙把铁钉拨了出来，依旧跳进大海游泳去了。八岁那年，他在房前逗小毛驴玩，一会儿扯着驴尾巴不放，一会儿跃上驴背，一会儿又从驴背上跳下。不料，小毛驴突然暴跳起来，把刘长春从驴背上重重地摔倒在地上，左腮被路旁

的树叉戳了个大窟窿，祖父抓一把香灰给按上，久久不癒。刘长春带着伤痛，从来不喊一声疼。吃饭时，有时米粒从窟窿里掉出来，他照常坚持吃饭。大人们看了，对他的毅力无一不感到惊叹。

九岁时，一场瘟疫夺去了他母亲的生命。次年，继母进家，全家搬到沙河口小刘家屯居住。刘长春进入西沙河口大岛小学读书。由于当时小学校很少，学校离家又远，交通不方便，每天上、下学要往返四次，步行二十余华里，他天天早出晚归，一路上总是跑步赶路。一九二三年刘长春上小学五年级时转入沙河口公学堂（现在的沙河口中心小学校），这时的刘长春长的身材高大，粗壮有力。学校每年春、秋季都要举行全校性的田径运动会。在这一年举行的“关东州陆上运动大会”上，公学堂的主要竞争对手是日本大正寻常小学（高级小学）。刘长春参加了 100 米、400 米、4X100 米接力、4X400 米接力的比赛，他出奇地取得了这些项目的第一名，成绩异常突出，百米跑出了 11 秒 8，400 米的成绩为 59 秒。一九二五年日本人办的大正寻常小学举行秋季田径运动会，邀请市内的中国人学校参加。在 4X200 米接力赛中，刘长春给人留下了难忘的印象，一同参加这项比赛的有于清翰、安立宾等人，刘长春跑最后一棒。接棒时落后于大正寻常小学二十多米，观众和裁判以为大正寻常小学稳操胜券了，但到终点撞线时刘反以 20 米超过对手，全场顿时轰鸣起来。在场的日本人不得不感慨地说：了不起，简直比兔子跑得还要快。从此，刘长春就得了“兔子腿”的美名。以后，在大连，只要提起兔子腿，就知道是刘长春；每当提起刘长春，人们自然就会想起他就是当年有名的兔子腿。

## 启蒙教练

这次秋季田径对抗赛，打破了日本寻常学校在田径方面多年的垄断地位，沙河口公学堂首次把日本人从州内田径宝座上赶下来，确实使中国人扬眉吐气。

日本帝国主义在大连的统治手段是多种多样的。它们在政治上压迫，经济上掠夺，文化上则是进行奴化教育。它的统治，也使中日两国人民之间产生隔阂。由于日本寻常学校和沙河口公学堂只一路相隔，使中国学生和日本学生难免不发生冲突。日本学生瞧不起中国学生，见中国学生就肆意谩骂：“チセノコ（意为中国佬或清国佬）！”刘长春听后，常按捺不住胸中的怒火，追上去就打，他跑得快，拳头打下去有力，日本学生碰到他总得挨一阵揍。时间一长，双方都有思想准备，放学后日本学生成群结队在街上挑衅，刘长春身边也常聚合着一群中国学生，与日本学生对阵。双方相遇，常打成一团。沙河口公学堂有两名日本体育教师，一位身材矮小的叫熊本，另一位身材高大的叫八井。一次他们听信日本学生的诬告，不分青红皂白，把刘长春当做打群仗的头头叫去，像咆哮的野兽一样，不是打耳光，就是用脚踢，还扭着刘长春的脖子下绊子，把他按倒在地上，揪住他的头发，把他的头狠狠地往水泥地上撞。从此，在刘长春的心里埋下了复仇的种子。为了寻找机会报复，他拚命地踢足球，没有足球，大家就凑钱买了一个兰球，用来代替足球踢。为了不致把鞋踢坏，就赤着足踢球。遇上与日本学生比赛时，刘长春就视机用脚踢日本学生，以作报复。

学校田径队，每周训练两次，每次两小时，训练时间都安排在下午。田径队的教练是中国教师，名叫李盛衡。李老师毕业于旅顺师范学堂，他不仅教体育，还教音乐，是个多面手。李老师为人心直口快，作风民主，对学生很负责任，特别愿意接近学生，因此，也很受学生尊敬。他很喜欢刘长春，常常找刘长春谈话。刘长春在与李老师的接触中，听到许多课堂上听不到的新鲜迷人的东西。在李老师的教导和启发下，刘长春知道了大连是中国的一部分，日本是侵略者。他决心借体育发奋，将来压倒日本人。

后来刘长春离开了大连，再没有见到李老师。直到解放以后，他仍然思念

着这位启蒙教练。

## 勤学苦学

刘长春小时候最喜欢的活动就是体育。小学里的各项运动项目，他无所不练，样样都行，田径、足球、篮球、乒乓球等都很不错，是个多面手。足球队里，他是有名的右边锋，以球快、脚下灵活、头球准，能攻善守著称。每当学校比赛时，只要有他出场就必定取胜。当时大连最有名的两支足球队——大清队和龙华队都常邀请他去踢球。

一九二五年，十六岁的刘长春考入旅顺第二中学读书。一年之后，因患中耳炎，中途缺课太多，家中又拿不起学费，只好辍学。这个期间，他朝夕在谭家屯运动场（现在的大连市人民体育场）埋头苦练。不到一年的功夫，即在大连中华青年会主办的春季田径运动会上，把百米成绩一下子提高到十一秒。后来经朋友介绍，刘长春去大连玻璃厂（现在的大连玻璃制品厂）当学徒，做了不到一个月的描绘玻璃画工。

一九二七年十二月，东北大学足球队南下来大连比赛，一个偶然的的机会，发现了刘长春。经李显章（中学时的同学，当时已在东北大学读书）介绍进入东北大学预科学习。从此他在体育运动方面真正找到了归宿。

刘长春进入东北大学后，立刻投入了紧张的训练。训练地点在东北大学分校沈阳大南关（过去奉天高等师范学校的旧址）。每日训练两次，早晨五时起床，早操九十分钟到一百分钟，下午 3:00~5:00 训练。当时的训练抓得很紧，运动员们练的十分刻苦。由于缺乏运动生理知识，教练的主导思想就是运动量越大越好，以为谁练的刻苦，谁就定能取得好成绩。技术上缺乏正确的指导，训练的计划性和科学性十分欠缺。刘长春每天早晨至少要练八一九次起跑和起跑后的疾跑，每次跑程总是在 40—60 米左右。沈阳一、二月的天气非常寒冷，跑道冻得像石头一样，跑动时，震得胫骨很痛，结果使骨膜发炎了，连走路都十分困难。就这样他也没中断一次训练。第一个寒假，学校组织了集训

（以后每逢假期都要集训），由当时的工科院院长高惜冰负责管理，学生会体育部长孙庆博负责伙食和监督。尽管训练不甚得过，但训练中的饮食办的不错，每天早上每人两个鸡蛋，饭菜很丰富，味道也好，大家反映很满意。

通过一段时期的训练，刘长春的身体素质又有了一定的提高，但在运动技术上并无长进，跑起来头部仍然过分前伸，上体过分前倾，两臂只在体前上下摆动，越接近终点动作越显得紧张和僵硬，并伴有跳跃动作，全靠有力的双腿赢得优势。

后来的训练中，给刘长春影响最大的要算是当时一年一度的暑期赴哈尔滨的训练和比赛（这种方法一直延续到一九三一年）。赴哈期间，住在哈尔滨道里扶轮中学，隔一道街往南便是哈尔滨体育场。这是一个自行车赛车场，场内只能划 270 米的跑道，有六条道次。由于训练场与住地很近，住处又有浴室，伙食也好，生活得比较舒适。在那里每周训练五天，星期六下午必与哈市白俄侨举行田径对抗赛。

东北大学田径队赴哈前，哈市的中学生常与白俄侨比赛，由于实力相差较大，中国学生总是以失败而告终。每次田径比赛都安排有自行车表演，会场竞赛气氛很浓，形式很隆重，每项比赛结束时总有“洋鼓”、“洋号”奏乐助兴，犹如节日一样。场上的观众多是俄侨，每当俄侨获胜时，俄侨观众狂欢狂跳。虽说中国观众少，失败的滋味很不好受，看比赛就受气，这也是中国观众愈来愈少的原因。东北大学田径队赴哈后，队员们互相勉励，强烈的民族感激励着他们。在这样的环境和条件下训练比赛，使刘长春等受益不浅。俄侨的实力很强，铁饼四十五米，铅球十四米多，百米十秒八、九，四百米近 53 秒，五千米和一万米都不错。他们首次交锋，除铁饼和铅球外，其它所有项目的冠军都被东北大学包了。长期被压抑的哈尔滨观众和运动员像火山一样爆发开来，他们从未感到这么痛快，从未享受过这种幸福和喜悦，中国观众与东北大

学运动员争相握手祝贺，无形中又给了他们极大的鼓舞和鞭策。人们清楚地记得，在一次 4X400 米接力赛中，刘长春跑最后一棒，接棒时落后俄侨六、七十米，第一圈渐渐逼近，最后撞线前，刘长春全速冲刺，撞线时反而领先十多米，把在场的俄国裁判看得呆若木鸡，这个难得的镜头被当时的新闻记者捕捉住了，很多人把它珍藏起来，作为永久的纪念。

张学良当时是东北边防军司令，兼东北大学校长（校址在沈阳），他在沈阳的北陵开辟了一处高尔夫球场，并建立了一所国际网球场，自己也常到这里消遣，借着张学良的热心，东北的体育开始转向勃兴。

一九二九年春，第十四届华北运动会在沈阳举行，会场设在东北大学运动场。华北运动会因连年战祸而中断数年，这次是在张学良将军的竭力支持下恢复的。参加这次运动会的各代表队是以各省市大、中学校基层队为主组成的，比赛的项目很多。比赛前，北京师范大学、天津南开大学夺标呼声很高，在赶沈途中，他们在车上就猜想着谁得第一，谁是第二，根本没有把东北大学放在眼里。结果东北大学田径队出乎人们意料之外，在这届运动会上大获全胜。刘长春在这次运动会上作为东北大学的代表，创造了百米十秒八的全国最高纪录。使中华体育界喜出望外，也引起了张学良校长的极大注意。

同年十月，张学良特邀日、德一流选手到沈阳，使中华健儿有了与外国强手决一雌雄的机会。为了举办中、日、德运动会，张学良投资二十五万元，在沈阳北陵建立一座有钢筋混凝土看台的运动场（现在的沈阳体院田径场），马蹄形的观众席可容纳三万人，场内有五百米的跑道（比赛时划 400 米的跑道），二百米是直道。临近比赛发现场地土质过分松软，不能比赛，这时离开会只有三天，来不及修理。张学良非常着急，下了一道紧急命令，调来两个营的士兵，昼夜加工，直到大会开幕前的早晨才告竣工。张学良如此这般热心，使东北选手倍受鼓舞。在男子百米决赛中，刘长春仅以一时之差落于德国选手彦鲁特拉比尔之后（成绩都是 10” 8），而战胜了另一名德国短跑健将；二百米决赛德国选手雄芝比曼以 21” 6 的成绩获第一名，刘长春以半步之差居第二位，日本的著名短跑选手阿武、冈健次、吉冈隆德和今井完全被刘长春压倒。

这时的东北大学，已经拥有一些全国知名的体育教授，如吴蕴瑞（曾留学德国，解放后任上海体院院长）、宋君复（曾留学美国，解放后任北京体院副院长）、申国权等。中、日、德运动会以后，张学良又不惜重金，将德国田径队队长步起先生留在东北大学任田径队教练并兼体育系讲师。步起每月薪金八百两白银，专用小轿车一辆，马两匹，生活上给予优厚的待遇，当年还将其未婚妻从德国接到沈阳举行婚礼，在沈阳市三经路找一独院二层楼房定居。从此，刘长春也得到张学良的特别奖励，由东北大学副校长刘凤竹办理，每月发给生活补助费三十元。

步起教练是二十年代 5000 米世界纪录保持者，他的百米成绩亦在 11”左右，这对一个长跑运动员来说是很不简单的，刘长春做起跑练习时，他可以在侧面扶助刘长春的腰部等速前进。他的跑动技术很好，步幅舒展，全身协调，上体稳定，跑起来给人以美的感受。刘长春在步起教练的指导下，制订了专门的训练计划，训练方法和手段具体多样，使身体素质和短跑技术有了明显提高，全面训练基础雄厚，引体向上可做二十七个，十项运动员与他摔跤，根本不是他的对手。刘长春在训练课上认真听讲，用心琢磨，他第一次领教了“摆动式”跑的技术和各种跑的专门性练习。当时的训练已经开始注意摆臂的速度和用力方向，经常采用振臂扩胸操来增强上肢力量，十分注意原地提踵练习和踝膝部的力量训练，经常运用原地提膝扒地练习、小步跑、高抬腿跑、后蹬跑、跨步跑、仰卧车轮跑等一系列的练习。过去刘长春的跑法，最大的特点是低头，上体过分前倾，摆臂紧张，完全是“踏步式”的跑法。自步起教练指导后，这些缺点有了较大程度的克服。

一九三〇年，旧中国为准备参加远东运动会，举行了第四届全国运动会。东北当局派遣了一支百余名的大队选手参加在杭州梅东高桥举行的这次运动会。在这次运动会上，辽宁的田径无敌手，径赛和田赛没有一项辽宁不占优

势，除八百米一项辽宁得第二外，其它皆为辽宁第一。辽宁田径队是以东北大学的骨干队员刘长春（100米、200米、400米）、张令佳（十项全能）、傅宝瑞（跳高）、姜云龙（5000米、10000米、1500米）、肖鼎华（高栏）等人为基础组成的。刘长春在这次运动会上又取得100米、200米、400米三个单项冠军，从而，更加名扬全国。

刘长春凭着张学良将军对体育的关怀和励奖，才能得到进一步深造和提高的。张在生活上给他无微不至的照顾，一九二九年东北大学学生闹学潮，事情的起因是：东北大学以副校长刘凤竹、教育学院院长、体育系主任郝更生为一派，工学院院长高惜冰、文学院院长周天放、理学院院长孙国封为另一派，互相争夺领导权。当时体育系学生中也明显分为两派，其中一派想把郝更生撵下台，结果刘凤竹、郝更生一派胜利。立即宣布开除闹学潮的四名主要学生，这四名学生是体育系的苑廷瑞、滕瑞麟、张令佳、宋玉泉。闹学潮时，刘长春因生一场大病回大连休养，事情发生后张令佳赶到大连找刘长春帮忙，刘得知消息后，决定亲自求见张学良校长。刘与张令佳一起前往大西门里（大帅府）拜见了张学良将军，张令佳哭哭啼啼说不出话，刘详细介绍了他们四人的运动情况，他以提高东北大学运动技术水平为名，恳求校长收回成命。张学良接受了刘的请求，吩咐他们要好好学习，不要再在学校闹事，立即收回了成命。以后时万咸、张令佳、庞英、付宝瑞、梁德彰、滕瑞麟、宋玉泉、赵凌志、刘长春、苑廷瑞等十名反郝同学结拜为叩头兄弟。刘长春排行第九，大家称他九弟。

## 单刀赴会

旧中国的腐败、没落，使体育成绩低得可怜。自二十年代末刘长春兴起之后，体育好像有了一点希望，刘长春当时一百米最好成绩已经达到10”8，二百米21”6。这个成绩，是当时远东地区的最好成绩，在世界上也是名列前茅



名的。对于刘长春在体育运动中的长进，日本人是了如指掌的。

“九·一八”事变爆发后，东北大学立即将学生疏散回家，刘长春只身返回大连西岗区东关街家中，第二天清早东关街“小衙门”（警察派出所）将刘长春传去问话，那里气氛十分紧张，警察问他今后的去向和打算，刘长春没有思想准备，只好敷衍了几句。他回到家中，觉得其中有问题，知道敌人已经跟踪在后，心中十分恐惧。当晚由妻子赶回娘家，凑资七十元，第二天化装商人乘船逃往天津后赴北平复课去了（此时东大已迁到北平）。刘离家后，父亲怕日寇再来找麻烦，不得已将全家从西岗搬到旅顺口居住。一九三二年初，日寇又连续两次找上家门，要家人写信，让刘回大连，并说：“只要回大连，满洲国给他教育部门 and 体育部门最大的官做。”第二次日寇带于希渭（原冯庸大学学生、800米运动员）等三人登门，此次明确提出了代表“满洲国”参加奥林匹克运动会之事。

公布刘长春和于希渭代表“满洲国”参加奥林匹克运动会的消息，首先刊登在伪满各报上。这个消息传到平、津后，引起教育界青年学生和进步力量的强烈反响，纷纷要求中国政府表态，揭露日寇和伪满政府企图让世界各国承认“满洲国”并摆脱其孤立处境的阴谋。果不其然，日寇扶持下的“伪满”傀儡政府已提前下手，向奥林匹克大会首先派刘、于为“满洲国”选手，奥林匹克大会复电承认“满洲国”的提议，并要求速交“满洲国”国旗与国歌，以备届时使用。

此时此刻的蒋介石，既不出兵东北收复失地，也不采取措施抵制日、伪阴谋，而是不闻不问，无动于衷。奥运会会期一天天接近，全国上下，特别是青年学生民族情绪十分高涨，刘长春身受流亡之苦，对日伪恨之入骨，为民族正义所裹挟，并毅然决然地对来访的青年学生表示。“苟余之良心尚在，热血尚流，岂能忘掉祖国而为傀儡伪国作马牛”。他于一九三二年五月初在《大公

报》发表声明：“我是中华民族炎黄子孙，我是中国人，决不代表满洲国出席第十届奥林匹克运动会……”，明确表明了自己的立场，给日伪政府当头一棒。

奥运会已开过九届，我国虽然自 1924 年就与奥运会开始发生了联系，1928 年也曾派宋如海前去参观，但中国素取漠视态度，从未正式参加。本届奥运会，国民政府已宣布因经费不足而不派选手参加奥运会。说无经费是假，显然是怕得罪日本帝国主义。这为日人给伪满洲国在国际上获得承认创造了绝好机会，在这种情况下，派选手赴美参加第十届洛杉矶奥运会，打破敌人的阴谋已成急需。东北大学体育系的同人找张学良想办法，张学良表示愿意捐助刘长春路费八千元。一九三二年七月一日在东北大学体育系毕业典礼上，张学良亲自宣布应届毕业生刘长春和于希渭为运动员，宋君复为教练员，代表中国出席第十届奥运会。之后郝更生赶忙和全国体育协进会王正廷（任外交部长，体育协进会董事）、张伯苓（体育协进会董事，天津南开大学校长）磋商，经研究由张伯苓先生急电奥委会为刘、于报名。一切要事在几日内仓促办妥。这一举动，给了日伪当头一棒，使他们的阴谋破产了。

东北大学毕业典礼后，立即派傅宝瑞秘密回大连找于希渭，约其由大连直接赴上海汇合以便同行，但是他已经被日本帝国主义监视，无法脱身，只好称病在家，于终究未能成行。七月二日中午，北京市市长周大文把刘长春请到家中，设家宴招待，以示送行。当晚刘与宋君复先生由北平启程，次日晚六时抵沪。

第二天上海各报均在显要位置刊登有关消息和照片，一时轰动了整个上海。刘长春到上海前夕，曾向报界投书，以示自己披肝沥胆，决不当亡国奴之决心，信的部分内容是这样写的：

“树谷先生（时报记者）台鉴，久别未晤，殊深想念，弟托福平安，祈勿锦注！兹悉者，前按友人来函云，沪上人士疑弟代表伪国加入世界运动大会，故沪上各报，对弟名誉亦有不客气批评，弟接阅之后，不胜惊惧，夫弟自去岁事变后，即行来平，与伪国各界向未通片纸，此次报载，纯系伪国宣传，而国

人不予考实，谩与个人以名誉上侮辱，实觉冤枉，吾兄在沪为新闻界一员，且管体育消息，尤为一班人所景从，想对弟之小事，亦有所闻，敢析代弟辩正一下，以解沪上人士之疑团，而免弟无辜之冤枉，不胜切盼，兹随信寄去与沪上同胞血泪书一封，苟能披露于贵报，尤所切盼。总之，弟一切事务，务祈格外照顾，则弟千里之外，不胜铭记五衷，专此即请大安，弟长春（29日）。”

当时刊出此信时，记者还加了一段按语：“长春请勿误会，沪上各报决无对君名誉不客气批评之事，纵有，亦初时受日人宣传之蒙蔽耳，今已洗刷干净矣，刘君爱国心热，血泪书全文甚长，语极愤慨，兹以篇幅关系，未能刊出，好在同胞对刘君已彻底同情矣。”

刘长春到了上海，备受各界热烈欢迎。由于连日困守车中，身体疲劳已极，但他四日下午即至中华体育场练习。练习时有无数群众围观，记首紧随采访，采访的客人络绎不绝。在沪三天，真是应酬无虚日，五日午后在八仙桥青年会（当时青年会总干事是黄仁霖先生）九楼招待各报记者，主要有郝更生报告此次我国选派代表参加奥林匹克运动会之经过。六日下午上海市体育新闻界于四川路邓脱摩饭店为刘长春等人洗尘。七日晚由体育协进会主持，上海二十四个团体近二千人于东亚饭店举行招待会，为宋、刘饯行。上海狐狸电影公司于六、七两日上午邀刘、宋等在中华体育场拍摄有声电影，以备随轮船寄往美国上映宣传，可惜两次均因机片损坏而未拍成。新衣亦在上海连日赶制而成，法兰绒上衣，左脚绣中国国徽，白色的哗叽裤子，另有燕尾服和漆皮鞋，专为跳舞用。原定乘麦斯开轮，宋教练恐刘晕船，不惜白贴美金 36 元，改乘邮轮威尔逊总统号，每人花美金 400 多元办妥护照，只待启程。

七月八日上午，天气格外晴朗，上海新关码头人员济济，数千名欢送人群挤得水泄不通。九时半刘长春身着国徽服装，由郝更生、宋君复陪同抵埠，码头上顿时活跃起来。接着中华体育协进会董事长王正廷到场，与刘等握手道

安，尔后，即至码头浮桥举行授旗仪式。王正廷右手执国旗及中华全国体育协进会会旗各一面，用静穆庄严之口吻对刘长春训词，“略谓我国此次派君参加世界运动大会，为开国以来第一次，实含有无穷之意义，予今以至诚之心，代表中华全国体育协进会授旗与君，愿君用其奋斗精神，发扬于洛杉矶市奥林匹克运动会中，使中华民国之国旗，飘舞于世界各国之前，是乃无上光荣也。”刘长春肃立行礼接受后，作答词：“我此次出席世界运动会，系受全国同胞之嘱托，我深知责任重大，当尽我本能，在大会中努力奋斗。”在欢呼声中宋、刘走上轮船，群众目不转睛的注视他们，依依不舍之情溢于眉宇。在短暂的时间里。各界代表和新闻记者轮流登船访问，互祝成功。十时整，汽笛一响，轮船离岸，那挂满船上的彩色纸带连绵不断随风飘荡，壮观非凡、难怪当天一家报纸刊出一画，以《三国演义》上关羽乘一小舟，手持单刀赴会的画像来形容刘长春此次赴美的意义。就这样，中华民族的第一个运动员，首次满载着中国人民的希望，向奥运会进军了！

经过整整二十五天的海上生活，于七月二十九日下午四时抵洛杉矶码头，先期到达美国参观本届世运会代表、中华全国体育协进会总干事沈嗣良（沈为上海圣约翰大学校长），中国留美学生刘雪松，以及原先在美国的申国权教授夫妇（朝鲜族）及华侨数百人到码头欢迎他。下船后，即乘插有中、美两国国旗的大轿车直接前往唐人街，在那里，举行了盛大的欢迎式。

奥林匹克村位于加利福尼亚州洛杉矶市郊一小山上，风景幽雅秀丽。刘长春和宋君复同住在一所单独配套房间，房前高高升起了中国国旗。热情友好的美国人民经常数以千计聚集在村前，等候外国运动员留言签字纪念。因中国队代表人数最少，一旦被人们发现，便兴高采烈地高喊：“中国！”“China！”拖着你不放，就像猎人获取猎物一样，蜂涌而上，一围就是一两个小时，有时为了不误参观和比赛，往往要使出很大力气，才能逃出“包围圈”。走在路上，常有人询问，君日本耶？刘答：中国，于是对方立刻热情起来，或云：中国四万万代表选手在此。因而被立刻包围，拍肩称道：好，好，真好！且以中国不能多派选手为憾事。

第十届奥运会于七月三十日正式开幕。此日最引人注意之一事，即为中国代表到场。刘长春和宋君复到场时。有警察多人乘机器脚踏车护卫，后面有汽车五辆，满载中国华侨组成的应援团为刘助威。大会宣布开幕后，运动员入场，我国代表队以第八位入场。代表队成员系临时拼凑而成，由刘长春执国旗列前，沈响良为总代表继之，随后代表四人，即宋君复、刘雪松、申国权、托平（托是美国籍，任上海西青体育主任）。

七月三十一日，正是刘长春到美国的第三天就参加了百米预赛，可惜临行前一个月的毕业考试和海上二十五天的航行劳顿，缺少练习。预赛中只获小组第五名，未能进入决赛。

八月二日刘长春参加了二百米预赛，刘分在第三组，此组有本届百米亚军墨脱加夫，起跑后至一百七十米处刘尚居第二，不幸最后二十米被人追上，结果第四。又未能进入决赛。刘长春两腿酸痛。疲劳已极，只好决定八月四日的四百米不跑了。刘长春眼看着优胜国国旗悬挂高竿，国歌齐奏，全场仕女起立致敬，心中频添无限感喟，当晚一时四十分方迟迟入睡。大会八月十四日闭幕，刘、宋又稍作五、六天的停留，参加了有关活动，于二十日乘柯立芝号轮，满载美国人民和各国运动员的深厚友谊，光荣地返回祖国。

### 组织东北体育协进会

各加奥运会回来后，刘长春在东北大学任卫生助教。一九三二年秋，日本在退出“国联”后更加肆无忌惮地向我国华北侵犯，国民党蒋介石一味实行“攘外必先安内”的卖国政策，加紧镇压共产党和进步爱国力量，只许“睦邻亲善”不许“抗日救国”，华北危在旦夕，更不论收复东北了。在内忧外患的

年代里，刘长春和几位东北体育界人士，基于“反满抗日”的爱国思想，并得到张学良及东北军政界名流的支持和帮助，经过种种艰难和准备，于同年冬，在北平市的东北大学体育室召开了东北体育协进会成立大会。刘长春被选为总干事，协会常委有刘长春、王卓然（原东北大学秘书长，在该会主管经费）、胡安善（原东北大学体育系主任，后在北平被日寇所害）、庞英（原东北大学体育系学生，当时在北平市任华北中学体育主任，解放后在哈尔滨工业大学任教）、王兰（原北平市交际股长、冯庸大学体育秘书），共五人。下设委员多人，委员主要由当时北平一些中学校长和体育教师担任，如刘化坤（念一中学体育主任）、时万咸（东北中学体育主任）、周国良（知行中学体育教师）等。他们的主要活动地点在北平东北大学南校彰仪门里路北田径场，经常去那里活动的还有郭杰（原名郭清容，现为西安体育学院教授）、李世铭（现在香港某代理店）、夏术福（现在香港），另有于 XX（跳高运动员，因参加在上海举行的第六届全国运动会，回大连后于一九三八年被日本人所害）。常务委员会每月一次会，每半年召开一次全体委员会。这个组织，名义上是体育组织，实际上也是一个抗日救国组织。平时，它通过各种类型的体育比赛和体育训练工作，把流亡分散在平、津的东北青年（主要是学生）团结在一起，教育他们不要忘记“打回老家去，”要锻炼身体，准备战斗，它还将东北沦陷区的广大青年输送到北平、天津上学，使有才能的青年得到培养和深造。遇到国内举行大型运动会，则组成辽、吉，黑、热四省体育代表队参加比赛，唤醒全国人民不要忘记日本铁蹄下的东北三千万同胞，也是庄严地向全世界宣布：东北仍然是中国的领土，中国不允许列强瓜分，中华民族坚贞不可摧。协会在这段时间里，输送了许多东北青年入关学习。每当举行华北或全国运动大会前，协会积极输送大量运动员组成东北代表队。例如：

一九三三年国民党为了粉饰太平，在南京举办第五届全国运动会，全国各省市的运动员是在“强行欢笑免为愁”的压抑气氛中参加了这次运动会。“东北体育协进会”在各方爱国力量的支持下，冲破国民党分子的种种干扰和阻挠，终于使流亡在关内的东北青年运动员，高举“辽、吉、黑、热”四省的大

旗，昂首阔步地进入会场，接受全国人民的检阅，这对大搞“中日亲善”的南京政府也是一种揭露和示威。刘长春依旧穿着辽宁的“白山黑水”服装（即白背心，黑裤衩）参加了比赛。就在这次运动会上，刘长春在左腿带伤右眼上火带上纱布的情况下（当时新闻界把刘长春称为独眼怪杰），创造了百米 10” 7 的全国最新纪录。这个纪录相当于当时奥运会的第五名成绩，而且作为我国百米最高纪录保持了二十五年之久，一直到新中国成立后，在一九五八年第一届全运会前夕，才被陈家全所打破。

一九三四年秋，第十八届华北运动会在天津举行。在“东北体育协进会”的努力下，组织了一支庞大的体育代表队参加，刘长春为领队，胡安善、郭效汾（当时东北大学教师，现为沈阳体院副院长）为教练。当几百名东北运动员高举“辽、吉、黑、热”四省的大旗进入会场时，全场欢呼、掌声雷动，同时在主席台对面的看台上，出现了以南开大学为主体的几千名天津学生用黑白颜色组成的勿忘“九·一八”五个大字标语，几万人的会场顿时沸腾起来，同仇敌忾的火焰，燃烧着每一个中国人的心。然而，这种情景却触怒了主席台上的日本驻天津的总领事，他向主办运动会的当局提出抗议，并无耻地要求东北四省代表队立即退出会场。当时河北省主席于学忠也坐在主席台上，他对日本总领事的抗议置之不理。

东北体育协进会代培和训练了不少运动员，如郭清容当时铁饼 42 米左右，后来参加了第十一届奥运会。李世明原也准备参加第十一届奥运会，临行前因患阑尾炎而未成行，刘仁栋和于清容参加了第六届全国运动会。另外还有常来该协会训练的运动员，成绩比较突出，如东北籍的白春育，一九三五年代表北平市参加了第十八届华北运动会，一人获得三项投掷冠军。还有中距离跑运动员韩国儒代表吉林省参加了旧中国第六届全国运动会。

一九三四年六月，刘长春已经二十五岁了，仍保持着较旺盛的竞赛情绪，

为了有较多的时间进行训练，决定去南京任交通部科员职务。东北体育协进会工作因之停顿。一九四七年当东北大学由重庆北碚迁回沈阳之后，东北体育协进会又重新建立，会址设在沈阳市政府体育局内，由当时的东北大学体育科主任刘化坤任总干事，并组织了一支东北体育代表队，参加了一九四八年在上海举行的旧中国第七届全国运动会。

## 飘荡的十年

就刘长春在旧中国而言，依着个人的发奋和张学良的栽培，从一九二九年至一九三六年间，可谓刘长春运动生涯的全盛时期。这个时期，刘长春参加了二十余场大型比赛，其中参加了一九三二年在美国洛杉矶举行的第十届奥运会和一九三六年在德国柏林举行的第十一届奥运会；参加了一九三〇年在日本东京举行的第九届远东运动会和一九三四年在菲律宾马尼拉举行的第十届远东运动会；参加了一九三〇年在杭州举行的第四届全国运动会，一九三三年在南京中山陵举行的第五届全国运动会和一九三五年在上海江湾举行的第六届全国运动会；参加了一九二九年在沈阳举行的第十四届华北运动会，一九三一年在济南举行的第十五届华北运动会，一九三二年在河南开封举行的第十六届华北运动会和一九三三年在青岛举行的第十七届华北运动会。他作为我国四省运动史上的一个开拓者，将永远载入史册。照例象刘长春这样身体发展全面、体壮如牛、意志品质坚强、有天赋的短跑运动员。在技术上和成绩上会更上一层楼的。可惜时代的局限和当时体育科学水平的低下，使他只能在国弱民衰的社会动荡中挣扎。低劣的训练条件、训练方法和保健水平，使他多次出现肌肉拉伤而草草赴会，致使他在几次向远东、世运会冲击时，不得不败下阵来，成了他终生的遗憾。解放前的十年里他饱尝了一个运动员不应有的遭遇和痛楚！

一九三七年刘长春在南京中央大学体育系的田径场上训练时，不幸又拉伤了腿，落后的医疗条件未能使他的腿恢复原有的功能，刘长春痛心疾首，不得



不在悲愤中结束了运动竞赛活动。

在旧社会，一旦运动员失去竞赛能力，便被社会所抛弃。昔日的运动名将，不再被人视为炫耀当局的金字招牌了。一九三八年，刘长春在痛绝中失业，流落在长沙街头。当年回到北平，多方求助，想谋个职业，没有结果。在走投无路的时刻，分别多年的妻子又带着三个孩子来到北平。当时的北平是在汉奸王克敏领导的政务维持会统治之下，有人介绍刘长春在日本人手下当一个“嘱托”，刘不肯接受。这一年全靠老同学和朋友资助来维持一家的生活。第二年，刘长春好不容易经同事介绍到万寿山南湖饭店当经理，每月薪金只三十元，全家勉强糊口。一九四一年，被人介绍到南京汪精卫政权下的社会福利部工作，刘长春听说这是一个特务组织，吓得没有去上班，到了冬天就被解雇了，只好流落在南京新街口的一家小店里（钟山饭店）。一九四三年，听说于学忠住在鲁南古城，刘曾一度想去找他，但没有能实现。一九四四年春，刘长春和王锡良、崔峙如、胡安善无辜地被日本宪兵队抓去，坐了一个多月的牢，后找了铺保才被释放出来。这年冬天，虽然在北京师大担任副教授，生活有了着落，但是时局很乱，他不敢公开露面。他看到祖国大好河山被日本帝国主义践踏得支离破碎，民族大丧元气，民众不能为国尽忠，生活穷困潦倒。刘长春奋斗数年，到头来还是不得志，落入社会最下层，染上了抽大烟、喝酒、赌博等坏习气，以此来填补内心的空虚和怅惘。

一九四五年初，刘长春生活一贫如洗，四、五月间专程去河南开封市找到昔日的老同学应德田（西安事变时，应为张学良的主任秘书），一方面想通过应找到张学良先生能在生活上给予资助，一方面请应（应是中共党员）介绍刘过黄河投奔解放区。此间，刘长春在生活上得到应的接济，不久就“八·一五”光复了。后来，刘长春又辗转在北平、沈阳、上海等地，直到一九四八年，还仍然在失业和饥饿中奔波、挣扎。

## 走向新生

日本帝国主义彻底失败后，在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下进行了伟大的解放战争。一九四九年初，全国解放的大局已定，可是北平城里却是人心惶惶，乱成一团，国民党官员纷纷逃往台湾。一天国民党空军军官李世明把刘长春找去，劝刘随军乘飞机外逃，并且说，到了台湾给刘校官的军衔，家属和家俱都可以带走。在这紧迫而关键的时刻，刘长春作了一番深思熟虑后，坚信共产党要治理中国，更需要体育人才，他决心把后半生献给人民的体育事业，断然拒绝去台湾。

三、四月间，刘长春等大批的教育工作者被东北人民政府教育部接到长春市，进行为期三个月的学习，这位遍体带有旧社会伤痕的运动员第一次投入党的怀抱，两眼闪烁着无比激动的泪花，他如饥似渴地学习党的方针政策，庆幸自己的新生。就在党诞生二十八周年纪念日这一天，刘长春担任了东北师范大学体育系的教师，正式走上了革命的工作岗位，开始了新的生活。一九五〇年九月组织上根据他的要求调到大连工学院工作，直到一九八三年逝世。他在教授岗位上，为我国的体育运动和教育事业奋斗了一生。党和人民给予他崇高的荣誉，他多次聆听了老一辈无产阶级革命家的教诲。一九五九年第一届全运会闭幕后，这个饱经风霜的老体育工作者，在人民大会堂代表全体体育工作者和运动日向毛主席敬酒。在长期的革命工作中，他曾任全国第五届政协委员，大连市第五届政协常务委员，中华体育总会常委、中国奥林匹克委员会副主席、中国田径运动协会副主席、辽宁省体育学会副理事长等职，在我国第一届、第二届全运会上担任了副裁判员。这位里程碑式的人物，象一株不老松，永远挺立在我国体育战线上。

## 刘长春青少年时代的二三事

### 安立宾

刘长春同志是我国著名短跑运动员，一九三二年，他拒绝了伪满洲国的邀请，在张学良将军的资助下，单枪匹马代表中国参加了在美国洛杉矶举行的第十届奥运会。

一九二四年我与刘长春一起进入沙河口公学堂（现沙河口区中心小学）高等科一年级（相当于小学五年），当时我们俩都爱好体育，经常出去参加比赛。

刘长春自幼好蹦好跳。上小学时，每天上下学都要跑步，为他从事田径运动打下了良好基础。刘长春不仅擅长田径运动，他对游泳、足球、乒乓球、棒球也都很爱好。他自幼生长在渔村，养成跋山涉水的习惯，不惧风浪，长于蛙泳，他还是沙河口公学堂足球代表队（简称沙公队）的右前锋，他的头球、射门、传递球都比较灵巧准确，沙公队和外校赛球，只要有他参加，大都取胜。

一九二五年，日本人学校——大正寻常小学举行秋季田径运动会，邀请市内的中国人学校——大连伏见台公学堂、西岗子公学堂、沙河口公学堂参加比赛。

沙公队由十五人组成，领队是体育教师八并太三。队员有：刘长春、徐庆文、于清瀚、刘茂寿、张仁寿、魏淑英（女）、魏继业、朱锦春、唐瑞璈、安立宾、刘大年、姜洪发、安立谋、史兴隙、王辅臣。参加比赛的项目有男子一百米、二百米、四百米、四乘二百米和女子二千米等五个项目。

比赛中，魏淑英获得女子二千米第一名。最后一项比赛是四乘二百米接力，沙公队由徐庆文跑第一棒，安立宾跑第二棒，于清瀚跑第三棒，最后一棒是刘长春。当他接棒时已经被大正小学队拉下了二十来米远，此时此刻，刘长

春心急似火，两眼圆睁，他接过棒以后，似离弦之箭一样冲了出去，拼命追赶，终于超过了大正小学队，第一个跑到终点。

这时全场爆发出了雷鸣般的掌声和欢呼声，而为大正小学加油的日本人，此时却变的鸦雀无声了。

赛后日本学生用赞叹的口气形容刘长春是“兔の足より早いよ”！意思是比兔子跑的还快啊。从那以后，刘长春便得到“兔子腿”的美称，当时在大连，一提起“兔子腿”便知指的是刘长春。

一九二六年三月我们毕业后便分了手，以后听说他进入奉天东北大学体育系。

一九三一年“九一八”事变时，我正在北平民大学读书。九月下旬的一天，偶然在北平民大学篮球场上遇到了刘长春，老同学见面分外高兴。国难当头。流亡关内，回忆往事，不禁流下泪来。

我们这些流亡北平的东北学生，本着读书不忘救国，救国不忘读书的精神，坚持上课，同时积极参加体育活动，加强锻炼身体，随时准备听从祖国的召唤。一九三一年十一月，刘长春等人曾以东北留平学生足球队的名义和辅仁大学足球队进行比赛，刘长春仍担任右前锋，结果我队以二比一获胜。

一九三一年十月，东北教育会长王化一，在北平组织了东北民众抗日救国会。名誉会长是张学良将军，会长是王化一，秘书长王卓然，顾问有北平市长周大文，公安局长鲍玉麟，宪兵司令陈兴亚。我以平民大学留平学生会主席的身份和刘长春都参加了抗救会，我们在一起多次参加救济、组宣工作。同年十一月，刘长春同我和华北大学的吴宝林，平民大学的刘凤山、张永祥、崔秀峰等抗救会成员一起到香山、玉泉山等地进行了三天的抗日宣传活动。晚上，我们就住在香山慈幼院里。当时，北平已是朔风呼啸的冬季，我们衣着单薄，又住在没有取暖设备的房间里，倚背靠肩而坐，畅谈国家大事，久久不能入睡。

同年十二月，抗救会组织东北留平学生组成请愿团前往南京请愿抗日，我和刘长春事先约好一起到南京请愿。可是出发那天，车站的不上不下，道轨两侧挤满了人群，秩序极为混乱，请愿团的队伍也乱了，我没有见到刘长春。

请愿团四、五百人到了南京后，住在中央军官学校。第二天我们便去请愿。下午二时半，蒋介石在南京中央军官学礼堂接见了学生代表，并讲了话。之后，我在南京住了五、六天也没有等到刘长春。从此我们就一直未见面。

人生如浮萍，聚散无常，谁也没有想到，我和刘长春同在阔别半个世纪之后，终于一九八〇年七月，在大连市协会议室召开的一次文史工作会上，又重逢了，真是令人欣喜不已。当时在会上，他表示还要撰写十万字的回忆录。要为发展祖国社会主义的体育事业，努力培养人才……。不幸，他在一九八三年就与我们永别了。

## 大连最早的一支足球队——中青队

程健

一九〇五年日本帝国主义者击败沙皇俄国，侵占辽东半岛以后，随着港口的开放，外国商船上的海员们经常上陆进行足球比赛，足球活动也逐渐地在大连人民中间开展起来。

一九二二年秋，由大连中华青年会发起组织了中华青年会足球队，简称中青队。这是大连最早的一支足球队。中青队的成员除中华青年会的宋子仁和外商太古洋行的蔡寿山外，大都是青年学生。当时该足球队活动的阵地大部分在敷岛广场（现中山区民主广场）。他们有时自己练球，也经常与临时组成的球队比赛。中国人会踢足球，这对一贯诬蔑中国人为“东亚病夫”的洋人们来说简直是不可思议的事情。因此在外国海员中间引起很大的震动。他们的足球队经常向中青队挑战，成立不久的中青队毫不畏惧，在最初几场比赛中互有胜负。但在以后的交锋中，洋人队已招架不住中青队的脚下功夫。于是他们就组织几条船的联队再战，结果每场交锋都败下阵来。中青队不断的胜利，尤其打败洋人组成的足球联队，大长了中华民族的志气。特别是球场附近的居民，每逢赛后有的送茶，有的拥向中青队员们紧握他们的手表示热情的祝贺。

中青队坚持经常不断的比赛的刻苦训练，身体素质与技术水平提高的很快。尤其是祁福洋等人加入中青队后，阵容更加坚强。凡来往大连港的外国船只，都以能与中青队一战为快事。

一九二七年，年轻的中青队曾先后与当时日本著名的足球劲旅早稻田大学足球队和驰名欧洲的意大利海军足球队等外国强队进行过多次交锋。中青队的队员们在洋人面前，毫不畏惧，敢打敢拚，有些队员技术全面，身手不凡，打出了许多漂亮球，取得了较好成绩，表现了我中华健儿的顽强意志和拚搏精神。不仅受到了大连观众们热情赞许，同时也获得外国球队的高度评价。



# 曹艺斌的艺术生涯

马明捷

曹艺斌同志生前是大连艺术学校京剧科教师，是我国著名的京剧表演艺术家，一九八二年十一月二十五日因病逝世。他从事京剧表演艺术六十余年，造诣很深，成绩卓然。本文记述他的生平和艺术成就，是根据他生前口述和他的夫人杨秋雯（即容丽娟）等人的回忆以及有关资料整理而成的。

## 童年学艺

曹艺斌一九一一年生于上海市。他的父亲叫曹善亭，艺名小宝义，后改为曹宝义，是当时称为京剧界“八匹骏马”（指梅兰芳等八位同庚皆属马的名演员）之一的著名京剧武生。曹艺斌生在这样的家庭里，自幼便在京剧艺术中熏陶，很自然地走上了学戏、演戏的道路。

二十年代，京剧正处于上升时期。老生演员谭鑫培虽然于一九一七年去世，但继之而起的梅兰芳，杨小楼，余叔岩很快形成三足鼎立的局面。北京的京剧舞台好戏如云，好角如雨。上海京剧界也异常活跃，最早进入上海的京剧演员已经形成了以“海派”为标志的艺术风格。另外，大批“京派”演员南下演出或定居上海，使京、海（准确地说应是北、南）两派同时在上海竞芳斗艳。曹艺斌就是在这个时代，这个环境里开始他的艺术生涯的。

曹艺斌五岁便随父登台，在《龙潭鲍骆》中客串小鲍赐安。八岁进入夏氏兄弟（月珊、月华、月润，皆为南方名演员）办的科班，不过，他在这个科班里只是搭班练功，他的父亲另外给他请了老师在家里学戏。

曹艺斌幼年在上海学戏时的老师主要有两位。一位是尚派武生创始人尚和玉的亲传弟子韩长宝，他的武生戏完全是尚派的路子，讲究功夫扎实，作风浑



厚朴实，很少花点子，曹艺斌的武生戏大都是跟他学的。另一位老师是瑞德宝，曹艺斌向他学的是黄（月山）派武生和谭派老生。这位老先生教老生戏有个规律，唱工戏教“三斩一碰”（《辕门斩子》，《新黄袍》，《失街亭·空城计·斩马谲》，《碰碑》）；扎靠的戏教《定军山》；穿褶子的戏教《打棍出箱·向樵闹府》；短打戏教《打渔杀家》。这些戏学会了，唱老生所需的基本功就都有了，学别的戏也就容易了。

一九二二年下半年，曹宝义所在的亦舞台（位于上海三马路）经理沈少安从北京把余叔岩接到上海演出。余叔岩是谭鑫培的学生，谭死后，京剧首席先生的地位逐渐被他取代。

按合同，余叔岩准备在亦舞台演出半个月，他演唱的都是谭派戏。期满临别前，他贴出了《珠帘寨》，这出戏又叫《沙陀国》，原是花脸戏，谭鑫培把它移植成老生戏，是一出有文有武，唱、念、做、打俱全的戏。演出后一下子轰动了上海，于是合同又续定了半个月。

当时只有十一岁的曹艺斌完全被余叔岩的演唱艺术迷住了，他天天上剧场看余叔岩的演出，特别对余的《珠帘寨》更是产生了浓厚的兴趣。按常规，他每天复习和练功的武戏是《战马超》、《神亭岭》、《战冀州》等戏，可是从这时起，他每天都扎上大靠，戴上白满，拿上大刀，练起《珠帘寨》来了。他的两位师兄（曹宝义的徒弟）郭玉刚、李春如陪伴他去看余叔岩的演出，帮助他练功，韩长宝老师也给以指导，使他终于学会了这出《珠帘寨》。

余叔岩走后的一天，沈少安来到曹宝义家办事，正碰上曹艺斌在院子里练功，他看了半天，进屋对曹宝义说：“八爷（曾在结拜兄弟中排行第八），我跟您商议件事，余叔岩走了，下一期的角儿得十多天后才能到，园子空不起，我想让小俊子（曹艺斌的乳名）抵几天。”曹宝义好家没听明白，反问：“谁？”沈少安又重复了一句：“小俊子。”曹宝义连忙说：“您是开玩笑

吧，沈老板？他一个小孩子，怎能接余叔岩的戏？再说，他唱什么？”沈少安说：“我刚才在院子里看他练《珠帘寨》，不错，就唱这出，上海人还没看够。”曹宝义连连摇头说：“沈老板，多谢您的好意。余叔岩刚唱完，他就接着唱《珠帘寨》，这不是太玄了吗？算我不识抬举，我实在不敢答应您。”沈少安只好暂时放弃了他的打算。

一九二三年春节临近了，上海梨园界照例在旧历年底要组织“封箱”演出，由各戏班联合义演，收入救济贫苦的同业。这年组织了一个“童伶大会”（当时上海很流行小孩子戏），由艺人子弟演出。曹艺斌和与他年龄相仿的小伙伴们都兴致勃勃地参加了演出。初生牛犊不怕虎，他们在演出中都拿出了学的扎实，能够显示自己长处的戏。那天的戏码是毛燕秋（南方名演员七盏灯毛韵河之子）的《独本关》，李万春（前辈武花脸李永利之子），兰月春（李永利的徒弟）的《落马湖》；张竹轩（前辈武生张桂轩之子）的《神亭岭》，张翼鹏（盖叫天之子）的《武松打虎》，大轴是曹艺斌的《铁公鸡》。这次演出显示了曹艺斌过硬的功夫和表演才能，使他在京剧界和观众中有点名气了。

这时，沈少安又去找曹宝义，坚持让曹艺斌在亦舞台角儿没到之前给他抵一阵。有了这次义演的成绩，曹宝义心里有了底，于是同意了沈老板的请求。经过协商，在春节过后，亦舞台给十二岁的曹艺斌贴出了三天戏。第一天《十八扯》，大轴是《铁公鸡》，第二天，第三天都是大轴戏《珠帘寨》。

在这之前，曹艺斌还只有个乳名叫小俊子，现在做为演员正式演出了，就得有个艺名。按戏班的惯例，父亲叫小宝义，儿子就叫小小宝义。当时老板为了招揽观众，特意在剧场门口用电灯泡排成了“小小宝义”四个字。演出时上座率很高，因为一个只有十二岁的小孩子能演余叔岩唱红了的戏，这本身就具有很大的吸引力。曹艺斌在《珠帘寨》中扮演的李克用一出台便得到一个“碰头好儿”，中间换了大靠出去起霸又是一个“碰头好儿”。演到和周德威对刀时，观众连声叫好，曹艺斌越发来劲，要大刀请场花，叫好声不断，终于成功的唱完了这场戏。老板看到观众如此欢迎他的演唱，便要求续演五场，场场客满。这时北京的角儿到了，曹宝义觉得见好就收吧，曹艺斌这才停了下来。京

剧界有句行话叫“挑帘红”（旧时舞台挂“守旧”，有上、下场门，演员出场要有人把门帘挑开），意即初次出场就演红了，曹艺斌这是个“挑帘红”的演员。

正在曹艺斌演出时，哈尔滨道外新舞台老板尹乃棠到上海邀角儿。他看了曹艺斌的演出之后，便向曹宝义提出以八百元的代价，邀请曹艺斌到哈尔滨演出一个月。一个十二岁的小孩子一个月能赚八百元，这可是少有的事，家长虽然不放心，但又不愿放过这个机会。于是，曹艺斌在郭玉刚、李春如两位师兄陪同下离开上海来到千里之外的北国名城哈尔滨。

在哈尔滨，曹艺斌演出了《失街亭·空城计·斩马谲》，《珠帘寨》，《十八扯》，《铁公鸡》等戏。一个十二岁的小孩儿从上海到哈尔滨挂头牌演出，使当地居民很感新奇，再加上曹艺斌这次演出即有谭派正宗的《失·空·斩》，《珠帘寨》，又有刚劲勇猛的武戏《铁公鸡》，而且童年的曹艺斌扮相英俊，嗓音宽亮，武功扎实。所以在哈尔滨演出旗开得胜。一个月的合同期满后，老板仍不放他离开，要求续演。曹艺斌虽然同意续演，但他只会九出戏，时间一长就没有唱的了。新舞台有一位前辈老先生马德成，是有名的黄（月山）派武生，他看曹艺斌聪明好学，功夫又好，并且还是同门师兄弟瑞德宝的学生，自然十分喜爱，使编排了三本《劈山教母》，让他演出。小孩演小孩，有文有武，充分发挥了他的长处。后来又编排了一出《朱洪武出世》，曹艺斌演幼年的朱元璋。

曹艺斌在新舞台演了半年多以后，离开哈尔滨返回上海，途经大连时，又停留下来在永善茶园（现人民剧场）演出。在大连除了演出他原有的和新学的戏外，还参加演出了《黄九龄》，曹艺斌在戏中扮演为父报仇的小英雄黄九龄，这又是一出有文有武的小孩戏。经过在哈尔滨半年多的锻炼，使他在舞台上的适应能力不断提高，演出又获得成功。据还健在的前辈老艺人韩莲奎（九

十岁)说：“艺斌小时候在大连可红火呢，观众觉得他简直是个小怪物，十二岁的小孩，长的好看，嗓子又好，能唱、能打、能翻，文戏武戏都能演，什么戏一学就会，天天满堂。他后台一‘搭架子’，‘好儿”就来了”、曹艺斌唱红了，给戏园老板赚了不少钱，他要回上海，老板却不让走，还要他继续演。为了使曹艺斌继续演戏，老板竟然拒不付给讲好的“包银”，并扬言不演就不让上船。只有十二岁的曹艺斌此时什么主意也没有，他的两位师兄也毫无办法。幸亏有人给出主意，让他们给曹宝义写信，曹得信后去求“海上闻人”黄金荣帮忙，黄于是给戏园老板写了封信，请他放人。曹艺斌这才和两位师兄逃出了鬼门关。

回到上海时，曹宝义已经从亦舞台转到上海比较大的剧场——丹桂第一台。老生高庆奎，花脸金少山，旦角贾碧云，武旦小九霄（尹凤鸣）等名演员当时都在丹桂第一台。曹艺斌从哈尔滨回来后，算是“出山”了，可以正式搭班唱戏挣“包银”了。第一台老板许少卿看小孩儿唱戏能卖钱，而曹艺斌又是从东北唱红了回来的，便请人编了一出《呼延庆出世》。由曹艺斌扮演小呼延庆，高庆奎的儿子高盛麟扮演小孟祥，另一个小孩范叔年扮演小焦玉。高庆奎、金少山、曹宝义、小九霄等也分别扮演八贤王、包拯、卢凤英等角色。上演后在上海轰动一时。从此，曹艺斌开始了他职业演员生涯。随着他的父亲闯荡江湖，边学戏，边演戏。

## 闯荡江湖

一九二六年，十五岁的曹艺斌跟着父亲来到了天津，在南市大舞台演出。他们是一个家庭演出班子，内有他的父亲，父亲的师弟小宝福（曹宝义师傅警魁风的儿子警保明）唱二路老生；父亲的两个徒弟郭玉刚，唱二路武生，李春如唱花脸，还有曹艺斌，仍旧是武生、老生戏都演。他们这个班子演的《战马超》，《铁公鸡》，《失·空·斩》等戏都很叫座。但是，他们这个班子缺少旦角，有些生、旦对儿戏唱不了。这时恰巧从北京来了一个十四岁的小青衣，

跟着师父在天津搭班唱戏，她就是后来成了曹艺斌的妻子，和他共同生活了五十年的杨秋雯。

杨秋雯艺名容丽娟，是清朝咸丰年间大学士柏俊的后代，蒙古正兰旗人。柏俊死于肃顺等人的构陷。不久，这个钟鸣鼎食之家很快败落下来。晚清旗人，谋生无计，寄情歌台舞翊者甚多。杨秋雯的父亲把她写给了为京剧大师“通天教主”王瑶卿的学生吊嗓子的琴师牟芝田。刚刚拜师，牟就把她带到天津，因为一个人不能唱戏，所以只能搭班。正好曹家班无旦角，于是将她请到曹家班，和曹艺斌配戏。这样，杨秋雯就参加了曹家的演出班子。

曹艺斌和杨秋雯在天津合作演出的戏有《四郎探母》，《汾河湾》等。他们在舞台上是搭档，生活中是伙伴，两小无猜，情投意合。曹艺斌每演出《呼延庆出世》，必到女梳头桌让杨秋雯梳小辫。曹艺斌在天津的演出获得成功，天津一位报馆的主笔便将他的名字改为曹艺斌，取其艺兼文武之意。从此，小小宝义的艺名便被曹艺斌的艺名取代。

在天津演出了一个多月以后，曹家又离开了天津到外地演出。但杨秋雯没有跟去。一九二七年来到哈尔滨，先在华乐舞台演出，曹艺斌演的是四本《呼延庆打擂》，这是他在上海学的新戏。前辈演员曹宝义、娄廷玉（尚和玉弟子）、程永龙、窦兰芬（旦角）陪他演出。在华乐演出时，他向娄廷玉学了一出尚派名剧《锤震四平山》。一年以后，他们又转到新舞台演出。

一九二八年，著名京剧演员唐韵笙来到了哈尔滨。唐韵笙善演老生、武生戏，还能唱花脸。且能自编、自导、自演。所创作的列国戏甚多，如《驱车战将》、《好鹤失政》、《闹朝扑犬》等，都具有独特的艺术风格，形成以他为代表的艺术流派——唐派。与周信芳，马连良有“南麒北马关外唐”之称。唐韵笙与曹宝义是好朋友，他的到来对曹艺斌艺术水平的提高起了很大的作用。聪明好学的曹艺斌抓紧时机向唐学习，唐也愿意把自己的一些拿手戏传给这位

朋友的儿子。《驱车战将》一戏是曹艺斌继唐之后第一个演出的。以后，他们又在一九三七年，一九四八年两次同台演出，曹艺斌演的《未失宫》、《闹朝扑犬》等戏都得到唐的亲传。他演的关羽戏也吸取了唐派的精华。

曹艺斌十八岁时“倒仓”了。梨园界把演员的嗓子比喻成装米的仓，变声即意味着米仓倒了，也就是要挨饿了。因此“倒仓”对于学戏的人来说，几乎是个鬼门关，变声后嗓子依然很好的人太少了。曹艺斌“倒仓”后，正工老生戏如《失·空·斩》，《珠帘寨》等都不能唱了，只好在武生戏上努力。这一年，周信芳的大弟子高百岁到了哈尔滨，他是第一个把麒派剧目和表演艺术带到山海关之外的人，麒派感情充沛的唱腔，苍劲有力的念白，鲜明、深刻地塑造人物性格的现实主义表演风格，一下子吸引住了年轻的曹艺斌。曹艺斌仔细观摩，并虚心向高请教，高演《走麦城》，他还主动为高配演关平。当高离开哈尔滨时，他已经学会了《追韩信》，《徐策跑城》，《扫松》等麒派戏。还有一出演一个晚上的大戏《六国封相》，也是他向高百岁学的，以后成了他的看家戏，用他自己的话来说是吃饭的戏。一九三七年他曾在大连连演二个月《六国封相》而不衰，这对当时只有六十万人口的大连来说，简直是个奇迹。

一九三二年春节过后，曹宝义从哈尔滨到上海邀角儿，在那又遇到了杨秋雯，这时的杨秋雯已是个二十出头的大姑娘，在京、津、沪已闯出一些名气。一九三一年上海梨园界组织十三个班社大会演，她在《大观园》中扮演贾元春。当时周信芳、赵如泉、王虎辰、何月山等给她站太监，赵君玉、绿牡丹（黄玉麟）、王兰芳、刘筱衡给她跑宫女，这么多名演员给她配戏，可见她是红极一时的。日本发动“一·二八事变”后上海处于战乱之中，剧场停业，无法演出。曹宝义便邀请她到哈尔滨演出。此时，杨秋雯正好六年满师，便乘机离开了师父（杨虽很红，但每月挣的上千块“包银”却大部分被师父占有，因此她早就想离开师父）。杨秋雯离开师父后，同母亲跟着曹宝义走水路经大连来到了冰天雪地的哈尔滨。到后，在新舞台挂头牌，当挑班旦角，开始了和曹艺斌的第二次合作。

在哈尔滨，曹杨二人合演的戏有《劈山救母》，《吕布与貂蝉》等。曹艺

斌演本戏《西游记》，《六国封相》等时。杨秋雯也参加了演出。

一九三三年春节，哈尔滨京剧界举行联欢，曹艺斌上台说相声，讲了一句讽刺日本人的话，日本宪兵要抓他，他得信后跑到上海避难，并由前辈名丑杜文林介绍，参加了黄金大戏院，排了一出《马金龙出世》。这时，杨秋雯也由哈尔滨到了丹东。

曹艺斌和杨秋雯在天津第一次合作时，还是一对两小无猜的少年，现在已经长大成人了。由于舞台上的合作，生活中的接触，使他俩逐渐产生了感情。但是，旧社会的好演员很难掌握自己的命运，生的秀气，演戏又有些名气的女演员，有几个在婚姻上能得到幸福呢？早期的女演员露兰春被迫与“海上闻人”黄金荣姘居，姚玉兰、孟小冬也成了杜月笙的侧室，刘喜奎刚强贞烈，最后还是落入陷阱。当时，杨秋雯的母亲已经接受了一个在国外留过学的资本家的金钱，要把女儿嫁给他。但杨秋雯却是有主见的姑娘，她要自己掌握自己的命运，和自己心爱的人正大光明地结合在一起。为此，她和家庭闹翻了，当时的小报上称之为“容丽娟家庭革命”。曹艺斌得知后急忙从上海赶到丹东，他们借了四千元高利贷给杨母，演戏的服装也被扣去一半。然后双双来到大连，在西岗区的同乐大戏院（长江路和新开路交界处，现已成为仓库）演出。

他们在同乐大戏院一演就是两年，这时期曹艺斌的戏路子比过去更宽了，既有和杨秋雯演的“对儿戏”，又有他自己单挑的《追韩信》、《徐策跑城》，还有关羽戏和猴戏。他和杨秋雯都在大连唱红了。

在大连唱了两年之后，曹艺斌和杨秋雯重返上海，和周信芳在黄金大戏院搭场演出。演出时，周挂头牌，杨挂二牌，曹挂三牌。这次合作，对于仰慕麒派已久的曹艺斌来说，无疑是一次求之不得的学习机会。但是，他的老生戏和周信芳同工，为了合作和学习，他干脆不唱老生，而专应武生。演出之前，老板未通知他，就把小小宝义——这个上海观众比较熟悉的艺名挂了出来，想靠

他幼年时的名气来招揽观众。

在上海演出的头一天，周信芳大轴是《追韩信》，杨秋雯是《玉堂春》，曹艺斌演的则是上海不大有人演的唐派武生戏《驱车战将》，第二天周信芳大轴是《徐策跑城》，曹艺斌是尚派的《长板坡·汉津口》，前赵云，后关羽。战战兢兢演唱了十天，总算是圆满。这时金少山从香港回来了，他凭着一条穿云裂帛，声若洪钟大吕的好嗓子，红的发紫。回到上海后，不仅和周信芳并挂头牌，而且一演必满，剧场内的叫好声赛过打雷。他回上海头一天即演出了《盗御马》，曹艺斌和杨秋雯在金之前演《千里送京娘》。回忆起这一段来，曹艺斌感慨地说：“不多学一点儿，没有真本事，哪能上得去阵。”和周信芳同班这段时间，对曹艺斌学习钻研麒派艺术是极为有益的。

一九三七年，曹艺斌第三次来到大连，在宏济大舞台演出。宏济是以接“京角”为主的剧场，言派老生创始人言菊朋，梅派青衣李香匀，马派老生邢威明等当时都在这里演出。曹艺斌在这里演出了《六国封相》，他饰演苏秦，邢威明饰苏秦的叔叔，杨秋雯饰苏秦的妻子周氏，曹宝义饰苏秦父亲。该剧连演两个月，轰动大连。之后，他们又合排了《封神榜》，曹艺斌在剧中先饰苏护，后饰梅伯，杨秋雯饰姜皇后，刘淑琴（大连京剧团演员刘卉琴的姐姐）饰妲己，李铁英（现在山西京剧团）饰商纣王，邢威明饰商容。该剧共四本，每本都演了两个月。

从“七七事变”到抗战胜利，曹艺斌主要是在东北各地流动演出。在沈阳共益舞台（现北市剧场），他和唐韵笙、张云溪，魏莲芳等同台合作演出。曹艺斌的关羽戏受唐韵笙的影响甚大，二人经常同演一出关羽戏，一般都是曹艺斌演前半场的关羽，唐韵笙演后半场的关羽。曹艺斌在佳木斯时，李少春到哈尔滨演出，曹艺斌等专程去观摩他的《十八罗汉斗悟空》，学会这出戏之后，又请人制做了全部道具。不久，他应哈尔滨新舞台老板之邀前去演出。他的到来，使哈尔滨京剧界很快形成了以他和中央大戏院的唐韵笙、毕乐舞台的白玉昆为首的三足鼎立局面。在激烈的竞争中，曹艺斌以演《十八罗汉斗今悟空》而赢得了更多的观众。曹艺斌的猴戏武功基础好，演出技巧高，在北京时曾得



到北京名票载涛（猴戏得杨小楼真传）的指点。

在海城，曹艺斌和杨秋雯迎来了抗战胜利。国民党接收东北后，没有给人民带来任何好处。内战开始，百业凋敝，民不聊生，京剧艺人也陷入艰难困苦的境地，曹艺斌虽然已是名演员，但仍照样难以维持生计，甚至落到典当衣服的境地。大年除夕，“东北剿总”逼迫女演员们去清唱，并陪军官们跳舞，直到第二天才让回家。生性刚强的杨秋雯忍受不了这种侮辱，一怒之下，退出舞台，结束了演员生涯。

为了生计，曹艺斌和唐韵笙到天津，演出两个月后又回到上海，在天蟾舞台（现劳动剧场）演出。天蟾老板是周建兴，他还同时经营共舞台。天蟾以接京角唱传统老戏为主，共舞台则以本戏为主。天蟾演员阵容很强，除老生唐、曹和李宝魁外，还有小生姜妙春，花脸金少臣、马世啸、肖德寅，武生高盛麒、郭金光、林鹏程，武旦班世超，小花脸艾世菊，花旦角童芷苓等。

解放前夕，党派姜椿芳（现中华书局负责人）在上海文化界做地下工作。京剧界的年轻艺人吕君樵（现中国剧协上海分会秘书长），吕君武（现上海演出公司剧场党总支书记），林鹏程（现上海京剧院顾问）等人当时都已参加了地下党。他们团结了包括梅兰芳、周信芳在内的许多正直、进步的京剧艺人参加地下党组织的进步活动。抵制国民党拉他们去台湾的阴谋，准备迎接解放。曹艺斌也是地下党的团结对象，姜椿芳曾和他多次谈话，对他进行启发和教育，使他对共产党领导的革命事业有了一定的认识。解放军进入上海前夕，地下党吸收曹艺斌参加了纠察队。一九四九年五月二十七日，中国人民解放军进入大上海，曹艺斌兴奋地戴上红袖标，担任了文化界纠察队副队长，负责保护剧场，安定人心，宣传我党我军政策的光荣任务。第二天，京剧界冒雨上街游行，欢庆解放，曹艺斌在滂沱大雨中挥舞大旗，引导游行队伍前进，混身充满了自豪感。

## 新的生活

新中国的成立，使曹艺斌的艺术生活进入了一个新的阶段。一九四九年底，他和杨秋雯来到北京，希望在京剧艺术的发源地得到前辈艺术家的教益和帮助。

在北京，他请了号称鼓王的白登云和著名琴师魏德惠为他伴奏。候喜瑞，李洪春都曾为他配过戏。一九五二年，北京庆乐剧场的著名老生李盛藻休息了，于是曹成为剧场的主要演员。剧作家景弧血为他编了一出《杨六郎威震三关》，该戏有文有武，很受观众欢迎。他还和剧作家王雁合作，编演了反映古代劳动人民受压迫的新戏《青山英烈》，获得北京市政府的奖励。曹艺斌是为学习才到北京来的，这期间，他请了前辈花脸演员钱宝森为他教戏，钱宝森是和杨小楼、陈得霖同时代的花脸演员钱金福的儿子。钱金福所代表的钱派艺术的形体动作被京剧界公认为是最规范、最标准的。杨小楼、余叔岩、王瑶卿、梅兰芳都曾向钱宝森请教，特别是杨小楼，倚钱为左右手，一日不可离开。钱金福死后，钱宝森继承了钱派艺术。钱宝森和其父一样，没有嗓子，只能唱武花脸兼架子花脸。他演的《芦花荡》中的张飞、《定军山》中的夏侯渊、《问樵闹府》中的煞神等，在当时都是首屈一指的。建国后，因年事已高，不宜在搭班唱戏。曹艺斌就利用这个时机，每天上午把钱请到家里教戏。曹艺斌主要是向他学习钱派的形体动作。钱老教学严格，对曹艺斌这样已颇有名气的演员也仍然是一丝不苟的要求，从拉山膀，起云手教起，凡是他认为不够规范的动作全得改正过来。就是这样，钱宝森每天上午来，下午走，整整教了一年，使曹掌握了钱派形体动作的规范。这一年的学习，对曹艺斌艺术发展起了极为关键的作用。京剧界提起曹艺斌来，众口一词称赞他“身上”漂亮，讲究，他后来把他演出的戏，完全用钱派的形体动作加以改造，为他确立“麒神，钱形，曹风格”奠定了基础。

在向钱宝森学习的同时，曹艺斌还经女老生小兰芬介绍，拜李洪春为师。李洪春是南派关羽戏创始人王洪寿（老三麻子）的最后一位弟子，跟随王多年。王派关羽戏的表演掌握得最多，最实授，并且腹笥渊博，会的戏很多。李万春，李和曾、奚啸伯、王金璐、付德威等都是他的学生，李少春、高盛麟等人也得到过他的教益。曹艺斌的关羽戏是向唐韵笙、高百岁、周信芳学的，演出多年，很受观众欢迎。但他的关羽戏是在边观摩，边实践中学来的，大多数没有一招一式的学过。对于艺术上精益求精的曹艺斌来说，这是十分遗憾的事，所以他决心要一招一式的学习王派关羽戏。一九八一年秋，笔者在北京访问李洪春老先生时，他说：“我这么多学生，就算给艺斌说戏累”。我不解地反问：“他不笨哪，您怎么会教他最累呢？”李老先生笑了，他说：“他不是笨，他学戏最认真，最细心，哪怕他都唱了不知多少次的戏，到我这儿还象小孩刚开蒙那么学，学生虚心，先生也得用心哪！”

曹艺斌和李老先生感情甚好，曹艺斌离开北京后，每年逢老师生日，他都要寄函邮款祝寿。最后一次是一九八二年，也就是他去世那年，重病之中，仍未忘记给老师祝寿。八三年初，笔者在北京又访李老先生，提起此事，李老先生泪如雨下，不胜伤感、痛惜。

一九五三年下半年，曹艺斌和李万春，宋保罗（高派老生），毛世来（四小名旦之一）共同组织了北京京剧一团，四个人不分主次，并挂头牌，轮流唱大轴。这年国庆前，北京市举行了京剧艺术展览。当时北京京剧界各家各派兵强马壮，许多著名演员都还活跃在舞台上。因为这次展览演出只准备从全北京选一台戏，所以曹艺斌没有做参加演出的准备。当他接到让他参加演出的通知时，其是又惊又喜，心情始终不能平静。展览演出是在长安大戏院，共有三出戏，头一出是孙毓堃《状元印》，中间是曹艺斌的《徐策跑城》，大轴是梅兰芳的《宇宙锋》。是日，北京各剧团都停止演出，参加观摩和评论。演出时，

李洪春先生亲到后台为曹艺斌操持，照料一切。他这次演出《徐策跑城》，借鉴、吸收了好几位前辈的长处，周信芳、唐韵笙、林树森、贾玉峰以及钱宝森的东西都有，他根据自己的条件和体会，把吸取的东西加以融化和发展，形成自己独特的艺术风格，因此，演出获得了好评。被称为“京朝派的《跑城》”，获得了“表演艺术奖”。事后，李先生告诉他，他上场不久，梅先生刚包好“大头”就站在后台的天桥上整整看了后半出，一边看，一边点头，直到他快下场了，梅先生才去穿服装。经过这次展览演出，使曹艺斌名字更为人们所知晓。

一九五四年九月三十日，这是曹艺斌终身难忘的一天，北京市文化局把他和其后一些知名演员请到中南海，为在怀仁堂举行的中央机关国庆晚会演出。晚会的戏码有毛世来的《打焦赞》；叶盛兰，杜近芳的《柳荫记·十八相送》，曹艺斌的《徐策跑城》；杨宝森的《击鼓骂曹》；大轴是梅兰芳的《贵妃醉酒》；还有候宝林的相声《空城计》。

这是曹艺斌头一次进中南海，也是他第一次为毛泽东、周恩来、刘少奇等党和国家领导人演出，在演出中，毛主席一面看戏，一面拍着板，还不时的和总理、少奇同志说着什么，精彩的地方，和大家一起鼓掌。此情此景，使曹艺斌的眼睛湿润了，新中国文艺工作者的幸福感，浸透了他的整个身心。

## 定居大连

一九五五年九月一日，曹艺斌在接受了老朋友们劝他参加国营剧团的意见后，放弃了在北京的优厚收入，举家迁到大连，正式参加了旅大京剧团。解放后，他在此之前曾经来过一次大连，在实验剧场演出。他和当时的旅大京剧团一起排演了连台本戏《水泊梁山》，他们把传统水浒戏串起来演，曹艺斌在戏中扮演了宋江、武松、石秀、林冲……等角，连演十三本，成为当年轰动大连戏剧界的事情。

参加旅大京剧团后，曹艺斌除了演出他的保留剧目外，还参加演出了本市

创编的《合州城》，《天王封江》，这两出戏在参加辽宁省汇演时，都获得了优秀表演奖；他还主演了《十五贯》，《赵氏孤儿》，《满江红》，《文天祥》，《赤壁之战》等经过整理，改编的传统戏和新编历史剧。一九五八年，继中国京剧院之后，旅大京剧团排演了现代戏《白毛女》，他扮演杨白劳，成功地塑造了这个被欺凌，受压迫的农民形象，获得好评。

一九六二年，中央文化部，中国戏剧家协会在北京联合举办周信芳舞台生活六十年纪念会，邀请曹艺斌参加。会议中，他和李少春，李和曾、徐敏初，管韵华同时拜周信芳为师。拜师仪式在全国文联礼堂举行，田汉同志主持仪式。曹艺斌追求学习麒派艺术近四十年，他曾和周信芳同台演出，得到周先生的教诲和指导，在党的关怀下，终于实现了入麒派之门，正式拜周信芳为师的愿望。

回到大连后，曹艺斌主要从事戏剧教学工作。文革后被下放农村。一九七三年调回后，在大连艺术学校京剧科工作，直至逝世。

# 抗战胜利后大连地方金融简况

孙耀庭口述 黄本仁整理

## 一、接收敌伪银行

一九四五年“八·一五”大连地区光复后，驻军苏军卫戍司令谷次洛夫发布命令：停止日币流通，代之以苏军军用券。老百姓称它为“苏币”。从此沿用四十年的日币废止了。当时社会秩序正常，地方工商业照常营业。

日币停止流通后，随之敌伪金融机构也停止了活动，听候我方接收。

当时，大连地区的银行主要有：

横滨正金银行大连支店，朝鲜银行大连支店，日本三和银行大连支店，日本安田银行大连支店，日本帝国银行大连支店，日本三菱银行大连支店，日本台湾银行大连支店，日本三井银行大连出张所，日本住友银行大连支店，满洲中央银行大连支店，满洲兴业银行：大连市支店、大连一市町支店、大连小岗子支店、大连沙河口支店、金州支店、普兰店支店、皮口支店，中国交通银行大连分行，中国银行大连分行，中国东莱银行大连分行，中国金城银行大连分行，中国山左银号大连分行，（英）汇丰银行大连分行，（美）花旗银行大连分行，（荷）麦加利银行大连分行。

以上各银行中有日本的，有伪满洲国的，有旧中国上海、天津等地的，还有英、美、荷等国的银行在大连的分行。伪满和旧中国的在大连的分行，都是听从日本银行指挥的。我方接收银行的消息传出后，这些单位都慌了手脚。并都请示日本银行的头头，如何办理善后。日本银行方面就请示东京，而东京总行命令大连各分行，要听从中国政府指令，如数缴出存款和物资。在连日方银行包括伪满和旧中国的都按期上缴，没有抗命行为。英、美、荷外籍银行则另案办理。

我方为了顺利接收，特在市财政局局长隋云生领导下，组成以财政股股长

刘继志为首的接收委员会。接收委员会的委员有：原满洲中央银行代表刘秉仁，原朝鲜银行代表李秀声，原满洲兴业银行代表孙耀庭、宋成章、郭光仪、周开兴，原中国、交通、金城银行代表实云祥。

上述各银行的代表，都是各银行的高级行员，有经理、副经理、襄理。他们都熟悉大连地方金融业务，都能认真负责地接收敌伪银行的一切资金，点滴不漏地上缴大连市财政局。这对于稳定大连地方收支局面、起了很大作用。

这项接收工作在一九四五年底以前就提前完成了。为了发展地方金融事业，一九四六年起大连市开设了三家大银行。即：大连市商业银行、大连市工业银行、大连市农业银行。主要领导成员有接收委员会中的成员刘秉恒、李秀声、宋成章、孙耀庭等人，分别担任以上三行的负责人。这三家银行的成立，使大连地方金融恢复正常，对支援大达地方的工农商业活动贡献很大。

### 二、成立新银行

因为东北全境当时都驻有苏军，所以苏军的军用券流通区域甚广。国民党军队侵占沈阳和南满广大地区后，他们搞到了大量的苏联军用券，用来套购各地物资。特别是国民党部队进驻大连地区和东北地区的边缘石河驿的时候，国民党方面就把大量苏币投放大连市场。这给大连市的经济形势带来严重影响。

后来国民党方面又派陆军中将董彦平来大连进行所谓“视察”。借“视察”之名，秘密带来大量苏币，企图在大连大规模套购物资。我方识破其阴谋，经与苏联军方合作，经过周密研究和部署，在一九四七年初，集中人力，三天三夜将流通于我市的苏币，贴上小票，加盖钢印，限期兑换。兑换加贴小票的苏币与未贴小票的苏币的比例是 1：10。每个居民可每次兑换一千至二千元，工人和贫下中农可放宽到每次三千元。同时对兑换日期尽量缩短，逾期一

律作废。这一紧急措施，得到城乡广大群众的热情支持，很快就提前胜利完成。

这是一次在时间上是高速度，方法上是半公开地进行的。虽然不是正式的币制改革，但在效果上非常重要。这对恢复和发展大连战后的地方经济，保障地方财政税收的顺利完成，稳定当时物价，起了很大作用。

当时从四面八方企图利用各种渠道，混进大连的投机商贩，把从东北各地搜集的大量苏币，准备投放大连市场获取暴利。但他们未曾想到一夜之间，却变成了一堆废纸。

来连视察的国民党中将董彦平装模作样地乘坐军舰在旅顺口登岸，在大连地区兜了一个圈子。他精心策划带来的大批苏币，刚要用来套购物资，满想捞一把，那知一出笼就遭市场拒绝，并受到人民群众的讥笑，把董彦平的随员们弄得莫名其妙、好容易搞清楚原因，立即报告“董中将”。董彦平在苏军和大连市地方当局面前既不敢发脾气，又得装成若无其事的样子。后来他秘密召来大连的国民党特务大小头目，把他们臭骂一通，责备这些家伙为什么不把这样重要情报向上呈报。国特们无言以对，因为他们事前根本不知道。

贴小票的苏币使用了一些时候，大连地方当局认为使用苏币不是长久办法，于是将大连商业银行、大连工业银行、大连农业银行等三家银行合并成立了关东银行，进一步整顿全区金融业务。

不久，由关东银行发行了货币（地方币性质）：关东币，取代了苏联军用券。从一九四八年起，共发行了票面拾元、伍元、叁元、贰元、壹元等关东币，流通市面。

一九四八年十一月十五日，关东银行正式公布把苏币全部收回，全市一律使用关东币。当时苏币和大连关东币的兑换比例是 1：1。广大人民群众非常感谢地方当局的英明措施。地方当局是在中国共产党领导下工作的。当时的国民党统治区货币贬值，物价暴涨，民不聊生。而我大连地区却能稳定币值，物价没有波动，顺利地进行了第一次的（抗战胜利后的）币制改革。这就大大地提高了中国共产党在我市人民群众中的威信。人民群众自动组织起来，以实际行动



动增加生产，支援全国解放战争。使大连市形成了后方的一个重要补给基地。在此期间，关东银行对工商企业、农村、渔业及时地予以贷款，也促进了大连工商农渔各行业的迅速发展。

在发行关东币的过程中，曾经发生了一些意想不到的事。原来关东币的票面值共分拾元、伍元、叁元、贰元、壹元等五种。一开始兴币流通和回收是正常的。但为时不久，忽然市面上叁元票面的流通量突然增加，并且越来越多。当时关东银行并没有增发此项叁元票面的关东币。据说是叁元票面的印币模具，苏方并未交出，我方对此亦无证据可查。为了稳定市场，安定民心，不使货币贬值，关东银行采取了紧急措施，将市面上的叁元票面的关东币，全部收回，不再投放市场。如果市面上再发现有叁元的关东币，哪里发现就在哪里追根。这个办法很有效，这就是对企图冒印、滥印关东币叁元票者一个有力的回击，保卫了关东币的信誉和正常流通。

一九四八年在辽沈战役取得伟大胜利后，东北三省全部解放。地区性的关东币，已不适当当时情况。在东北局和东北人民政府领导下，东北全境发行了统一的东北币。大连地区立即停止关东币的流通，代之以东北币。这是抗战胜利后大连地区进行的第二次币制改革。

东北币与关东币的兑换比例是 1:200。这是一九五〇年六月十五日公布的五换率。随着全国的解放，中央成立了中国人民银行，各省区市都设立了分支行，同时发行了统一的全国性货币——人民币。大连地区的东北币也相应停止流通，从一九五一年四月一日起一律使用人民币。

大连地区在抗战胜利后，在中国共产党的正确领导下，避免了国民党统治区的恶性通货膨胀。物价暴涨等一系列的经济和金融的混乱状态。虽然经过两次地区性的币制改革，但币值始终稳定，物价没有受到波动，广大人民过着安居乐业的生活。这在我国地区性的金融变迁史上实是罕见的。

## 金县益昌糕点店

吴承宝

金县益昌糕点店，是一个具有百余年历史的传统风味小店，它开业于一八七一年（清同治十年）。创始人是王范，吴鸿恩，吴鸿毅，他们三人合资经营，由王范当掌柜，并雇用了于振仁、由蒿等二十多名徒工。

这个店当初经营的产品有烧饼、麻花、馒头、寿桃，方脯等。当时市面上没有成袋的现成面粉，只好自己买来小麦后再加工制作。店里的产品大部销售给金州城内和近郊的居民食用。有些清兵也经常来买，但多数清兵吃后一抹嘴就走了，还骂两句：“奶奶的，这样的东西还要钱？”掌柜的和店员谁也不敢向他们要钱，否则他不但骂你，还会砸掉你的生意，真是叫人敢怒而不敢言。城内外一些比较富裕的人家，遇有红白喜事时，也大都来店里买糕点。当时对这些买户，多是以赊销为主，很少收现钱。每赊户给一个折子（即欠账本），赊账时在折子上写明日期、品名、价格等。每到旧历年前开始收钱，如果欠户到时未还，就做为老账处理，留在春节过后再到欠户家去收。

一八八〇年益昌因掌柜王范病故而分家，吴鸿毅开了鸿昌号馒头铺，吴鸿恩开了益昌号果子铺，两家都是独资经营。益昌果子铺雇用了丁曲蒿，于霖义等七、八名徒工。继承了益昌糕点店的传统风味小吃。除制做原有的品种外，又增添了小磨香油和麻汁酱。所有原料都由集上购买后自己加工，加工的原料除自己用一部分外，还零售给其它商店。后来清兵中有些退役不走的，就在金州城郊做个小本生意维持生活。他们经常到益昌果子铺来批发些烧饼、麻花、光头饼等糕点，从此益昌有了批发生意。益昌生产的小磨香油除用于加工糕点外，也售给居民食用和售给药房制膏药用。就这样，一直经营了十五年。

一八九六年正月间，夏文烈投资益昌，当上了掌柜并兼管账房，同时雇用宁志瑞，赵云常，林学贤等十余人。除继续生产原产品外，还增加生产酱油，高粮醋等。这段时期生意做的也很兴旺，但是后来由于日本人将在大连生产的

酱油运到金县推销，因此使益昌酱油的销售量逐渐减少。一九一六年又有王恩宠投资合股经营益昌，夏文烈仍任经理，又雇用了许广庆，于忠有等十余人。此时日本人也不断扩充工厂，倾销产品，使中国人的生意很不好做。当时益昌为了扩大生产门路，除照常生产原有品种外，又增加了甜面酱，炒面酱以及酱菜等，还从市场上买进线豆，小黄瓜，小地雷等十余种菜类，经过加工制成什锦小菜向市场推销。就这样得以维持下去。

一九二九年夏文烈因年老辞退回家。随后隋永顺入股，并担任掌柜，雇用了吴承宝，宫志周，林景春等十余人为徒工。在这以后，益昌除不断创新产品外，主要还是以“提高质量，薄利多销”为经营目标。当时徒工们每天起早贪黑，挑水、推磨、送货、勤杂，无所不干。我们有时为了争取和扩大销路，还经常到大户人家去帮忙。譬如，原奉天省长王永江的父亲死了，按当地风俗，要在家存放四十九天，于是益昌果子铺就派人去帮忙。当时王永江家每七天就搞一次悼念，有念经的僧道，也有大礼宾先生等人，这些人吃的都是糕点酒席，所用的酱油，醋，糕点等都是我们店的。这样就等于多做了一大笔生意。又如我店生产的甜面酱和炒面酱在卖春饼和熟肉食品的小店中，是不可缺少的佐料。把炒面酱擦到蒸肉及煮好的方块肉皮上既黑又亮，美观好看。这两种酱大多销售给大连金城饭店和泰华楼，以及普兰店的春和园和本城复兴园饭馆。我们经常派人到上述饭店联系推销，有时还派人帮助干活，这都是益昌果子铺与同行业争夺销路的具体办法。这段时间里，我们生产的小磨香油的销售量亦不断增加，这种产品当时在金州城内是独一无二的。

为了扩大产品的销路，益昌果子铺还延长营业时间，如在秋季每天早上三点钟就开门营业，为进城赶集的农民准备早点，晚上一般都在九点以后才闭店。白天摆在柜台上的东西均须在晚上装好、包好、摆好，货架上的货物也要整理好，账房先生还得将白天赊销的账在晚上对好做好；工人们也需将次日生

产用料和工具等在晚上配备好，所以本店同仁在工作上，抓的是很紧的，并做到了保质保量，服务周到。

一九三一年“九一八”事变后，本店经营的方式不再是长期赊销了，改为三大节清账。为了扩大销路、本店还开始用自行车往农村送货，城南送到董家沟，城北送到三十里堡。虽然当时社会上很乱，但为了做生意，也只好冒着风险去送。除此之外，本店还经常利用赶庙会的机会去做生意。当时的庙会每年有十多个，二月初十城隍庙，三月十六观音阁，四月十三响水寺等……。这些庙会每次都要搞三至五天。时间越长，对我们的生意就越有利。

一九三三年日本统治者将大连地区市面上流通的二毫（二角）银币和龙洋银币用朝鲜银行的纸币以七八扣强行兑换收去，然后运到日本。最后市面上几乎见不到银币，都是些纸币在流通。这给我们的生意带来了困难，因为纸币信誉不高，人们不爱使用。从此益昌果子铺卖货时也就不敢再赊销了。这时期原料供应也不能满足益昌的需要，生意越发难做。一九三四年隋永顺辞职回家，王恩宠当上了掌柜。“七七事变”后，吴可容接替王恩宠当掌柜。那时，日本人对经济的控制更加严格，面粉等原料由“行业同业公会”供给，数量很少，实在无法做生意。后来“果子组合”又供给我店少数挂面以代替面粉使用，但挂面怎能代替面粉呢？真叫人哭笑不得。此外，经济警察还不时到店内查看，并要买这买那，都以赊账为名，拿了就走，根本就不还钱，公开进行敲诈勒索。随着日本侵华战争的扩大，店内工人还不时被抽去做劳工，如被抽到大连湾修造水泥船等。当劳工既苦又累，受尽压迫，甚至还要付出生命，这使店内大多数工人不敢再干下去，生怕被抽去做劳工。太平洋战争爆发后，日本统治者疯狂地将青壮年男人抓去服劳役，城内只剩下一些老幼病残者。而且白天不断有空袭警报，晚上又实行灯火管制，弄的人心惶惶，不得安宁，生意无法再做下去，只好停业了。

一九四五年八月十五日日本投降了，九月三日光复大连，人民无不欢欣鼓舞。我们益昌糕点店也在这时正式恢复营业，仍由吴可容当掌柜，招收许云增、王全令，刘仁平等九名徒工。开业后买卖兴隆，销售量不断增加，而且政

府对我们私营工商业特别支持，还不断组织我们学习，改造思想。

一九五一年吴可容掌柜病故后，我担任了经理。随后工商业联合会成立，我担任了糕点、糖果、面包、酱油、灌肠等七个行业的主委。一九五六年全行业公私合营高潮时，糕点、糖果、面包三个行业合并，仍用益昌字号，是一个自负盈亏的集体单位，由我担任经理，经营一个糕点加工厂和五个糕点门市。经过合作化运动，益昌走上了社会主义道路。

一九六二年益昌糕点门市划归地方贸易公司，一九六五年糕点加工厂也划归金县国营糖业、烟酒、糕点公司。一九八三年为恢复和发展传统食品，在上级有关部门积极支持下，我走访动员了原益昌的老师傅，积极筹建益昌糕点店，并编写技术资料，培训人员，终于在当年十二月二十五日重新开业。目前，益昌糕点店糕点有三十多个品种，四十多个花样，颇受群众欢迎。

# 金州小吃

董孝大

## 金州驴肉包

建国前，提起金州驴肉包，不但在大连地区，就是在东北各地也是颇有名声的。

旧金州城，正中心是一座老爷庙，它的前后左右各有一条笔直而不太宽的街通向东南西北的城门。庙南南街拐角，有一个店铺，门外挂着一个四角长方型的纸灯笼，四周写着“真正驴肉包子”六个黑字，这就是四十年代前后的金州驴肉包子铺。

这个驴肉包子铺的前身，在二十世纪初期是一个姓董的人开的一座饭馆，倒闭后由于天吉将饭馆改为专业的驴肉包子铺，后又转兑给了他的伙计徐长荣。金州驴肉包最兴隆的时期就在徐长荣经营的二十多年前后。

这座包子铺的内外都很陈旧，但每日自早至晚顾客都川流不息，特别是晚间。经常有几辆汽车停在门外，其中有由大连和其他地区专程前来的吃客，更多的是把没上屉的半成品买回去自家蒸或款特亲友。据说，负有盛名“驴肉之乡”的唐山市的同行，也多次不远千里前来学艺。

据徐长荣的侄子徐延良（当时他在这个包子铺当伙计）说：驴肉包，当然是以驴肉为主，但光用驴肉做馅，馅太硬，所以每十斤驴肉掺上二斤左右的肥猪肉丁，外加二斤多的小蛎子，再放进各种小佐料。驴肉鲜，小蛎子也鲜，合在一起就更鲜了。热气腾腾的包子，咬开皮，里面是一个带汤的肉丸，汤鲜肉嫩，油而不腻。

一九四五年光复前，日本人实行粮食配给，没有面粉，他们就用粉只代皮，买卖仍很兴隆，这说明驴肉包的好与不好，是在馅而不在皮了。光复后驴肉逐渐短缺，这个买卖也就停了。

## 李殿金的荞面饸饹

原金州市场在城内西街，每天早晨都有市集，李殿金的饸饹摊子就在这西南角占了一席之地，搭了个简易棚子，棚下放着一张固定在地上的桌凳，棚子南面是一大锅饸饹条，一大锅鱼羹，每天早晨来吃饸饹的可说是应接不暇，特别在冬天，当时远道来赶集的乡下人，吃上一碗热气腾腾鲜美可口的饸饹，可说是心满意足了，也有很多住在附近的居民，每天早晨特意到市上吃一碗李殿金饸饹的也大有人在。他的饸饹每天只是一大锅，两三个钟点就卖完，从来没听说李殿金饸饹卖剩下的时候。每每都是吃的人都晚了，卖完了，怅然而去。李殿金在这儿卖饸饹有二十多年的时间，所以深受欢迎的原因是因为他的荞面饸饹软硬合适而条长，吃在日里即有咬头又不硬，特别是他的鱼羹，既鲜美又连个小鱼刺也没有，外加上点小肉丁和佐料，真是鲜美极了。李殿金死后，他的两个儿子承继了他的传统做法，也很受欢迎，后因荞面难买改为面条，虽然鱼羹依然，但因不是饸饹条而失掉了它的特色，公私合营后改为专业小面馆。

## 李延年羊肉馆的叉子、火勺

南街的一个大门洞里有个羊肉馆，除了炒菜外它的羊肉包和叉子火勺是久负盛名的，掌柜的叫李延年，各种羊肉炒菜应有尽有，加上对顾客热情周到，所以买卖很兴隆。

所谓叉子火勺，是把火勺做好后放在一个用铁条做的叉子上烤熟的。面合好后，放上盐、油和小佐料，然后放在木头模子里压实后，再倒出来烤，模子里刻有花纹，再放上几粒芝麻，火勺烤的焦黄酥脆，又软又香，有人送了幅对

联：

“香甜正可口，酥脆不碰牙”，可谓名符其实了。他的羊肉包也很好吃，因为掺进一部分猪肉馅，所以膻味不大，但又不失掉羊肉的特有味道，加上少许的小蛎子，确实鲜美的很。如果把叉子火勺开半个口装进两个羊肉包子，吃起来则另有一种风味，也可说是“两全齐美”了。李延年死后，他的后人都参加了工作，叉子火勺也就没有流传下来。

### 刘豆腐脑的豆腐脑

光复前，在西市场卖豆腐脑的不下四、五家，而在这个行业中值得一提的是刘豆腐脑的豆腐脑。在西市场小吃集聚地的东北头是刘豆腐脑的卖场，这里只有一个简单的棚子和桌凳，他每天早晨天不亮就把在家做好的豆腐脑挑到市场去，一头是豆腐脑，一头是羹，每天早晨在他没去之前早就有人等着来喝他的豆腐脑了。

刘豆腐脑的本名叫刘文荣，因为他的豆腐脑特别的好吃，所以不知道他名字的顾客就叫他刘豆腐脑。刘文荣卖豆腐脑的时间是一九三五年到一九四七之间。在一九三五年之前，也有个叫刘豆腐脑的，那是刘文荣的哥哥。也是在这个地方卖了十几年的豆腐脑，实际上刘豆腐脑的出名是他哥哥打下的基础。他哥哥死后，刘文荣就承继了他哥哥这一行业，并保持其特点不变，所以顾客们也同样亲热地叫他刘豆腐脑。刘氏兄弟不但豆腐脑在同行业中是最优良的，就是经营的办法也和别人不同。他点的豆腐脑，细嫩而白，恰到好处。他的羹有两种，有时是小蛎子羹，另一种是鱼羹，羹里加上点白肉丁、碎木耳和其他小佐料，呈琥珀色，鲜美可口，白嫩的豆腐脑，浇上琥珀色半透明的羹，真是色、香、味具佳。他卖豆腐脑也很别致，扎着个小白围裙，戴着白袖套，动作利落干净。他对顾客也比较热情、周到，年岁大的叫大爷、大叔、爷们；年令和他差不多的叫兄弟；小点的叫小朋友、小兄弟，令人感到很亲切。



刘文荣虽然去世已二十多年，可是现在仍有不少人还在想着刘豆腐脑。

## 轶事七则

孙宝田

### 一、刘伯良舍己保桑梓

光绪十一年（1885年）夏，清廷派陆军提督刘威休，带领铭军马步十二营，驻扎金州城南大连湾（又名柳树屯）一带。占地安营；农民惶惶，恐碍耕种。邑人刘心田，字伯良，号一粟老人，为当时不慕荣利之逸士。面謁刘盛休提督，愿以自己家中土地借军队驻扎之用，幸勿占用他人田亩。刘盛休欣然纳其意，并保举心田为把总（武职之末级，正七品）。

光绪二十四年三月初六日，俄人强迫清廷签订《旅大租地条约》，初议只租旅顺、大连湾两海口，及划界时，仅存金州一城。越二年。八国联军入京师，俄人趁此机会，将金州城内中国官吏拘而流之萨哈林（即库页岛），作重劳役。翌年，《辛丑条约》签订始放回。其中有病死未归者，俄人复疑金州城内匿有清兵，架巨炮于城南山，将轰金州城。心田闻之立见俄将，保无其事，逐质心田于俄营，派兵入城搜寻。果无匿兵，始释心田，因而全城数万生灵。得免于炮火浩劫。乡人至今德之。1924年心田病卒，邑绅李在旂孝康。（名义田，光绪己丑科举人。）以诗挽之云：“昔闻谈笑保孤城，九鼎一言敌亦惊。（注一）始信经纶归隐逸，真叫韦布陋公卿。花间时寄琴书趣。海外争传字画名。七十精神犹矍铄，不应一疾骑长鲸”。

注一：义和团运动，俄人疑金州匿有华兵，欲架炮轰之。君闻讯急往见俄将，笑谓绝无其事，愿誓死以身保证，嗣经俄将查实，城赖以全。父老多德君，卒后乡人颂其德，为之立碑，永垂纪念，碑在文革中砸碎矣。

## 二、无名烈士刺敌酋

光绪二十年（1894）年十月，日寇在其广岛集兵，派陆军大将大山岩为第二军司令官带领三万余人，分三批开往金州。在舰队护送下，第一批登陆部队于十月二十三日，到达貔子窝花园口海面，翌日午前五时开始登岸。二十九日第二批登陆部队亦开到，前后经过十二天，所有敌军全部登岸。花园口又名虾老石，在我庄河县境，距金州二百八十华里，距貔子窝一百五十余里。是月二十七日，有锻工三人，见到强敌压境，怒不可遏，决意前往花园口之丛家堡子，刺杀驻在的日军第二军司令官大山岩，以泄积愤，不料被敌人哨兵发现，立即展开生死搏斗，打得头破血流，终被敌兵逮捕，押入日寇司令部。三名烈士受审时只字不吐，只承认是抵抗外族侵略的中国人，铮铮硬骨，敌人莫可如何。日寇远藤在场，亦不得不称三名烈士为非常振奇之士。惜乎姓名无闻，不得垂诸青史，流芳千古耳。爰就回忆所及，书其事实，敬待知情者。给予补充，以彰忠烈。

## 三、沙俄背约无理要挟的一段经过

清光绪二十四年（1898年）三月，沙俄驻华全权代表巴布罗夫，与清廷特派全权代表李鸿章订立《旅大租地条约》，初议只租旅顺、大连湾（又名柳树屯）两海口，及划界时，俄人得寸进尺，背约要挟，北由普兰店，东到貔子窝，均划为租地。仅剩金州一城。斯时城内尚有清廷副都统、海防同知巡检等，俄人不许我屯兵，只以巡捕维持治安，清廷官吏不啻等于虚设。此时大连市旧名青泥洼，东青泥洼在令寺儿沟一带，有渔民十户。西青泥洼在今劳动公

园一带，有渔民十七户。现在的劳动公园内有一部分地方，为当地居民谭英伟家。俄人又背约要侵占劳动公园一带，谭英伟与其祖母拒不迁移。地方官海防同知涂景涛（字子衡，长沙人）居官清正，但对沙俄的无理要求，徒唤奈何。只得向谭家商酌，劝其将住处售出，不然终被沙俄侵占，于是谭英伟听从涂景涛同知的话，将住宅售掉，迁于金州城内。光绪二十四年（1898年）戊戌仲夏十一日，涂景涛偕山阴茹利宾游胜水寺诗云：“云根高嶂疑无缝，偶被神斤辟奇洞。洞中天半绝尘踪，谁压巉岬起层栋。杰阁耸出苍松巅，上有幽僧伴鹤眠。线路穿林转深峭，盘空蹑翠寻飞仙。学仙当接芳尊友，安得蓬莱太平酒。尽倾东海入杯中，醉乡直到无何有。酒酣拔剑叹汪洋，长鲸未斩心忧惶。菩萨低眉不我顾，曾阅历千沧桑。青山青青不改色，我欲住山犹不得。题名聊志游山缘，石上长留数行墨。”此诗刻于胜水寺，诗中对敌人之侵略，有无限之感触，不知其石今尚存在否？我和谭英伟共学私塾，同砚数年，回忆所及，略为之记，俾后世人民，明了沙俄之凶残焉。

#### 四、寿长忠诚谋国之片断

光绪二十四年（1898年）春，沙俄强租旅大，掠地屯兵，暴虐恣肆，得寸进尺。金州副都统寿长，向清廷奏云：自五月七日俄兵登岸以来，骚扰淫掠，民不聊生。况尽举租界人民，归彼治理，凡有血气莫不发指，堂堂华胄，谁肯事仇。而清廷不惟不加理会，反而压制军民之正义抗敌，电饬寿长，严谕所部官民，勿得妄动。并将金州城内留驻之奉军，一律撤出，连同普兰店、貔子窝等处、亦全部撤防。寿长复奏云：沙俄本性贪酷险诈，以前侵略中国黑龙江以北，乌苏里江以东大片领土，尚未为食。现又兴修贯穿东北三省之铁路，强租旅顺口和大连湾两处港口，海防之险要，尽入其手，揣其用心决不仅仅在于经营商务而已。为亡羊补牢之计，谨申奏议，请准在辽东整训二十营劲旅，以防不测。清廷投降派，惟恐触怒沙俄，招致责难，立将寿长调离金州。嗟彼朝

廷，如此昏愤，何胜浩叹。寿长满族人，世袭一等男爵。光绪二十一年任金州副都统，二十五年去任，在职四年，忠诚谋国之心，实足矜式。

### 五、梁启超来大连

梁启超字卓如，号任公，广东新会人，光绪举人，与其师康有为等，锐意变法，为当时维新之士，著有《饮冰室文集》行世。辛亥革命军起义于武昌，启超时年三十九岁自日本返国，道经奉天（今辽宁）时苏、浙、皖、湘诸省，先后响应，启超知情室瓦解只在旦夕，遂次于大连不进。舟抵大连，遥望旅顺，曾有诗云：“虎牢天险今谁主，马角生时我却来。醉抚危舷望灯火，高风浪籍暮潮哀。”由大连乘火车至奉天诗云：“蒙蒙印沙月死，瑟瑟摇风草黄。一夜似梦非梦，眼前千里战场”由奉天至大连诗云：“穷苦朔雪动征骖，知为美游为恶归。时人颇惊辽鹤返，长路终羞宋鸟飞。水赤磨刀判伤手，月明绕树怨无枝。横流满地见龙穴，欲障泥丸力恐微。”一路行程，仍念念不忘维新。

### 六、康有为在金州

康有为，原名祖贻、字广厦、号长素、又号更生，广东南海人，光绪进士，近代改良派领袖，后为保皇会首领。一九二五年仲秋，康有为到大连展览书法，适逢金州文庙丁祭，日本占据旅大时期，设关东州南金书院于金州，堂长为日本人岩间德也。渠深知康有为是复古尊孔者，出于拢络清代旧臣之用心，便亲赴大连邀请康有为到金州参加孔庙丁祭，康有为欣然应之。阴历八月三日早晨，在岩间德也和康有为之两位侍从陪同下，乘车来到金州。当时陪祭

者有金州会长曹世科，阎宝琛孝廉，我舅父毕宗武大令（名序昭、庠生、清季任洮南府开通县巡检，招垦荒务委员，候补知县），我斯年二十三岁，因是阎孝廉之门人，为塾中大学长，又系曾会长之好友，故得参加祭典。丁祭后，康有为先生在金州东门外南金书院用午餐，并吟诗书与岩间德也。诗云：“中华礼失托殊方，躬逢金州祭典煌。俎豆庄严容肃肃，笙歌和雅乐锵锵。血气尊亲于此见，神明教化岂能亡。便作东方君子国，舟通日照大同扬”。款署乙丑八月三日，道出金州，躬逢释奠，敬赋。款下盖印两方，阴文曰康印有为，阳文曰维新百日出亡十四年三周大地游遍四洲经三十一国行六十万里。从印文中可以看出康先生的一生道路坎坷，终未能实现其变法图强之政治抱负。接着又书联赠阎孝廉云：国破山河在，城春草木深。借杜甫《春望》诗，寄托其对祖国之情思，亦为对旅大沦为日本殖民地慨叹。给我书“为善最乐”横幅一纸。此外对曾会长以及公学堂教员均有书赠，惜乎事隔五十八年，不复记忆矣。午后康先生又乘车到金州城东响水寺游览，响水寺距金州城东十里许，位于大赫山之西麓，乃金县大赫山古建筑群中素负盛名之古刹。我们陪伴康先生到寺院内南侧瑶琴洞，洞深数里，有泉流出，声闻数里，故名响水寺。此地树木参天，风景清幽，每当夏日，中外人士，多避暑于此，响来消夏，乃金州八景之一。康先生兴致勃勃，虽已年近古稀，（时年六十八岁）而步履矫健。入方丈室，道士献茶献果，毕恭毕敬，康先生命侍从备好笔砚，濡墨写诗云：“金州城外百果美，瑶琴洞裹三里深。曾记唐皇曾驻蹕，犹留遗殿可幽寻”。赠与道士。道士双手合十行礼。口称谢康圣人。康先生留连忘返，日已西下，侍从提醒赶车时间，仍由岩间德也亲自陪同送回大连。

## 七、陈宝琛到长春

一九三二年，伪满洲国成立，傀儡皇帝溥仪登基，此事是郑孝胥和日本人板垣包办的。事前由天津启程时，溥仪的师傅陈宝琛力持不可，而郑孝胥不

听，在溥仪面前，极力劝驾，郑的两个儿子郑垂、郑禹，亦力助孝胥。未几伪满洲国在长春成立，名曰新京。溥仪初为执政，年号大同，越二年改帝制，年号康德。陈宝琛太傅时年八十五岁，来到长春，看望溥仪，住在交通银行。当时日本人提出挽留陈宝琛仍为太傅，而宝琛推却，并对溥仪说：你左右的人，一个好人没有。适有报社求他写字，他写了“旁观者清”四个字，刊于报端，由此可见陈宝琛太傅之胸怀，不敢于伪满洲国也。余曾函求太傅书扇，太傅题诗云：“惠然双壁座生光，离合匆匆意特长。举世沸羹操古调，满城艳冶抱孤芳。应求政以期文重，衰耄犹难结习忘。终拟相从倾底里，夜来梦已到辽阳”。款署金静菴、黄黎雍来访长春旅邸赋赠、金、黄两君皆辽阳人，故诗中未语及之。又为余书联云：仰群规以遥企，涌先人之清芬。一併邮来。某夜日人派贼持刃到太傅寓处，恫吓云：人民派我来杀你，我看你老了，不忍加害，你快走吧。太傅一笑置之，遂由长春乘火车到大连，复由大连坐天潮丸轮船到上海，未几病效，谥日文忠。

# 大连名称的由来

董志正

大连，是个具有悠久文明史的地方。以城市论，它又是个只有八十余年发展史的年轻城市。

殷商时代，辽东属青州，而西周时辽东归幽州。

战国末，大连地区属于燕辽东郡（即今辽宁省大凌河以东地区）。

秦统一中国后，在全国设三十六郡，其中大连地区属辽东郡。

公元前二〇六年，刘邦灭秦。汉承秦制，仍实行郡县制。西汉时辽东郡置十八县，其中沓氏县（今金县及其以南地区）和汶县（今复县一带）就设在今大连地区内。

汉灵帝中平六年（公元一八九年），朝廷任命公孙度为辽东太守。翌年，即汉献帝元年（公元一九〇年），公孙度自立为辽东侯、平州牧，将辽东郡分为辽西、中辽、辽东三郡。沓氏县和汶县仍属辽东郡。其间，北海朱虚的邴原避乱辽东，“止于三山”<sup>①</sup>，三山即指大连湾外的三山岛，泛指大连。

唐初，这里称“三山浦”。《新唐书·高丽传》：“诏陕州刺史孙伏伽、莱州刺史李道裕，储粮械于三山浦、乌湖岛”<sup>②</sup>。唐朝中期改称“青泥浦”。唐德宗贞元十七年（公元八〇一年）、当朝名宰相贾耽在《道里记》中曾记载：“登州东北海行……，北渡乌湖海至马石山东之都里镇<sup>③</sup>三百里。东傍海墉过青泥浦，”即后来的青泥洼，今之大连。

明清以来始称青泥洼，而海口则称青泥海口，亦有仍称“三山海口”或“金州海口”的。据《山中闻见录》记载，明末嘉宗天启四年（公元一六二四年）十月，守备张盘自复州“退屯旅顺、三山海口”<sup>④</sup>

据《清实录》载，咸丰十年（公元一八六〇年）五月，盛京将军玉明在奏摺中就曾“查探金州海口详情，洋人火轮船先后驶至金州海口”的字样。

光绪五年（公元一八七九年）十月二十八日，直隶总督奏报：“即留镇



北、镇南、镇东、镇西四船在津沽，……并令时常出洋赴东、奉交界之大连湾与沿海口岸驻泊巡逻，以壮声威。”<sup>⑤</sup>这是较早见之于我国官方文字里的“大连湾”称呼。从那时以后，个别奏摺或史籍里虽然还有“大连湾”、“搭连湾”等不同写法，但后来都趋于写成“大连湾”了。

据日人试野虎三郎编写的《大连市史》记载：“大连湾称呼，见之于文献的，是以一八六〇年英人约翰·瓦特测量的《英国海图》为最早。”（即《辽东大联湾海图》——笔者注）。一八六〇年，英国“沙普琳”号商船（实际上是间谍船）船长哈恩特到这里测量海湾时，据当地居民说，这一带叫做“大连湾”。该书还提到：约翰·瓦特在制海图时，还参考了二百多年前（明万历年间）到中国来传教的柴伊斯脱的古地图，说明万历时中国人中间就已有“大连湾”的称呼。总之，“大连湾”的称呼，民间称之为前，官方用之于后；至于民间的称呼最早是否起于明万历年间，尚有待考证。

关于为什么叫“大连湾”？说法较多。诸如：因形似褡裢，故名之；山东往东北运销褡裢多路经此地，因而得名；原名“大砺湾”，因其不雅而改称大连湾；满语“达连”（海的意思）的译音，连诸小湾为一大海湾，等等。在十九世纪六十年代以前，已有“三山海口”、“金州海口”、“青泥洼口”等称呼。为什么后来要改称“大连湾”呢？笔者以为，自第二次鸦片战争以后，清政府逐渐认识到大连湾在军事上的重要地位，遂决定沿大连湾海岸筑炮台、修栈桥铁码头、筑兵营、设水雷营，发展海运，固守海防。为了使称呼准确无误，把诸小海湾与大海湾加以区别，就属十分必要了。据《奉天通志》第一百六十二卷记载：大连湾内的小海湾共有五个：其一曰青泥洼，其二曰潮水套，其三曰河套，其四曰江涯套，其五曰大箇口（即大孤山湾）。大连湾是指东起鲇鱼尾西至大鹏嘴以里的海湾而言。而原来的“青泥洼口”与大连湾内的青泥洼又易混淆；而金州海口，既可以使人理解为大连湾，也可以理解为金州辖区

内的其他海口。所以，连李鸿章的奏摺中也不得不有“金州海口即大连湾”的字样，以示区别。早已流行于民间的“大连湾”称呼，所以能取代以前长期流传的三种称呼，就是因为这个称呼更为准确。

一九一三年乔德秀编写的《南金乡土志》里，有“聚数澳于大澳，故以大连名”的说法，是有道理的。

大连市得名于大连湾。大连市最早兴建于大连湾镇一带，后来才逐渐移筑于今东、西青泥洼渔村一带。自光绪十三年（公元一八八七年）至光绪十九年（公元一八九三年）的六年间，清政府决定在大连湾北岸和西岸修建六座炮台。设水雷营，并派四千名陆军官兵驻扎在今大连湾镇一带（当时叫做柳树屯），这是当时大连地区除旅顺口外的另一个重要军事要地。一八九四年十一月上旬，即甲午战争期间，日寇占领大连后便把兵站总监移到这里。一八九八年沙俄强行租借旅大后，在今大连湾镇一带强占民房、民地修建公署，也是把大连湾镇一带作为它的统治中心的。到一八九九年七月三十一日，沙皇政府才决定把青泥洼一带命名为“达里尼”（ДАРИНИЙ）（意思为距离波得堡遥远的”地方）。这是因为在南岸修筑海港优于北岸的缘故。“达里尼”正是利用“大连”的谐音与俄语“遥远的”一词相符。日俄战争后，日本辽东守备军司令部命令废除“达里尼”泊一九〇五年二月十一日起，改称“大连市”。日本殖民者在大连地区统治了四十年，把这座城市扩建为一个殖民地城市。一九四五年八月大连解放后，在党和政府的领导下，经过近四十年的改造和扩建，使大连市成为一座以机械、化工、轻纺、电子工业为骨干的，门类比较齐全的社会主义工业城市，对外开放的港口和旅游胜地。随着改革和实行开放政策，大连市将成为一座现代化的，具有高度物质文明和精神文明的城市。

注：

①见《三国志·魏书·邴原传》卷 11，1959 年中华书局版，第 350 页。

②乌湖岛即今之城隍岛。

③都里镇即今之旅顺。

④转引自《奉天通志》卷 24，第 27 页。

⑤转引自《洋务运动》（2），上海人民出版社，1961 年版，第 423 页。

# 近代大连记事

(1840—1949)

孙械蔚 陈士聪

时间	记事
1840年	(道光二十年)
6月21日	鸦片战争爆发。
8月21日	英舰“布郎底号”和“摩底士号”在复州常兴岛 (即今长兴岛)一带侵扰。
9月4日	英舰再次侵入常兴岛。
9月15日	英舰侵扰宁海县(金县)两海沿岸。
9月18日	英舰侵临小平岛西口。
9月19日	英舰停泊于大连湾侦探水情。
△	清政府在大连地区建置复州、宁海县,隶奉天府,专管“民人”。(复州,辖今复县、新金和庄河县一部分。 宁海县辖今大连市区、旅顺口区、金县、长海县和新金县一部分。)
1841年	(道光二十一年)
1月	袁振瀛任宁海县知县,翼锦德任城守尉。

大连文史资料第一辑

1842 年	(道光二十二年)
(正月)	盛京将军耆英调任广州，遗缺由禧恩代理。
1843 年	(道光二十三年)
(二月)	熊岳副都统移住金州城，改名金州副都统。祥厚任副都统。升宁海县为金州厅，隶奉天府。  升宁海县城守尉为金州协领。
冬月	盛京地区沿海由旅顺水师营担任巡逻，三月出哨，九月返回。
1844 年	(道光二十四年) 辽宁南部军事行政中心从熊岳城移至金州。
1845 年	(道光二十五年)
(九月)	盛京将军禧恩因病去职，由奕湘继任。
1846 年	(道光二十六年)
(七月)	清廷命盛京、直隶等省加强海防练兵。当时金州沿海有官军四百名。
1847 年	(道光二十七年)
(八月)	奕湘调任杭州，奕兴继任盛京将军
1848 年	(道光二十八)
(十二月)	金州副都统祥厚升江宁将军，遗缺由贵升继。
1849 年	(道光二十九年)

(十一月)	金州副都统贵升被解职，由庆玺继任。
1850 年	(道光三十年)
(一月)	金州厅海防同知沈逢恩在任。
1851 年	(咸丰元年)
(正月)	金州副都统庆玺调离，由瑞昌继任。
1852 年	(咸丰二年)
(一月)	特普钦任旅顺水师营协领。
1853 年	(咸丰三年)
(正月)	金州副都统瑞昌调任吉林，由喀通阿继任。
(二月)	喀通阿调任阿勒楚，由萨炳阿继任。白焕经任旅顺水师营协领。
1854 年	(咸丰四年)
(二月)	盛京将军奕兴被革职，由英隆继任。
(五月)	金州副都统萨炳阿病故，由庆如继任。
1855 年	(咸丰五年)
(春)	复州云台山(今新金县大田乡)一带农民在王毓令率领下举行抗捐斗争。
(二月)	金州副都统庆如提升为绥远城将军，由增庆继任。
(十二月)	增庆因病解职，希拉布继任金州副都统。盛京将军英隆调任热河都统，遗缺由奕湘继任。
1856 年	(咸丰六年)
(三月)	盛京将军奕湘因病解职，由庆祺继任。

大连文史资料第一辑

1857年	(咸丰七年)
(一月)	育淳任金州厅海防同知，奎星保任金州协领。
1858年	(咸丰八年)
(六月)	盛京将军庆祺升直隶总督，遗缺由玉明继任。
1859年	(咸丰九年)
	大连湾一带，开始出现数处小渔村。
1860年	咸丰十年)
(五月)	英舰在旅顺口、羊头洼进行侵扰，乡民聚集二、三千人持械御敌，其舰遂即离去。英舰又在复州龙王庙、大连湾等地沿海侵扰。
(八月)	盛京将军玉明入卫京师，十月回任。
1861年	(咸丰十一年)
7月19日	金州地震，房屋倒塌六百四十间，死二人、伤八人。
1862年	(同治元年)
	金州城与山东的贸易日渐频繁。
1863年	(同治二年)
1月	唐恩寿任金州厅海防同知。
1864年	(同治三年)
(三月)	盛京将军玉明入京，遗缺由宝珣代理。果毅堂任金州协领。

1865 年	(同治四年)
(五月)	庄河大孤山一带农民在刘坊领导下举行起义。
(闰五月)	金州副都统希拉布被解职，由安图继任。
(七月)	盛京将军玉明被解职。由恩合代理。
1866 年	(同治五年)
1 月	恩合被革职，都兴阿接任盛京将军。
1867 年	(同治六年)
1 月	谈广庆任金洲厅海防同知。
1868 年	(同治七年)
一日	穆仪任旅顺水师营协领。
1869 年	(同治八年)
1 月	书明额任金州协领。
1870 年	(同治九年)
(一月)	金州厅双台沟人乔有年，进士，出任山东沂水、巨野县知县。
1871 年	(同治十年)
(一月)	徐仲三任金州厅海协同知。
1872 年	(同治十一年) 金州因旱受灾，韩道观率众去厅衙门请求减免租税。翌年被官府逮捕，遭严刑拷打
1873 年	(同治十二年)
1 月	杨桂平任金洲厅海防同知。



△	高希湑在金州貔子窝（今属新金县）领导农民起义。
1874 年	（同治十三年）
（七月）	金州副都统安图被革职，由毓福继任。
1875 年	（光绪元年）
（二月）	盛京将军都兴阿病故，由崇实继任。
（五月）	金州副都统毓福被革职，由诚廉继任。
（六月）	高希湑由长山岛（今长海县）回大东沟，与宋三好联合攻占沙河子（今属丹东）、大东沟。
（十二月）	奉天府改隶盛京将军（原隶盛京户部侍郎）。
1876 年	（光绪二年）
（十月）	盛京将军崇实病故，遗缺由崇厚代理。
△	岫岩通判升州，辖今庄河北部。
1877 年	（光绪三年）
	岫州在庄河、石城岛设巡检司。
1878 年	（光绪四年）
（五月）	盛京将军崇厚被召入京，由岷元代理。
△	张六祥任金州厅海防同知。
1879 年	（光绪五年）

(十一月)	金州副都统诚廉病故，由恩佑继任。
12月11日	有“大连湾”一词在直隶总督杨鸿章呈光绪帝奏章中出现。
△	爽良任复州知州。
1880年	(光绪八年)
(一月)	清政府谕令加强金州海口防务，首筑黄金山炮台。
(春)	在金州、貔子窝东老滩、夹心子和复州湾设场制卤晒盐。
(冬月)	清政府派德国工兵少校汉纳根到旅顺口，负责修筑炮台。
△	裁旅顺水师营，建北洋海军前敌营务处。
△	魏懋任金州厅海防同知。
1881年	(光绪七年)
(五月)	旅顺黄金山第一座新式炮台竣工。
(六月)	召盛京将军岐元回京，七月调任成都。遗缺由崇绮继任。
(九月)	北洋大臣李鸿章赴旅顺，筹建船坞、炮台事宜。 旅顺设水雷-鱼雷营，配备挖泥船。
1882年	(光绪八年)
△	四川提督宋庆率毅军(属淮军)九营一哨，进驻旅顺。
△	旅顺有快炮船、蚊船各二艘，海口布水雷。
1883年	(光绪九年)
(十二月)	盛京将军崇绮因病解职，由庆裕继任。
△	侯补道刘含芳首任北洋前敌营务处兼船坞工程总办，隶属于北洋大臣李鸿章。

大连文史资料第一辑

1884 年	(光绪十年)
6 月	吴长庆率庆军(属淮军)三营驻金州。
1885 年	(光绪十一年)
(夏)	提督刘盛休率铭军马步十二营, 进驻大连湾。在旅顺建大船坞, 设海军提督署, 丁汝昌任北洋海军提督。
1886 年	(光绪十二年)
(五月)	文格任金州副都统、石源任金州厅海防同知。
△	沿旅顺口东西两岸先后筑成黄金山、模株礁、崂蛎嘴、崂蛎嘴后台、威远、蛮子营、馒头山、城头山、老虎尾炮台, 有新式大炮四十八门, 射程六公里以上。
△	醇亲王奕瀟由李鸿章陪同, 至旅顺视察诸炮台, 并赴大连湾检阅刘盛休部。
1887 年	(光绪十三年)
(三月)	金州副都统文格调任三胜(今依兰县)任副都统。
1888 年	(光绪十四年)
(四月)	金州副都统联恩因病解职, 五月由连顺继任。
△	大连湾炮台开始修建。
△	赵臣弼任金州厅海防同知。

1889 年	(光绪十五年)
(七月) △	盛京将军庆裕因病解职，由裕禄继往。 提督宋庆在旅顺后路建椅子山、案子山、测望台、松树山、二龙山、大坡山等炮台。
1890 年	(光绪十六年)
11 月 27 日	旅顺船坞竣工 (今四八一〇工厂)，清政府派员验收。
1891 年	(光绪十七年)
(六月)	直隶总督李鸿章、山东巡抚张曜到旅顺检阅海军，并查勘炮台和船坞。北洋海军提督丁汝昌率定远、镇远等十一舰；广东水师副将余雄飞率广甲等三舰，南洋水师统领郭宝昌率寰泰等六舰，齐集旅顺会操。
1892 年	(光绪十八年) 金洲厅海防同知谈广庆到任。
1893 年	(光绪十九年)
(十月) △	直隶侯补道龚照屿接任北洋前敌营务处兼船坞工程总办。 大连湾沿岸黄山、老龙头、和尚山西、和尚山中、和尚山东，陆路徐家山六座炮台建成，共有新式大炮二十四门。
1894 年	(光绪二十年)
(五月)	李鸿章检阅北洋海军，并视察大沽、旅顺、大连湾、威海卫诸要隘。

## 大连文史资料第一辑

8月1日	清政府被迫对日宣战，日本也在同日，对清府宣战。
（七月）	旅大金共驻清军三十营约一万三、四千人（张光前统亲庆军四营驻西炮台，黄仕林统亲庆军四营守东炮台，宋庆统毅军九营一哨专防旅顺陆路，刘盛休统铭军十二营驻大连湾，金州副都统连顺统一营二哨驻金州城。）
8月	宋庆部分统马玉崑率毅军四营，由旅顺出金州援平壤
9月3日	宋庆率毅军五营自旅顺赴九连城。
9月12日	丁汝昌率北洋海军十二艘军舰，护送商船五艘进入大连湾。
9月14日	淮军部赵怀业率怀字营六管接防大连湾。
9月15日	刘盛休率铭军四千人乘船赴大东沟。
9月17日	中日黄海大战。互有损失，管带邓世昌、林永升等战死。
9月18日	北洋海军回泊旅顺，存舰仅七艘，入坞修理。
9月30日	李鸿章令姜桂题，募桂字四营，程久和募和字三营充实旅顺防务。又令卫汝成募成字六营，并所部马队两营，正定镇总兵徐邦道募拱卫军三营，并所部马队两营、炮队一营至旅顺协守。
10月	姜桂题、程久和、卫汝成率所部从塘沽乘船来旅顺。
10月14日	徐邦道率所部从塘沽乘船来旅顺。
10月18日	北洋海军修好舰艇出旅顺口赴威海。

10月22日	斩济远舰管带方伯谦于旅顺。
10月24日	日军第二军三万余人，在大山岩大将率领下在辽东半岛花园口（今庄河县明阳乡）登陆。
10月下旬	花园口附近人民组织“红枪帮”开展抗日斗争。
10月下旬	徐邦道军在金州城东大黑山右麓筑两岸炮垒，以扼金州陆路。
11月1日	金州副都统连顺幕僚王书翰，单骑赴盛京送信求援。中途被日军俘去，宁死不屈，触石殉国。
11月3日	日军第一师团由貔子窝出发，宿营王家店。
11月4日	日军先锋部队到达金州黄家店。
11月5日	徐邦道军在金州城东石门子炮击日侵略军，日寇伤亡惨重。
11月6日	日军攻陷金州城。
11月7日	日军进犯大连湾，不战而得诸炮台。守将赵怀业先一日逃到旅顺。
11月8日	日军在大连湾、金州一带休整十天。
11月9日	日军在南关岭抓塾师阎世开为进犯旅顺作“向导”，阎不从，被日军杀害，壮烈牺牲。
11月12日	日寇在金州设民政厅。
11月18日	日军分兵三路进犯旅顺。龚照屿逃跑。徐邦道军在土城子英勇截击日军先头部队，歼敌八十余名。
11月20日	大山岩布置总攻旅顺计划。
11月21日	日军攻陷旅顺陆路各炮台，黄杜林、赵怀业、卫汝成临阵脱逃。

## 大连文史资料第一辑

11月22日	旅顺陷落。宋庆回师收复金州城不克。徐邦道、张光前、姜桂题、程允和四统领率残兵从旅顺冲出与宋庆军会师，北经复州，退往盖平（今盖县）。日军攻陷旅顺后，历经三昼夜，野蛮地屠杀了近二万名中国人。
(十一月)	金州副都统连顺被撤职，穆隆阿继任。赵怀业被通缉治罪。
12月6日	日军乃木希典旅团攻陷复州城。
1895年	(光绪二十一年)
2月	日军将杀害我同胞的尸体，集中火化埋于白玉山东麓，立木牌曰“清军将士阵亡之墓”，以掩其罪恶。
3月	辽东半岛被日寇全部占领。中日战争停火。
4月11日	日军在金州城内设“占领地总督部”
4月17日	李鸿章同伊藤博文在日本签订《中日马关条约》。
4月23日	俄、德、法“三国干涉还辽”，照会日本政府。
5月5日	日本政府被迫声明，“放弃对辽东半岛的永久占领。”
(八月)	盛京将军裕禄调任福州，由依克唐阿续任。
(十月)	金州副都统德升被解职。由寿长继任。
△	祥瑞任金州厅海防同知刘朝钧任复州知州。
11月8日	李鸿章与林权助在北京签订《中日辽南条约》。

12月24日	清军收回金州城。
12月25日	日侵略军从大连湾撤走最后一批部队。
12月下旬	北洋帮办军务宋庆到旅顺，修复炮台、船坞，恢复旧观。刘含芳在旅顺黄金山鸿胪井刻石。道员顾元勋主持万忠墓立碑仪式，亲书“万忠墓”三字。
1896年	（光绪二十二年）
1月4日 △	日本“占领地总督部”从金州撤回东京。 金州厅海防同知王志脩，作《金州曲氏井》诗。  旅顺人民重修“万忠墓”，修筑亨殿。
1897年	（光绪二十三年）  高钦任金州厅海防同知，庆霖任金州协领，关维恒任复州知州。
2月14日	沙俄舰队侵入旅顺口，强占旅顺、大连湾。
1898年	（光绪二十四年）
2月17日	清政府特派专使许景澄谒见沙皇尼古拉二世，敦促俄舰从旅顺口撤退。
3月3日	沙俄正式向清政府提出租借旅大和修筑东省铁路支线到黄海海岸。
3月27日	李鸿章与巴甫洛夫在北京签订《旅大租地条约》。
3月28日	俄舰在旅顺口、大连湾登陆，举行占领仪式，并张贴“接管旅大金地方布告”。
5月7日	许景匿在彼得堡签订《续订旅大租地条约》，规定金州城归清政府“自行治理”。



## 大连文史资料第一辑

(七月)	金州副都统寿长调走，由奎铎继任。
10月	沙俄在旅顺成立临时民政管理局，同时设置关东监狱署。
10月21日	中俄勘界委员会成立。清方委员有福培、金州厅海防同知涂景涛。
(十月)	金州副都统奎铎调走，由明顺继任。
11月26日	旅大租地边界勘察完毕。
△	沙俄在旅顺建立第一所殖民学校——普希金初等学校。
1899年	(光绪二十五年)
2月5日	金州貔子窝刘家店坊马成魁率领当地农民举行抗俄运动，遭俄军镇压，死伤百余人。
(正月)	盛京将军依克唐阿病故，三月由增祺继任。
5月7日	签订《勘分旅大租界专条》。
6月	大连商港开始修建。
7月22日	青泥洼四百多百姓冲向沙俄“筑港事务所”，怒砸沙俄“征地办事处”。
8月	沙俄颁布《暂行关东州统治规则》，州政府设在旅顺。州下分金州、貔子窝、亮甲店、旅顺和岛屿五个行政区；大连市为俄财政部直辖的特别市。

△	沙俄在旅顺孙家沟设立“传染病医院”，残杀我同胞。俄在旅顺发行《新边疆报》、《新时代》杂志等。
1900年	(光绪二十六年)
6月	金县义和团不断袭击俄军，复州义和团、红灯照亦积极活动。另一支义和团到旅顺向华工散发反俄传单。
6月27日	沙俄袭占金州南山修筑站台。
7月	沙俄从旅顺调出四千名侵略军到北京镇压义和团运动。
(六月)	金州副都统明顺调任三姓，遗缺由前水师营协领福升代理。
7月27日	沙俄袭占金州城，将金州代理副都统福升、协领富伦、同知马宗武等拘于旅顺。
(夏)	复州义和团西进自锦州入关，参加华北地区反帝斗争。
11月8日	盛京将军增祺派已革道员周冕与沙俄在旅顺订立《奉天交地暂行章程》。
11月16日	增祺在《奉天交地暂行章程》上签字。
11月27日	义和团一千余人在金州等地活动。
1901年	(光绪二十七年)
1月	增祺在《奉天交地暂行章程》上签字一事败露，被革职，清廷宣布交地章程无效。沙皇批准《旅顺要塞建筑工程方案》，并列为重点工程。
(正月)	盛京将军崇善调任绥远城，三月由增祺复任。
夏	沙俄在山东、河北等地招骗中国工人十万余来旅大修建旅顺要塞和大连港。

## 大连文史资料第一辑

7 月	东清铁路，金州南关岭到大连市之间的铁路竣工。
8 月	东清铁路，公主岭到旅顺间的工程完成。俄将青泥洼更名为“达里尼”，并宣布大连市为通商贸易自由港。
9 月	《辛丑条约》签订后，福升、富伦、马宗武等被放回。
△	旅顺至大连以及金州、貔子窝、普兰店间公路竣工。沙俄在旅顺设华俄道胜银行旅顺分行。俄在大连建东正教堂。
1902 年	(光绪二十八年)
12 月	大连商港基本建成，吞吐货物能力为年一百二十万吨。
冬	沙俄修建旅顺监狱。
△	马鸿阶任复州知州。
1903 年	(光绪二十九年)
8 月	沙皇颁发《暂行远东统治条例》，设远东大总督府于旅顺。
△	金州火车站建成，南满铁路正式通车。
△	吴瞻莪任复州知州。
△	直通俄国境内的东清铁路正式开始运行。大连港成为东方的一大贸易商港。
1904 年	(光绪三十年)
2 月	日俄战争前夕，驻旅大俄军有三万五千六百八十人。

2月4日	日本下达进攻沙俄驻旅顺舰队的命令。
2月9日	日联合舰队司令官东乡平八郎派舰袭击旅顺口俄舰。
2月10日	日俄双方下诏宣战，日俄战争爆发。
2月12日	清政府对日俄为争夺我国东北而战，宣布“局外中立”。
2月14日	日海军舰队第二次进攻旅顺口。
2月24日	日海军舰队第三次进攻旅顺口。
3月10日	日海军舰队第四次进攻旅顺口。
3月22日	日海军舰队第五次进攻旅顺口。
3月27日	日海军舰队第六次进攻旅顺口。
4月13日	日海军舰队第七次进攻旅顺口。
4月14日	日海军舰队第八次进攻旅顺口。
5月5日	日第二军司令官奥保巩大将率第一、三、四师团和一个旅团在辽东半岛盐大澳（今金县猴儿石一带）登陆。
5月10日	日大本营再派独立第十师团在庄河大孤山登陆。
5月16日	日军向金州三十里台俄军防地进攻。日明治天皇弟弟伏见宫贞爱亲王率第一师团，住金州二十里堡韩家屯。
5月26日	日军攻陷金州城。日军伤亡4,387人，乃木胜典少尉死于金州城南八里庄。日第二军在金州建军政署。
5月30日	日军占领大连湾。
5月31日	日在大连湾建军政署。
6月6日	日乃木希典率第三军在辽东半岛盐大澳附近登陆
6月	日在复州设置军政署。

	沙俄将修筑旅顺东鸡冠山北堡垒的中国工人千余人骗上“波罗号”，驶至旅顺口外将船炸沉。
6月23日	日俄海军舰队在旅顺港外激战。
6月26日	乃木第三军占领剑山、小平岛，将俄军压缩于旅顺口。
8月10日	日俄舰队在黄海激战。
8月15日	日军占领旅顺陆路椅子山炮台。
8月19日	日第三军向旅顺俄军发起第一次总攻击，二十九日结束。日军投入兵力达五万以上，伤亡一万五千八百人，首攻失败。
8月20日	日军占领大顶子山炮台。
8月22日	日军占领盘龙山。
9月	日辽东守备军成立，司令部设在金州。
9月19日	日第三军向旅顺俄军发起第二次总攻击。
9月20日	日军攻占龙眼北方堡垒。
10月31日	日军攻占东鸡冠山与盘龙山之间的备用堡垒。
11月	日第三军决定逐个夺取堡垒，各师团强行坑道作业，爆破胸墙。
12月5日	日军攻陷二〇三高地（从九月十九日开始攻），日伤亡七千五百七十八人，俄伤亡六千七百三十九人，乃十保典少尉阵亡于此。
12月6日	日军攻占老虎沟山。
12月8日	日军在二〇三高地用重炮轰击旅顺港内俄舰，使俄海军损失惨

	重。
12月	日金州军政署在金州东门外设“南金书院”。辽东守备军宣布，金州政区改为五管区。
12月14日	日水雷舰袭击俄舰，十五日旅顺港内俄舰全部被歼灭。
12月15日	俄旅顺陆防司令官康特拉琴克少将在东鸡冠山北堡垒召开军事会议，被日军炮弹击毙。
12月18日	日军攻占东鸡冠山北堡垒，日军伤亡八百人。至此，日军已拔掉俄军五十三个堡垒。
12月29日	日军攻占二龙山。
12月31日	日军攻下松树山。
△	俄旅顺海军工厂，二千多华工罢工集体辞职。曹祖培任复州知州。
1905年	(光绪三十一年)
1月1日	日军攻下望台炮台。下午四时半，俄旅顺要塞司令官斯特塞尔中将向日军投降。
1月2日	日俄双方军事委员在水师营会谈旅顺开城问题。
1月5日	日旅顺攻围军司令官乃木希典大将和俄旅顺守备军司令官斯特塞尔中将在水师营会见。
1月9日	日军设置旅顺要塞司令部。
1月13日	日第三军举行旅顺入城式。
1月中旬	日旅顺军政署成立。

## 大连文史资料第一辑

2月11日	辽东守备军第三号令，将俄称达里尼（青泥洼）改为大连市。
5月	日在旅顺设置关东州民政署。
（五月）	盛京将军增祺被解职，赵尔巽继任。
6月	日在大连设立的华人学堂一大连公学堂开学。
6月23日	大连民政署，金州、旅顺民政支署成立，皆隶属关东州民政署。
9月5日	日俄代表在美国签订《朴茨茅斯条约》。
（八月）	清廷撤销奉天府。
9月26日	郭正人率抗日武装袭击东老滩（今新金县碧流河乡）日军。
10月31日	关东总督府成立，下辖关东州民政署。
11月	日本赤十字社关东州委员部成立。
12月17日	关东州设置民政署巡查教习所。
12月	关东宪兵队创设于旅顺。旅顺、大连等地设分队。
12月22日	奕劻同小村寿太郎在北京签订《中日会议东三省事宜条约》。清政府承认沙俄将旅大租地转让给日本。
1906年	（光绪三十二年）
1月	辽南地区抗俄斗争领袖马福连，被日寇金州民政支署貔子窝出張所杀害。
5月21日	董元亮任复州知州，七月十八日由吴瞻莪继任。

6月7日	日在大连成立“满铁筹备委员会”。
7月22日	马福连被害后激起义军的极大愤怒，其部下百余人攻打杨树底小衙门，并攻进貔子窝街里。
7月27日	抗日武装吕永发部火烧日寇金州老虎山小衙门。
8月1日	日政府公布建立关东都督府。“南满州铁道株式会社”本部建立于大连。
9月1日	旅顺高等、地方两法院成立。
9月	大连“圣爱”病院（即大连“慈惠”病院）成立。
10月9日	升貔子窝、普兰店为民政支署；旅顺、大连、金州为民政署。
10月	设立大连、旅顺口中央金库派出所。华人旅顺水师营公学堂成立。大连华商公议会及小岗子（西岗）华商公议会创立。庄河从岫岩州划出，成立庄河厅。
10月26日	关东州海军区改名为旅顺镇守府。
△	日“东亚烟草株式会社”在大连创立。
1907年	（光绪三十三年）
2月	设立关东州赤十字病院（原旅顺俄国赤十字病院）
（三月）	改盛京将军为东三省总督，设奉天省巡抚。
4月1日	南满州铁道株式会社开始营业。
4月	樊宝贵任复州知州。金州寻常高等小学校、旅顺第二寻常高等小学校开学。
5月	大连至苏家屯间铁路复线竣工。
6月	日寇在旅顺白玉山巅修“表忠塔”（即白玉塔），塔高66.8



## 大连文史资料第一辑

	米，由二万多华工建造，至一九〇九年十一月完工。
7月	建立“川崎造船所大连船渠工场”（今大连造船厂）。
10月5日	大连中央试验所成立。
10月	廷瑞任庄河厅同知。
11月3日	《满洲日日新闻》创刊（日文版）。
11月29日	公布大连港港则。
12月4日	一支抗日武装在金县三道湾登陆与日寇警察激战。
△	建立日清制油株式会社大连支店《今大连油脂工业总厂的前身》。
△	小野田水泥株式会社（今大连水泥厂的前身）建立。
1908年	（光绪三十四年）
4月	大连“宏济善堂”成立。
9月	东三省总督徐世昌来旅顺访问日本当局。
9月11日	潘德荃任复州知州。
10月	陈锡昌任庄河厅同知。
10月	日在大连发行《泰东日报》。
11月1日	金州民政支署隶属于大连民政署。貔子窝、普兰店出張所隶属于金州民政支署。

1909年	(宣统元年)
2月	建立“福昌公司”(今大连海港), 拥有华工数万人。
4月	旅顺开始供给电气、电力, 大连海友会组织成立。
5月	开始办理大连至上海定期航线业务, 公布关东都督府中学校官制, 开办旅顺中学校, 大连油坊联合会成立。
7月	普兰店公学堂开学。
8月	南满洲教育会创立于大连。
8月3日	曾宗韩任复州知州, 王孝偁任庄河知事。
9月	发布旅顺工科学堂规则。
10月	建大连神社。
10月18日	日本前首相伊藤博文由日乘船抵大连。
11月28日	旅顺“表忠塔”、“纳骨祠”竣工。
△	“满铁”沙河口工场技工养成所(今大连机车厂技校)成立。
△	“满铁水产株式会社”(今大连海洋渔业公司前身)成立。
1910年	(宣统二年)
3月	满铁公社大连瓦斯作业所成立。
3月26日	安重根因击毙伊藤博文, 被日寇杀害于旅顺刑务所。
4月	旅顺工科学堂成立。
6月	旅顺高等女学校成立。
7月1日	开放旅顺口西港商港。
9月	大连商业学校成立。

## 大连文史资料第一辑

(十月)	盛京副都统德裕兼金州副都统。
1911年	(宣统三年)
2月	大连南满洲工业学校成立。
5月	关东都督府“农事试验场金州分场”成立。
6月17日	复州知州何展上任，十月由刘颜卿继任。
8月9日	满铁会社北沙河口铁工厂开工。
8月27日	庄河、复州一带人民在潘永忠领导下，反对苛捐杂税，潘率众进攻庄河厅衙门。
11月20日	顾人宜率领革命军向清军李家卧屯巡防攻击，庄复起义，旗开得胜。
11月27日	庄河革命军正式成立中华民国军政分府，顾人宜为关东第一军司令。
11月30日	革命军攻克复州水门子。
1912年	
2月初	孙中山派蓝天蔚为关外都督，北伐军由安东、庄河登陆。
2月6日	庄复起义军配合北伐军攻克瓦房店。
2月10日	北伐军攻占庄河厅。
10月	旅顺高等、地方两法院新厅舍建成。
12月	大连圣德会成立。
1913年	

1月	中华民国政府改金州厅为金县、改庄河厅为庄河县、改复州为复县。
1月30日	复县县知事申钟嶽上任。
2月	汪炳猷任庄河县知事。
4月	开设满铁大连教员讲习所。
10月	成立大连窑业株式会社。
1914年	
3月	张励学任庄河县知事，六月由魏墨林继任。 十月由王济辉继任。金州管内大魏家屯会水田移民（从日本国内迁居），新建“爱川河”
4月	撤旅顺镇守府，成立旅顺要塞港部，归佐世保镇守府管辖。
5月11日	复县县知事苏鼎铭上任。
6月	大连神明高女学校成立。
9月	大连高等女学校成立。
1915年	
6月3日	公布关东州公学堂规则。
7月	大连商业会议所成立。
9月	公布大连、旅顺市规则。
10月	齐瑶塘任庄河知县。
1916年	
2月	奉天、大连间飞行成功。

## 大连文史资料第一辑

---

5月8日	曲鸿年任复县知事，六月二十四日苏鼎铭回任。
7月	金州种畜场设立。
10月	马良翰任庄河县知事。
12月4日	大连满铁沙河口工场铸造工人罢工，要求增加工资。
1917年	
1月10日	复县知事程廷恒上任。
4月	关东都督府满蒙物产馆在旅顺成立。 旅顺师范学堂附属公学堂成立。
8月1日	大连生命保险同业会成立。
10月	东洋拓殖株式会社大连支店成立。
11月	正金银行发行金券。
12月1日	金州开始供给电气。
△	建立旅顺博物馆。
△	满州制麻株式会社（今大连麻纺织厂）建立。
1918年	
1月22日	大连船渠工厂的中日工人联合大罢工，获得胜利。
4月	大连第一中学成立。 大连工业株式会社成立。 “南满矿业株式会社”成立。

5月	日本三菱商事会社支店大连出張所开业。南满洲工业专门学校附设职业教育部成立。
7月	大连机械制作所成立。
(秋)	大连满铁沙河口工厂工人罢工。
10月	廖彭任庄河县知事。
12月	日支合办满蒙毛织品株式会社成立。
1919年	
4月11日	日政府公布关东厅官制，废止关东都督府。前关东都督府民政部改为关东厅，陆军部改为关东军司令部，治所在旅顺。
5月	朝鲜经由东京，大连间直通通信线开通。
6月	《关东州犯罪即决例》施行。
8月18日	关东厅下辖旅顺、大连、金州民政署、貔子窝、普兰店民政支署隶金州民政署。
8月19日	大连建筑行业工人罢工。
10月	大连地方法院支厅成立。
11月28日	《泰东日报》载《六个月的李宁》一文，赞扬列宁的革命功绩和革命理论。
△	满铁沙河口工场技工养成所成立。
△	旅顺龙王塘水源地开工（三年后竣工）。
1920年	
3月	大连“工材会社”成立。大连株式会社商品取引所成立。大连郊外土

## 大连文史资料第一辑

	地会社成立。《复县志略》出版发行。
4月	旅顺师范学堂设立小学教员养成部。
4月	复县双塔（今新金县双塔乡）一带农民在宋凤桥领导下，掀起“抗丈”反“清科”的斗争。
（春）	金县三十里堡农民在韩希贵带领下，和日本人和田进行反占田斗争，经过四年多的斗争，终于取得胜利。
5月1日	大连满铁沙河口工场中、日二千多人联合大罢工，六月十日胜利结束。
5月	东洋拓殖株式会社在赞子河一带开设盐田。《大连新闻》创刊。
7月1日	大连中华青年会成立。
8月25日	关东都督府监狱改名关东厅监狱。
10月25日	大连、奉天间铁路复线竣工。
1921年	
年初	大连中华青年会夜学部开学。
6月	大连市“为仁会”成立。
10月	大连商品信托会社成立。
△	景作纲任复县知事。
年末	中国劳动组合书记部北方分部主任罗章龙，前往东北考察工人运动来到大连，了解当地工人运动情况。

1922 年	
4 月 1 日	旅顺工科学堂升为工科大学。南满医学堂升为满洲医科大学。
4 月	大连西岗公学堂成立。
6 月	南满洲工业学校成立。 大连湾无线电信局成立。
8 月	大连火灾海上保险会社成立。
9 月 8 日	关东厅长官山县伊三郎公爵乔辞任，伊集院彦吉男爵继任。
11 月	山下汽船会社大连支店成立。孙孝宗任在河县知事。
1923 年	
2 月	大连工人、学生上街张贴标语，要求按期收回旅大。 大连中华青年会会刊《新文化》月刊创刊。
3 月 10 日	北洋政府外交部照会日本政府声明废止“二十一条”，并要求“指定日期以便商酌旅大接收办法”。
3 月	关东州劳动保护会成立。
4 月	大连商业学堂、金州农学堂成立。 满洲船渠株式会社及满州福岛纺织株式会社（今大连纺织厂）成立。
5 月 4 日	大连中华青年会等团体在星个浦（今星海公园）举行“五四”运动纪念活动。
8 月	大连银行、辽东银行、奉天银行及满洲商业银行合并于满洲银行。
9 月 26 日	儿玉秀雄伯爵任关东厅长官。



## 大连文史资料第一辑

10 月	尾野大将任关东军司令官。
10 月 27 日	关东州监狱令制定。
12 月 2 日	大连沙河口铁道工场华人工学会成立。
12 月	张学良访问旅顺关东军司令部。在关向应建议下，大连中华“三一”学校成立。
12 月末	中国劳动组合书记部干事、京汉铁路总工会秘书长共产党员李震瀛同中共北方区委巡视员陈为人
	到东北开辟工作，路经大连会见傅景阳、关向应，并指导工运工作。
1924 年	
2 月	李震瀛二次来大连，由关向应陪同走访、调查各社会团体。
2 月—4 月	李震瀛在连期间先后发展关向应、赵悟尘、董秀峰、张云峰等参加中国社会主义青年团。四月下旬李返沪，并将关向应带至上海。
4 月 28 日	大连中华印刷职工联合会成立，创会刊《曙光》。
4 月	大连第一中学校、大连第二中学校、旅顺中学校、旅顺第二中学校成立。大连中华青年会出刊的《新文化》改名为《青年翼》。
6 月	中国社会主义青年团大连支部成立。
夏	中国劳动组合书记部主任邓中夏来大连指导工运工作，发展傅景

	阳为大连第一个共产党员。
10月	旅大自动车株式会社成立。
12月	关东农事试验场迁至金州东门外。 大连沙河口铁道华人工学会改名为大连中华工学会。
12月25日	关东厅辖旅顺、大连民政署。金州、貔子窝、普兰店民政支署皆隶大连民政署。
1925年	
1月18日	团中央批准，成立中国社会主义青年团大连特别支部。
1月	中国社会主义青年团大连特别支部改称为中国共产主义青年团大连特别支部，书记杨志云。
2月7日	全国铁路总工会第二次代表大会在郑州开幕。傅景阳在大会上作了《关于大连工运情况》的报告。大会决定大连中华工学会对内称为南满铁路总工会。
4月	大连昌光硝子会社（今大连玻璃厂）投产。
5月1日	全国第二次劳动大会在广州开幕。傅景阳、赵悟尘参加大会。
5月10日	关东州果树组合成立。
5月	关东厅发布“普遍出版物取缔规则”。
6月	关东州会制公布，州内设六十四个会。
6月14日	大连中华职工见习同窗会成立。
6月15日	“五卅”惨案发生后，傅景阳根据党的指示组织群众团体，成立“沪案后援会”。

## 大连文史资料第一辑

6月21日	沪案后援会在永善茶园（今人民剧场）召开“五卅殉难同胞追悼大会”，并在全市发动募捐活动。傅景阳主持召开“中日工人恳亲会”。
7月11日	南满洲瓦斯会社在大连成立。
8月	大连放送局（即广播局）创立。 大连、金州间公路开工（一九二九年完成）。
9月	苏联在大连开设领事馆。
11月10日	金福铁路公司成立。
12月	满铁会社设立大连卫生试验场。 大连中华工学会进行改组。
（冬）	大连中华工学会福纺分会成立。
1926年	
1月	中共大连特别支部成立，隶属于中共北方区委。
1月25日	关东州公布土地收容令。
2月初	国民党大连市党部正式成立。
4月	全国铁路总工会委员长，中共北方区委负责人王荷波来大连，由大连中华工学会委员长傅景阳陪同，巡视南满铁路沿线各站。
3月	德国在大连设领事馆。
3月23日	大连中华工学会夜校举行首届毕业典礼。

4月	比利时在大连设领事馆。旅顺工科大学学部授业开始。 大连劳动人民成立大连店员协会。
4月27日	大连福纺纱厂千余名中国工人举行大罢工。
5月1日	孙长贵代表大连中华工学会，魏长奎代表大连中华印刷职工联合会，参加在广州举行的第三次全国劳动大会。
5月	关东州发布水产令。 中共北方区委特派员张炽来大连将党团组织分开。分别成立“中共大连地方委员会”和“共青团大连地方委员会”。为加强“福纺”大罢工的领导，张炽留大连工作。
5月下旬	党在大连创立第一个秘密联络站——“人和堂”中药店。
6月	中共北方区委派邓鹤皋、尹才一来大连分别担任中共大连地委书记和共青团大连地委书记。南满洲电气株式会社在大连成立。大连鸿业公司成立。
6月24日	大连中华工学会组织全市十余个工厂的数千名工人汇集周家屯，声援“福纺”大罢工。

-161-

8月7日	历时一百零一天的“福纺”大罢工胜利结束。
8月	国际运输会社在大连成立。关东州水产会成立。
9月	大连至大阪航运开通。
△	大连自然博物馆建立。
1927年	
3月	大连地下党第二个联络站——“益记笔店”建立。

## 大连文史资料第一辑

4月27日	中共“五大”在武汉召开，大连地委书记邓鹤皋出席大会。
4月	关东厅体育研究所成立。
6月	中共大连地委改名为中共大连市委，直接受中央领导。
7月25日	由于叛徒告密，邓鹤皋等五十多名党员被捕，大连党组织遭到第一次大破坏。
8月22日	日殖民当局解散大连中华工学会、印刷职工联合会和增智学校。
8月下旬	大连地下党被破坏后，幸存的工运部长王立功、组织部长陈一仁与宣传部长纪锦章在“益记笔店”召开大连地委会紧急会议。
8月31日	金福线（金州东门至城子坦）铁路竣工。
10月1日	金福线铁路通车。
10月	在大连发行的《满洲日日新闻》与《辽东新报》合并为《满洲日报》。成立“中共满洲省委临时委员会”。满洲省临委派杜继增来大连，重建大连党支部。同年十二月，满洲省临委又派曲文秀来连工作。
11月	貔子窝电灯株式会社成立。
1928年	满洲省临委派张任光来大连巡视工作，并召开党员大会。
1月	D成立中共关东州县委会，选举曲文秀为书记，直属中共满洲省临委领导。
3月	旅顺、金州、普兰店、貔子窝及城子坦市街地建筑规则公布。
4月	张鸿钧任庄河县知事，不久王纯嘏继任县长。
4月	唐宏经代表满洲省委出席党的“六大”。
4月下旬	“五一”前夕党组织了一次全市性的张贴标语，散发传单活动。

4月29日	曲文秀被捕叛变，党员四十七人被捕，大连地下党遭到第二次大破坏。
5月	周恩来、邓颖超等同志去苏联参加党的“六大”，路经大连。
5月10日	旅顺工科大学开学。
6月	关向应、唐宏经在党的“六大”被选为中央委员和中央候补委员。 大连、旅顺同金州、普兰店、貔子窝以及东京，朝鲜联络直通电话开始。
12月	日本共产党在大连的秘密结社被日当局破坏。 大连大广场寻常小学校附设聋哑教育班开学。
冬	省委派吴晓天，党中央派朱全盛来大连开展工作。
1929年	
2月5日	奉天省改称辽宁省。金县、复县、庄河县直隶辽宁省。
4月1日	旅顺高等女学校补习科设立。
9月5日	满洲金融组合联合会在大连成立。
10月1日	大连聋哑学校成立。
10月	满洲省委加派赵文栋（张干民）来连，发展党组织，成立中共大连特别支部。
1930年	
1月23日	大连消防署建立。
3月	大连女子商业学校建立。
4月19日	由于满洲省委遭到破坏，朱全盛私自离连，大连特支失去作用。

## 大连文史资料第一辑

4 月	大连聋哑学校改名为关东厅盲哑学校。
5 月 22 日	满洲省委巡视员王鹤寿来大连巡视工作，又重新建立大连特支。
6 月	满洲省委派王永久来大连任特支书记。随后又派张乃文来大连任市委书记。
10 月	甘井子码头竣工。
10 月 22 日	关东州行政区划改为五区，即大连、旅顺、金州、普兰店、貔子窝民政署。
11 日	大连至日本福冈间通航，每周空运六次。
1931 年	
3 月	中共中央河南省委书记童长荣任大连市委书记。
7 月	根据中央指示，中共大连市委改为大连特别支部。
9 月	大连船渠工场（今大连造船厂前身）竣工。
9 月下旬	日寇侵占庄河县。日关东军司令部自旅顺迁奉天。
10 月	童长荣调东满任特委书记。 省委派刘景新（张洛书）来大连负责特立工作，
	并在西岗开设“志诚书店”掩护开展党的工作。
10 月	金伯阳（旅顺人）任中共满洲省委常委。
11 月 10 日	日关东军协助溥仪乘比治山丸号轮船离开天津取道营口，十八日抵旅顺大和旅馆。
11 月 20 日	日本将辽宁省改为奉天省。

12月中旬 △	陈宝琛自津来旅顺，谏博仪，反对建立满蒙共和国。 日关东军板垣征四郎与博仪、郑孝胥在旅顺策划成立“满洲国”。  乔德秀著《南金乡土志》发行。
1932年	
2月24日	板垣与郑孝胥在旅顺大和旅馆商定国名为“满洲国”。
3月1日	日本关东军傀儡——“满洲国”发布建国宣言。
3月9日	溥仪在新京（长春）任“满洲国”执政，年号“大同”。
3月	旅顺师范学堂与旅顺二中合并，成立旅顺高等公学校，下设中学部和师范部。
5月	大连小平岛结核疗养所建立。
7月15日	大连特别支部改为大连市委，书记刘景新。
7月	刘长春（大连市甘井子区凌水乡河口村人）代表中华民国参加第十届奥运会。
(秋)	庄河县长岭子农民组织大刀会，抗击日寇。
12月16日	日侵略军分兵三路进攻岫岩、城子坦、庄河。大刀会在庄河土城子击毙日军少将森秀树。
1933年	
2月	中央巡视员杨志远在大连市委会上传达中央给满州省委的指示信。并整顿了市委组织。
6月	由山东日照暴动失败后转移到大连工作的王德海去奉天被日寇逮捕。
8月2日	满州化学工业株式会社大连市甘井子工场开工。



## 大连文史资料第一辑

10月7日	<p>山东日照暴动失败后转移到大连的脱党分子于冀贤被张洛书派往奉天联系工作；于到奉天后即向日寇自首叛变。</p> <p>关东海务局设普兰店支局。</p>
10月20日	<p>由于叛徒向日当局自首，大连市委书记张洛书（刘景新）等三十七名党员被捕·大连地下党第三次遭到大破坏。</p>
1934年	
（春）	<p>中共满州省委派张敬文来大连重建党的组织。先后在印刷行业、满铁和造船、码头建立三个支部。</p>
3月1日	<p>改“满洲国”为“满洲帝国”，博仪由“执政”改为“皇帝”，年号由“大同”改为“康德”。</p>
7月	<p>受苏联红军参谋部军事情报组领导的“国际反帝情报组”（又称“抗日放火团”）在大连建立，在上海设联络总站，通过天津联络点，遥控指挥</p> <p>大连、奉天、安东等地。</p>
9月	<p>胶东工委派二十名党员来大连，成立“胶东临时支部”。</p>
9月26日	<p>大连至长春铁路复线完成。</p>
12月26日 △	<p>日政府公布关东局官制，改关东厅为关东洲厅。</p> <p>日本在关东州所属六十四个会设初小四年制普通学堂一百一十六所。</p>
1935年	
4月6日	<p>溥仪第一次访日，在大连乘“比睿”军舰去日本。</p>

4 月	大连工业学校成立。
5 月	大连协和学校、大连实业学校成立。
10 月	中共满洲省委调哈尔滨市委书记张福增（夏尚志）来连任市委书记。《庄河县志》发行。
1936 年	
1 月	庄河县抗日救国会成立。 根据中共驻共产国际代表团的指示，撤销满洲省委。大连市委隶属哈尔滨特委领导。
9 月	大连市委书记张福增因被敌人察觉，哈尔滨特委派海伦县委书记王清志接任大连市委书记。
1937 年	
4 月 17 日	因哈尔滨特委被敌人破获，大连市委书记王清志被捕，供出了大连党的组织，导致一百五十余人被捕，大连党组织再次遭到大破坏。
4 月	抗日放火团在大连开始有组织地活动。
7 月 1 日	满铁大连新车站（今大连车站）建成。
7 月	抗战爆发后，设在大连的“胶东临时支部”返回山东开展抗日。 汉奸张本政（旅顺水师营人）将其三十五艘货船调集大连，资助日寇运军火屠杀我同胞。
8 月 2 日	日寇对大连市委所属组织进行了彻底破坏，有一百一十五名党员被捕。
12 月	关东州厅由旅顺迁大连，撤销大连民政署。
1938 年	

## 大连文史资料第一辑

4 月	大连抗日“放火团”火烧甘井子石油工厂。关东州市建制改为二市四署六十四个会。即大连市、旅顺市，旅顺、金州、普兰店、貔子窝民政署。
10 月	关东州劳务协会成立。
1939 年	
3 月 1 日	金州女子高等公学校开学。
3 月	金州商业学校成立（1943 年改名金州工业公学校）。
1940 年	
（春）5 月	胶东区党委派左友文（左士会）到大连开展工作，五月建立大连支部。
6 月	博仪第二次访日路经大连。 从 1937 年至今，大连抗日放火团成员亲手放火造成火灾达五十七起，给日寇造成损失达数千万元。
6 月 24 日	大连抗日放火团被日殖民当局破坏，放火团成员八十七人全遭逮捕。
1941 年	
4 月	关东州实行经济统治，生活必需品实行配给制。日本在金州三十里堡老爷庙和大孤山侯家屯修建飞机场，抓华工一万六千余人，残害致死者有七千人。
（冬）	大连地下党在西岗开设“德盛商店”作为开展工作的秘密联络站。

1942 年	
9 月	胶东抗日联盟总会决定，派张寿山来大连建立抗盟组织。
10 月	日寇在金州在龙王庙修建“陆军医院”（细菌工厂），将我同胞作为试验品，致死者达八千一百余人，就地掩埋，人称“万人坑”。
12 月	张寿山在大连马栏屯开设“隆兴茶庄在”作掩护，进行革命工作。
1943 年	
(春)	建立抗日同盟会大连分会，张寿山为主任，直属胶东抗盟总会领导。
4 月	胶东区党委城工部李鹏华任大连支部组织委员。
10 月	日本宪兵队逮捕我大连地下工作人员。满洲重机株式会社（今金州重型机器厂前身）建成。
1944 年	
(春)	胶东区党委派张世兰到大连抗盟分会总支委员会工作。
(秋)	胶东区党委派宫运海到大连建立南满铁路地下武工队。
(冬)	胶东区党委派于青峰等同志来大连，在机械厂等工厂以救国会名义开展革命活动。
7 月	美机轰炸大连。
1945 年	
6 月 4 日	日本总参谋长梅津美治郎抵大连，向关东军司令官山田乙三和中国派遣军司令官冈村宁茨传达《对苏作战要领》。
6 月 14 日	关东军召开军事会议，布署对苏作战计划。

## 大连文史资料第一辑

8月8日	苏联对日宣战。
8月9日	毛泽东主席发表《对日寇的最后一战》的声明。
8月14日	国民党政府和苏联政府签订《中苏友好同盟条约》和其他协定。旅顺口协定中规定。中苏两国共同使用旅顺口海军基地；大连为自由港，对各国贸易及航运一律开放。
8月15日	日本政府宣布无条件投降。
8月	大汉奸张本政成立伪大连地方自卫委员会。（后改称“治安维持会”）。
8月22日	苏联空降部队在大连和旅顺着陆，开始接管旅大。
8月24日	苏联近卫坦克第六集团军的首批坦克抵达旅大。
八月底 9月2日	国民党派汪漠祥到大连任国民党大连市党部书记日本外务相重光葵签署日本无条件投降书，旅大回归祖国怀抱。大连市职工总会在明德小学（今大连三十七中学）开会宣告成立，唐韵超被推选为委员长。
9月8日	大连抗盟分会在马栏屯西山召开会员代表大会。
9月13日	成立庄河县政府。
9月14日	大连抗盟分会在西山水源地建立武装支队部，番号为胶东军区第十五支队。
9月20日	大连南满铁道地下武工队在侯家沟动员组等武装队伍。

9月25日	成立新金县政府。
10月	成立复县政府。
10月中旬	中共中央东北局派韩光等同志来大连组建大连市委，韩光任市委书记。
10月	大连社会科学研究会成立。
10月25日	大连市第一期工人训练班开学。
10月27日	大连各群团负责人在大和旅社(今大连宾馆)召开联席会议，协商成立大连市政府事宜，推选迟子祥为大连市长，陈云涛为副市长。
10月28日	苏联驻大连警备司令官高兹罗夫发布命令，任命迟子祥为大连市长，陈云涛为副市长。
11月1日	《人民呼声报》创刊。
11月8日	大连市政府正式成立，并宣布施政纲领。
11月10日	大连市警察总局成立(同月25日改为公安总局)，赵东斌任总局局长。
11月25日	旅顺民主政府成立。
12月1日	大连市政府发布对日本侨民施政纲领。
12月上旬	市委委派康敏庄、白全武等同志接管大连广播电台。
12月16日	中华青年会同学会宣告成立。
12月	“国民党大连市党部”撤掉牌子。 苏军进驻旅大后，废除日币、伪币，代之以苏联军用币。
1946年	
1月4日	大连市委召开关于发动群众斗争会议，清洗阶级敌人，巩固人民政权。

## 大连文史资料第一辑

1月6日	斯大林广场苏联红军胜利纪念碑举行落成典礼。
1月16日	金县人民政府成立。大连人民广播电台开始广播。
1月26日	市公安局包围了国民党大连市党部，并捕获市党部书记刘世德等人。
2月3日	沙河口区人民政府成立。
2月7日	大连县人民政府成立。
2月18日	西岗子区人民政府成立。
2月21日	中山区人民政府成立。
2月22日	大连市文化界民主建设协进会成立。
3月4日	大连市第二届参议会开幕。
4月20日	大连市委发出《关于粮食问题》的指示，安排好人民生活。
6月1日	《人民呼声报》更名为《大连日报》。
6月中旬	大连市委将原市内区域进行重新划分，市内设东部、岭前、中山、西岗、沙河口等区。另以甘井子区为基础成立大连县。
6月23日	中共大连市委划归中共辽东省委领导。
6月30日	大连市中苏友好协会召开第一届会员代表大会。
7月初	中共辽东省委决定大连市委改为旅大地委。
7月7日	旅大地委作出关于开展大连住宅调整运动的决定。
7月12日	大连市小学教师联合会成立。

9月29日	旅顺、大连、金县各机关团体代表在大连市政府礼堂举行会议，协商并通过成立旅大行政联合办事处。
10月20日	旅大地委作出《关于今后财政工作的决定》，提出：“组织生产，发展贸易，支援前线，改善民生”的方针。
10月21日	放大地委作出：《关于召开旅大第一届职工代表大会的决定》。
10月25日	旅大行政联合办事处委员会颁发《放大行政委员会施政纲领》。
11月	旅大地委决定成立建新公司筹备处，统一管理工业企业。
11月24日	旅大地委召开群众工作会议。
11月25日	复县被国民党占领。
11月26日	新全县田国民党占领。
11月	庄河县被国民党占领。
12月末	一九四六年底，东北军区司令部决定在大连创办电气工程学校（简称电专）。
1947年	
1月4日	旅大地委号召人民开展大生产运动；同日大连市政府决定分配官地。
1月	中共旅大地委划归中共南满分局领导。。
1月10日	大连市政府颁布收缴枪枝弹药的命令。
1月20日	大连、旅顺、石河驿间火车开始复通。
1月	大连民主青年联合会发行《民主青年》杂志。
2月5日	旅大地委发出《动员全党开展锄保工作的决定》
2月17日	旅大建国学院成立并开始招生。
3日8日	旅大各界妇女二千人在“上友好”电影院（即今艺术剧场）召开庆祝会，并通过将“大连各界妇女建国联合会”更名为“大连妇女联合



## 大连文史资料第一辑

	会“。
3月18日	大连市人民法院以“附逆祸国罪”判处大汉奸张本政有期徒刑十二年，并没收其全部财产。张本政乘保外就医，逃往国民党统治区沈阳市。
4月3日	旅大地区人民代表大会在旅顺召开，大会通过撤销旅大行政联合办事处，成立关东公署的决定。
4月10日	旅大地委作出《关于加强中苏友好协会工作的决定》。
4月18日	新金县重获解放，属江南行署。
4月25日	关东中苏友好协会于辽东饭店（今大连饭店）召开首届代表大会，大会宣布成立关东友协总会。
5月7日	关东各界青年在辽东饭店召开代表大会，成立关东青年总会。
5月初旬	关东医学院开学。
5月15日	关东公署将《新生时报》与《民众报》合并，改为《关东日报》。
5月中旬	旅大地委发出通知：要限期限额完成兑换钞票盖印的任务。
5月20日	关东妇女代表大会在辽东饭店召开，会议决定成立关东妇女总会。
5月30日	大连市中学自治会联合会正式成立。
6月3日	国民党派出以“东北行辕”中将军参谋长董彦平为首的十二人“旅大视察团”到旅顺、大连、金州等地“视察”，十二日离连。

6月6日	东北民主联军解放复县、庄河县。（庄河隶安东行署）
6月13日	东北民主联军解放貔子窝、城子坦、瓦房店及普兰店等地。
6月15日	关东文化协会成立。
7月	大连创办汽车学校，培训驾驶员、坦克手支援解放战争。
8月22日	旅大人民举行盛大集会，欢庆翻身节日。
9月25日至10月10日	旅大地委召开执委会议，最后由韩光同志作《关于目前形势与党的任务》的报告。
1948年	
1月	中共旅大地委划归中共中央东北局直接领导。
2月10日	中卜共旅大地委刊出秘密机关刊物《斗争》。
3月17日	中共旅大地委决定改换货币，由临时军用币改为地方性纸币（即关东币）。
5月15日	东北局派李一氓来连任地委副书记
5月29日至6月16日	旅大地委召开民主整风大会。
7月12日	中共中央东北局决定派欧阳钦同志来大连任旅大地委书记。
8月7日	旅大地委发出：纪念“八·一五”，“八·二二”，“九·三”三个节日的通知，要求在党内外进行拥苏宣传，加强中苏友好。
8月15日	中共金县县委成立。
9月4日	旅大地委召开全市干部大会，欧阳钦书记作了《关于国际主义问题》的报告。

## 大连文史资料第一辑

9月17日	旅大地区进行街名门牌整顿及户口登记工作。
9月24日	旅大地委决定成立大连自然科学研究会。
9月29日	中共中央东北局决定旅大地委下设锄奸保卫工作委员会。
9月	旅顺人民重修“万忠墓”。
10月4日	旅大保密分会成立。
10月29日	中共旅大地委决定创立大连大学。
11月2日	东北全境解放后，发行统一的“东北币”，废除“关东币”。
11月3日	旅大人民召开大会，隆重庆祝东北全境解放。
11月17日	中共大连市委合并于旅大地委。
11月	旅大文化古物保管委员会、旅大师范、旅大文专、大连工专及大连电专相继成立。
12月9日	旅大地区学生联合会成立。
1949年	
1月25日	旅大地委颁布《关于青年工作的指示》，并开始建立新民主主义青年团。
2月21日	中共中央东北局决定，中共旅大地委改为中共旅大区党委。
2月25日	旅大地区开展扫盲运动。
3月1日	旅大区党委决定党组织公开。
3月25日	旅大区党委决定，自四月一日起将《大连日报》改名为《旅大人民日报》，《关东日报》改为《行政导报》。

3月30日	旅大中苏友协决定募捐七万万元重修斯大林广场苏军胜利塔。
4月1日	旅大区党委召开活动分子大会，向全市人民公开区党委组织。同日，大连民主青年联合会改名为“新民主主义年青团”；“大众书店”改名为“新华书店”；大连生产学校改名为“中共旅大区党委党校”。
4月15日	大连大学举行创校典礼。
4月27日	召开旅大地区第二届人民代表大会，决定改关东公署为旅大行政公署。
5月10日	经东北局批准，恢复大连市委。
6月10日	旅大妇女召开第二届代表大会。
7月1日	中国新民主主义青年团旅大区团委召开第一次代表大会。
8月2日	旅大地区决定进行土地改革。
9月19日	东北局派东北局宣传部第二副部长郭述申来大连任区党委副书记。
9月27日	改金县长山列岛区为长山县(1953年改为长海县)，改金州城区为金州市（1950年撤）。

注：

- 1、本文时间栏内，凡有“（）”的日期系指农历时间。
- 2、凡有“△”号者，为具体时间不详。

## 编后

《大连文史资料》第一辑现在出版了，由于撰写者的亲身经历和见闻的局限，加上我们编辑水平较低，内容不尽翔实，观点不完全正确，在所难免。诚恳欢迎阅者给予补充、订正和批评。

编者 一九八四年十二月